

## 大会

Distr.: General  
18 August 1999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 第五十四届会议

临时议程\* 项目 100(c)

可持续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  
妇女参与发展

**1999 年关于妇女在发展中的作用的世界概览:  
全球化、性别与工作  
秘书长的报告**

## 目录

段次 页次

序言 .....	1-45	5
A. 背景 .....	1-5	5
B. 性别与发展 .....	6-45	5
1. 妇女参与发展模式:历史简介 .....	9-11	6
2. 妇女参与发展的兴起 .....	12-14	6
3. 将重点从妇女参与发展转移到性别与发展和将性别观念纳入主流 .....	15-21	7
4. 1990 年代的全球会议和首脑会议 .....	22-41	9
(a)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 .....	24-25	9
(b) 世界人权会议 .....	26-27	9
(c) 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 .....	28-30	10
(d) 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 .....	31-33	10
(e)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 .....	34-37	10

\* A/54/150。

## 目录

段次 页次

(f) 联合国人类住区会议(生境二).....	38-39	11
(g) 世界粮食首脑会议 .....	40-41	11
5. 在经济学中列入对性别问题的认识的理由.....	42-45	11
导言 .....	46-75	13
A. 全球化、性别和劳工市场的最新趋势.....	46-55	13
B. 性别问题在全球化过程中的经济作用.....	56-69	15
1. 劳动力的重新分配 .....	58-62	15
2. 调整的代价 .....	63-65	16
3. 人的能力 .....	66-69	17
C. 各章的内容.....	70-75	18
一. 贸易、资本和金融的全球化 .....	76-100	19
A.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贸易自由化和扩展.....	84-88	20
B. 实物资本和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动性.....	89-95	22
C. 金融自由化和证券投资.....	96-100	27
二. 就业和全球化的迁移效应 .....	101-144	29
A. 就业效应 .....	103-118	30
1. 制造业部门 .....	103-105	30
2. 外国直接投资和出口加工区 .....	106-109	31
3. 服务部门 .....	110-112	33
4. 非正规经济部门 .....	113-114	34
5. 农业 .....	115-118	34
B. 迁移效应 .....	119-122	35
C. 评估全球化的就业效应.....	123-144	36
1. 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 .....	123-126	36
2. 工作条件 .....	127-128	37
3. 男女工资差别 .....	129-134	37
4. 按性别的职业隔离 .....	135-144	40
三. 生产国际化、工作重组和劳动“灵活安排” .....	145-212	46

## 目录

段次 页次

A.	工作的改变.....	151-159	46
1.	变化的产出结构.....	152-154	47
2.	追求灵活机动,实现劳工市场自由化.....	155-159	47
B.	灵活工作的增加.....	160-195	48
1.	非全职工作.....	160-166	48
2.	非正规部门性质的变化.....	167-173	52
3.	对非正规部门的衡量.....	174-180	54
4.	在家工作.....	181-195	56
C.	不断变化的国际劳工流动格局.....	196-212	59
1.	从事制造业装配线工作的“受租用”工人的临时移徙.....	202-205	63
2.	帮佣工人和娱乐界雇员.....	206-212	64
四.	农村妇女不断变化的工作模式.....	213-254	66
A.	计算农村妇女的工时.....	217-218	66
B.	农业的商业化和市场自由化.....	219-239	68
1.	按性别分工.....	223-230	69
2.	私有化.....	231-239	70
C.	家庭对市场经济的反应.....	240-254	73
1.	创业活动.....	240-243	73
2.	调整家庭分工.....	244-248	74
3.	组织.....	249-254	75
五.	公共政策环境的转变.....	255-311	77
A.	宏观经济政策中的通货紧缩倾向.....	259-273	77
1.	经济停滞对妇女的影响.....	265-267	78
2.	社会保障制度中的性别偏见.....	268-273	78
B.	风险和动荡的加剧.....	274-291	79
1.	动荡问题个案研究:亚洲金融危机.....	276-282	79
2.	亚洲危机对妇女的影响.....	283-291	80
C.	国家作用的削弱和社会保护方面的漏洞.....	292-311	81s

## 目录

段次 页次

1.	税收基础的削弱 .....	298-303	82
2.	不断变化的公共支出形态 .....	304-306	83
3.	结构调整的宏观经济学与性别 .....	307-311	84
六.	结论和顾及性别问题的政策框架 .....	312-339	86
A.	劳动力市场趋势的总结 .....	316-318	86
B.	对性别关系的影响 .....	319-325	87
C.	拟订一个顾及性别问题的政策议程 .....	326-339	89
1.	加强性别平等和劳动力流动 .....	330	90
2.	通过加强就业保障减少调整的代价 .....	331	90
3.	人力资源方面的性别不平等和投资 .....	332-334	91
4.	使性别问题纳入宏观经济政策 .....	335-338	91
5.	建立一个有利的政策环境的国际措施 .....	339	92

## 序言

### A. 背景

1. 大会 1981 年 12 月 4 日第 36/74 号决议请秘书长同联合国各有关组织和机构密切协作,就妇女在发展中的作用编写一份多部门和跨学科概览,提交大会 1984 年第三十九届会议。大会 1981 年 12 月 14 日第 36/127 号决议要求在编写《关于妇女在发展中的作用的世界概览》时同妇女地位委员会进行协商。大会 1982 年 12 月 3 日第 37/60 号决议建议将《概览》提交 1985 年审查和评价联合国妇女十年:平等、发展与和平成就世界会议。第一份《概览》于 1986 年发表。<sup>1</sup>

2. 1985 年,大会通过其 1985 年 12 月 17 日第 40/204 号决议,请秘书长定期增订这份概览,有选择地集中注意对妇女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经济中所起作用有影响的新产生的发展问题。第二份《概览》于 1989 年印发。<sup>2</sup>

3. 第三份《概览》是应大会 1989 年 12 月 8 日第 44/77 号决议和 1989 年 12 月 19 日第 44/171 号决议的要求编写的。根据大会 1993 年 12 月 20 日第 48/108 号决议的要求,通过妇女地位委员会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94 年实质性会议提交了《概览》的初步摘要。根据妇女地位委员会 1992 年 3 月 20 日第 36/8 号决议的规定,《概览》是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的主要文件之一。这份《概览》于 1995 年发表。<sup>3</sup>

4. 第四份《概览》是应大会 1994 年 12 月 23 日第 49/161 号决议的要求编写的。大会请秘书长审查现有趋势和政策对妇女全面经济和社会情况的影响,还要求特别强调影响到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困境所产生的不利影响,尤其是对妇女状况的不利影响,同时特别注意妇女加入劳动队伍条件日趋恶劣以及社会服务开支的减少对妇女在教育、保健和育儿方面的机会所产生的影响。通过对妇女状况的审查,希望《概览》增订本能够促进有关现有发展目标和战略及其对妇女和整个社会的影响的辩论。

5. 如过去一样,《关于妇女在发展中的作用的世界概览》的执行摘要通过妇女地位委员会提交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99 年实质性会议。(E/CN.6/1999/CRP.3)

### B. 性别与发展

6. 联合国自成立以来,一直参与处理妇女问题及有关男女平等的问题。《联合国宪章》为联合国规定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确定和保护全体人类之人权和自由,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宪章》的序言申明男女平等以及基本人权和人格尊严与价值之信念。

7. 国际妇女运动从一开始就影响着联合国有关妇女权利的基本原则和目标。“女创建者”为两性平等的斗争奠定的基础从此在全世界取得了势头。早期的妇女活动

---

<sup>1</sup>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C.86.IV.3。

<sup>2</sup>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C.89.IV.2。

<sup>3</sup>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C.95.IV.1。

家在拟订《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也由于她们的决心和远见,在联合国内设立妇女地位委员会(Pietila,1999年,第44页)。

8. 如今,在经过三十年的斗争之后,性别终于成为发展政策的中心。自1975年在墨西哥城举行了国际妇女年世界会议以来,不断提出了有关提高妇女地位及其与发展进程之间关系的文献。基本上,已将重点从在理论和政治上对待“妇女参与发展”的方法转向“性别与发展”的新方法。最近又将新产生的“将性别观念纳入主流”作为促进两性平等的战略。

## 1. 妇女参与发展模式:历史简介

9.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经济发展主要典范的现代化理论假设,世界新兴国家可紧随发达的西方国家的脚步寻求发展。因此,在第一个联合国发展十年期间(1961-1970年),很多政策所关心的是将现代技术,特别是将各种农业高产种子转让给发展中国家。这些政策成为闻名于世的“绿色革命”,使发展中世界很多地区的粮食生产和生产力大幅提高。投资的目标也是具有高增长潜力的领域,其假设是财富将迅速累积,最终“滴入”社会的贫穷部分。

10. 然而,经济增长的结果未能形成涓滴的局面。农业现代化和商业化结果只是加深了贫富之间的差距,还使各社会群体,特别是妇女处于社会的边缘。1960年代出现了失调的社会变革和动荡,而没有顺利走向繁荣。

11. 在第一个联合国发展十年期间,妇女地位并不是一个引起重大关切的主题(Tinker,1990年)。尽管1962年大会授权妇女地位委员会编写一份有关妇女在发展中的作用报告,委员会的重点主要在于发展的人道主义方面和妇女的法律权利,而不是妇女与发展的很多方面。

## 2. 妇女参与发展的兴起

12. 在1970年代,由于现代化理论的基本假设受到批判性审查,对发展开始有了一种新的理解。由于对“基本需求”和“增长再分配”一类的社会正义、贫穷和福利问题的关注不断加深,扩大了早期只注重经济增长中的技术方面的狭隘思维。

13. 妇女参与发展的努力是1970年代另一个关注的问题。大会将其列为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1971-1980年)的一个目标。特别是在Ester Boserus的开创性书籍《妇女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出版之后,有些研究人员和执行人员将此作为有关发展辩论的中心议题。在那十年中,加强了对妇女问题的关注。妇女参与发展已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宣传和实践领域(Pinker,1990年)。

14. 在妇女不断加深认识的这一时期,1975年在墨西哥城举行的第一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是另一个转折点,这次会议开始了联合国妇女十年:平等、发展与和平(1976-1985年)。随后在世界各地连续举行的联合国各次妇女问题会议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妇女。1975年在墨西哥城、1980年在哥本哈根和1985年在内罗毕与政府间会议同期举行的非政府组织论坛分别吸引了4 000、7 000和16 000名参与者。这些会议除了激发在研究、宣传和政策方面作出努力,以促进妇女权利之外,还在政府间一级

正式确认妇女参与发展。如此,也有助于改变国际和国家一级促进发展的执行人员的优先次序和观点。<sup>4</sup>

### 3. 将重点从妇女参与发展转移到性别与发展和将性别观念纳入主流

15. 对妇女参与发展的讨论最初集中于两个不同的问题:妇女或被排除在发展利益之外,或被列入社会边缘。妇女参与发展的政策方针就是利用发展资源改善妇女的条件和让人们看到她们的贡献。尽管妇女参与发展的方案确实有助于改善妇女的条件和获得资源,但是却不能解决男女之间关系不平等的基本结构问题。这些方案不能解决男女之间不平等的问题是因为它们往往只关注妇女问题。这方面的认识重新引起了对整个问题的重辩论,并且更加强调了性别概念。这一新方针最终为采用被称为性别与发展的新方法铺平了道路,其中作为一个分析类别的性别问题成了注意的中心。

16. 生物的不同性别赋予社会含意便是性别的定义。性别是一种思想和文化概念,但是也再生于物质实践领域内;然后反过来影响这种实践的结果。它影响到资源、财富、工作、决策和政治权力的分配、影响到家庭以及公共生活中权利和待遇的享受。尽管文化各异,时间变迁,全世界范围内的性别关系均导致男女之间的权利不均衡,这是一个普遍特征。因此,性别是一个划分社会阶层的因素,在此意义上讲,它与种族、阶级、族裔、性行为 and 年龄等其它划分阶层的因素是相同的。这有助于我们了解性别特征的社会构造和作为两性关系基础的不平等的权力结构。

17. 在对性别作了如此强调的说明之后,(性别与发展)方法与妇女参与发展有三点不同。第一,将重点从妇女转向性别和男女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第二,从性别差异的观点重新审查所有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及发展政策。第三,认识到实现两性平等需要发生“转变性变化”。

18. 经过这一概念转变,性别关系政策和体制调整,而非仅仅是平等获得资源,已成为发展方案的焦点,<sup>5</sup>“将性别观念纳入主流”已成为支持这些倡议的共同行动战略。在 1995 年在北京举行的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上首次提出了将性别观念纳入主流,将其作为一项实现两性平等的“转变型战略”。1997 年,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下列定义,为联合国系统各机构提供指南:

“将性别观念纳入主流,是评估任何计划的行动(包括立法、政策和方案)在各领域和层次对男女影响的进程。这是一种战略,将妇女和男子的关注事项和经验作为一个整体,纳入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所有领域的政策和方案的设计、

<sup>4</sup> 1975 年国际妇女年和随后的妇女十年的重大成果之一就是在若干国家建立了国家机制。在十年结束时,已有 127 个会员国设立了某种形式的国家机制,这是一个得到政府承认、负责促进政策、研究与发展以便提高妇女地位和参与发展的机构。在联合国系统内,除了已有的提高妇女地位司以外,还于 1976 年成立了提高妇女地位国际研究训练所(提高妇女地位研训所)和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妇发基金),为妇女与发展领域的研究、训练和业务活动提供体制框架。

<sup>5</sup> 关于对妇女与发展文献中概念转变的更加详尽的讨论和将这两种方法另行归类的问题,见 Moser(1993 年)和 Razavi 和 Miller(1995 年)。

落实、监测和评估,使男女都能平等受益,终止不平等的现象。最后目标是实现两性平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7/2 号商定结论)。”

19. 实现两性平等,需要重新安排两性作用和调整社会的基本机制——市场、政府和家庭。因此,为了建立男女之间的平等伙伴关系,将性别观念纳入主流的目标是实现转变性变化。这将要求妇女积极参与社会各级的政治和决策。

20. 就妇女与发展问题而言,发展的政策方针概括起来,共经历了三方面的重大转变:

(a) 在提出妇女参与发展之前的目标是提高妇女福利,妇女被界定为主要是发挥传统的生育作用。发展项目集中于扫盲课程、家政学方案、育儿和计划生育活动。尽管面向福利和家庭方案的重要性无可置疑,但是却产生了加强妇女在家庭中的传统作用的效果;

(b) 随着妇女参与发展的概念问题提出,承认了妇女的多重作用、特别是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并对家庭分工作了审视,从而关注到了公平、贫穷和效率问题。<sup>6</sup> 发展项目开始将妇女看成是积极的参与者,而不是消极的发展援助接受者。政策倡议强调妇女接受培训、信贷和就业,以便增加妇女对发展的贡献和从中受益的能力。最初这些倡议并未对主导 1980 年代的新自由发展模式提出质疑,但是很快就发现,当时在很多国家推行的结构调整和宏观经济稳定化政策是与两性平等背道而驰的。因此,过分依靠市场力量和以新自由方法对待发展的做法逐步受到批判性审视。<sup>7</sup> 由于终于认识到为了提高妇女的生产和决策能力,必须改造市场和其他机构,从而产生了在以后十年采用的新方针;

(c) 在 1990 年代,由于重点已转向性别与发展,发展的政治方面,而非经济方面成了关注的焦点。赋予妇女权力与将性别观念纳入主流一起成为关切的主要问题。现在,妇女可以作为参与性的“由下而上”的发展进程中的平等伙伴采取主动行动。根据这一方法,“能力的增强不是他人给予的,而必须是自我产生的。性别方面的转变性政策可望做到的就是向妇女提供有利的资源,使她们更能控制自己的生活、更能决定她们希望生活在哪一种性别关系之中以及设计战略和确定同盟,以帮助她们达到这一目的”(Kabeer,1995 年,英文第 97 页)。因此,其构想是,转变性变化是以妇女增强能力为先决条件的。

21. 增强能力首先需要通过知识提高认识。因此,将性别观念纳入主流涉及到一项双重战略。一种行动是将性别列为全球议程的中心。如下文所述,联合国在世界各地举行的一系列会议在此方面尤其有效。另一种行动的重点是产生对性别问题的认识,特别是在直接关系到有关社会和经济政策的领域。最近几年女权主义经济学家和非政府组织蓬勃开展的工作便是后一种行动例子。1999 年《关于妇女在发展中

<sup>6</sup> 妇女参与发展的一项内容就是集中注意贫穷妇女及其需求,另一项内容是强调男女平等。第三项内容是强调可通过消除妇女在经济生活中的不利地位增进效率。

<sup>7</sup> 联合国在 1986 年通过《发展权利宣言》时,将发展定为是一项人权问题。《宣言》指出,“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每个人和所有各国人民均有权参与、促进并享受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

的作用的世界概览》就是以这部分工作为基础,并为将性别观念纳入我们所认识的经济发展的主流作出贡献。

#### 4. 1990 年代的全球会议和首脑会议

22. 1990 年代的另一个特点是,联合国在世界各地举行了一系列会议。为了制定一个发展方面的统一议程,国际社会(政府间和非政府机构)组办了下列会议: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环发会议)(1992 年,里约热内卢);世界人权会议(1993 年,维也纳);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人发会议)(1994 年,开罗);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1995 年,哥本哈根);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1995 年,北京);联合国人类住区会议(生境二)(1996 年,伊斯坦布尔)和世界粮食首脑会议(1996 年,罗马)。

23. 上述会议成功地将两性平等列入全球议程,同时扩大性别观点的范围,将其与发展与和平问题联系起来,并加强妇女地位委员会与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其他职司委员会的合作。妇女在非政府组织论坛和政策研讨会上积极参加各次会议的筹备阶段,并作为参加会议国家的正式代表团成员。由国际妇女运动发起的各次运动调动了各阶层妇女,她们帮助造成了每次会议所产生的文件(Pietila,1999 年)。

##### (a)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

24. 环发会议文件《21 世纪议程》强调妇女在环境管理方面的作用,并申明提高妇女地位是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先决条件。环发会议呼吁采取行动,提高妇女的识字率,加强教育、训练、营养和保健,并任命妇女担任与改进环境管理有关的关键的决策职务。《21 世纪议程》尽管强调妇女积极参与经济和政治决策的重要性,但是并未深入对现有的性别分工和妇女在环境管理方面的传统作用提出质疑。

25. 1997 年,大会在审查和评价《里约宣言》和《21 世纪议程》执行情况的特别会议上重申,必须建立全球伙伴关系,以实现《里约宣言》和《21 世纪议程》所确定的环境与发展目标。特别会议期间通过的《进一步执行 21 世纪议程方案》呼吁妇女作为平等伙伴参与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以及参与各经济部门、决策及科技领域。

##### (b) 世界人权会议

26. 世界人权会议对妇女遭受的各种形式的歧视和暴力表示深切关注。会议重申妇女和“女童”的人权是不可剥夺的整体的普遍和不可分割的权利。会议确认其优先目标就是妇女充分和平等参与政治、公民、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包括因文化偏见和贩卖妇女而产生的针对性别的暴力和各种形式的性骚扰和性剥削均确定为侵犯人格尊严和价值。在武装冲突局势下对妇女施暴,特别是谋杀、蓄意强奸、进行性奴役和强迫怀孕,均确定为违反国际人权和人道主义法的基本原则。

27. 会议敦请国际社会、各国政府和民间社会加紧努力,保护和促进妇女和女童的人权。会议强调必须采取集体行动,消除在公共以及私人生活范围内对妇女施加各种形式的暴力。<sup>8</sup>

##### (c) 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

<sup>8</sup> 后来,在 1993 年,大会通过了《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

28. 人发会议《行动纲领》建议会员国(a) 确保妇女在政治进程中平等参加和有公平代表权;(b) 提高妇女的教育、就业和技能;(c) 消除阻碍妇女获得就业、资源和社会保障的一切形式的歧视做法。人发会议还强调家庭内部性别歧视的问题,反映在普遍存在重男轻女思想,男女在出生时就得到不同的待遇。敦请各国政府颁布措施,防止切割女性生殖器官、产前性别选择、利用女童卖淫和未经新娘同意操办婚事。

29. 妇女控制其自身生育能力的权利与性别平等、增强妇女能力和消除对妇女暴力一样,是任何一个人口与发展综合方案的基本部分。人发会议《行动纲领》采取进一步行动,将重点放在男子在计划生育、育儿和家务方面的作用和责任上。如此,为改变性别关系和男女特性奠定了基础。

30. 大会在 1999 年举行的审查和评价人发会议《行动纲领》执行情况的特别会议上除其他外,重点强调两性平等、公平和增强妇女能力,包括促进和保护她们的人权。大会还确认产妇死亡率和发病率是公共卫生的一个优先事项,呼吁将性别观念纳入一切方案和政策的主流。

#### (d) 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

31. 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哥本哈根宣言》认为,妇女受贫穷、失业、环境退化和战争的影响超出寻常。宣言强调,没有妇女的充分参与,社会 and 经济发展就不能持续,因此,男女之间的“平等与公平”必须成为经济与社会发展议程上的优先事项。

32. 首脑会议提请注意在一个繁荣的世界中,贫穷正在不断加深,并集中注意不断变化的世界经济秩序所造成的新挑战及其对和平与人的安全所产生的影响,并特别是承认妇女的贫穷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一个共同特征。首脑会议认识到妇女所面临的问题的严重性,呼吁制定新的战略,加强妇女在各级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中的作用。

33. 首脑会议对于同一年(1995 年)在北京举行的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起到了桥梁作用。

#### (e)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

34.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是官方政府代表和非政府组织代表举行的最大一次聚会。在北京的这次正式会议上,有 189 个政府派出代表团,包括 6 000 名与会者,另有 4 000 名非政府组织特派代表、新闻界代表和联合国官员,总人数约达 17 000 人。怀柔的非政府组织论坛吸引了世界各地 30 000 人参加。

35. 会议通过了《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行动纲要》维护《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并以《提高妇女地位内罗毕前瞻性战略》为基础。《行动纲要》本身是一项列有 12 个重大关切领域的增强妇女能力的议程。其成功与否最终将取决于各国政府、各国际组织和各级机构的坚定承诺以及能否调动足够的资源。

36. 《行动纲要》确定的 12 个重大领域是:妇女与贫穷;妇女的教育和培训;妇女与保健;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妇女与武装冲突;妇女与经济;妇女参与权力和决策;提高

妇女地位的机制;妇女的人权;妇女与媒体;妇女与环境;女童。《行动纲要》的通过说明 189 国政府承诺执行拟订的各项行动。

37. 《行动纲要》呼吁联合国系统各部门监督会员国对《纲要》的执行情况并将性别观念纳入联合国的各项政策和方案(第 292 段)。为了对《行动纲要》采取后续行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 1999 年实质性会议上审查了提高妇女地位的进展情况。此外,将在 2000 年召开大会特别会议,评价各国政府履行其在北京作出的承诺的情况。

#### (f) 联合国人类住区会议(生境二)

38. 生境二与“城市首脑会议”一样,也是讨论两个主要主题:“城市化世界的可持续人类住区”和“人人有适当住房”。这次会议是联合国各机构、各国政府、地方当局、市政机构、个别专业人员和研究人员、私营部门、私营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社区组织、工会和议员合作举办的。在生境二会议上,组织最严密的游说团体之一妇女核心小组负责监督将性别观念纳入各项最后文件的主流及捍卫在北京取得的成果。

39. 《生境议程》和《伊斯坦布尔宣言》制定了广泛的政策准则,并呼吁各国政府承诺改进人类住区的居住条件及确认住房权利并为此采取行动。有关两性平等问题的辩论确认,在制定和执行整个生境议程中的可持续人类住区发展领域的各项政策和方案时,应纳入性别观念。两性平等也被视为是人类住区发展的一个目标。生境二呼吁有效确认和重视无报酬工作,收集和传播按性别分列的数据,采取措施确保妇女平等参与各国的规划和决策工作。

#### (g) 世界粮食首脑会议

40. 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确认妇女在家庭和国家粮食安全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因此,妇女对消除贫穷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1996 年《关于世界粮食安全的罗马宣言》和《世界粮食首脑会议行动计划》敦请各国政府“确保一种以男女全面平等参与为基础、最有利于实现所有人可持续粮食安全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环境,为消除贫困并为持久和平创造最佳条件”(第 10 页)。为此目的,各国政府承诺以各种手段促进两性平等和赋予妇女权力,其中包括(a) 落实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作出的承诺;(b) 将性别观念纳入所有政策和方案的主流;(c) 确保平等获得生产资源和服务;(d) 在农业、渔业、林业和乡村发展中,改进按性别分类的资料收集、分发和利用;(e) 收集有关妇女在农业、渔业、林业和自然资源管理方面的传统知识和技能的资料。

41. 总而言之,1990 年代的各次会议和首脑会议及其五年期审查对在全世界提高对性别问题的认识至关重要,因为它们对将性别问题列为有关制订环境、人口、人权、粮食安全与社会发展的政策的国际讨论的中心起到了累积性效果。

### 5. 在经济学中列入对性别问题的认识的理由

42. 由女权主义经济学家带头进行的各项研究指出,几乎每个社会都利用性别作为分工的基础:妇女一般负责“生育”工作<sup>9</sup>——以维持和加强社会结构——而男子则

<sup>9</sup> 生育工作主要是家庭工作;照顾儿童、老年人和病人;志愿参加社区工作;自给(自用)生产。

主要从事在市场上有酬劳的“生产性”工作。形成这一局面的是与性别关系有关的社会原因,而非生物原因。在此意义上讲,这些研究说明了男女的性别特征,并说男女都受到性别关系的影响,只是方式不同。它们批评主流经济学将工作概念限于有酬劳工作,从而忽视了经济生活中的性别差异。

43. 生育工作没有酬劳,如通过无偿劳动开展的其他形式的非市场活动一样,并非由活动性质本身产生,而是由其社会和经济背景而产生的。从原则上讲,生育工作(和一般的“照管”劳动)可由在市场采购的有偿服务来取代。只要收入、市场条件和个人意愿容许,就可雇人从事这一工作。事实上,某种形式的生育活动,例如教育和保健,在各不同社会中是由国家或私营部门利用不同程度的有偿劳动执行的。

44. 每个社会都拿出其全部劳动资源中的一部分进行维持和生育(Beneria,1979 年和 Picchio,1992 年),不论市场是否是工作的主要组织原则。生育工作由于大多是无酬劳的,在经济上也许是无形的,但是,这并不表示生育工作是无代价的。如果因生育工作(和照管劳动)属于非市场性质而将其排除在经济计算之外,这完全是一种误导。男女之间无偿工作的分配不平衡,使妇女受到更严重的影响(开发计划署,1995 年,第 88 页);<sup>10</sup> 但是,如本概览在下文中所述,在减弱的经济增长中,整个社会都要付出代价。

45. 如果将男女之间公平分摊无酬劳生育劳动及一般的两性平等作为目标,第一步就必须建立准确和现实的社会会计制度。生育和照管工作必须在社会一级成为有形工作,应当深刻了解性别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就需要在经济学中采用对性别问题认识的方法,本概览正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

<sup>10</sup> 《1995 年人的发展报告》指出,男子在其经济贡献中得到最多的收入和承认,而多数妇女的工作仍然是无报酬、得不到承认和被低估的。

## 导言

### A. 全球化、性别和劳工市场的最新趋势

46. 近年来世界经济的主要趋势是全球性的一体化经济。在世界所有地方,公司、政府和个人在作决定时所面对的经济环境越来越具有国际性。全球化的势头是实实在在的,其影响到处可以感到,无论其结果是好是坏。现在金融市场每天有巨额款项跨界流动,远远超过在国际上交易的货物和服务的价值。金融资产的交易占据了巨大比重。东亚的危机已经告诉我们,如果金融市场出问题,就会引起全球实际经济的严重脱轨。现在,许多公司作全球性的规划,将其不同的业务根据成本要求分散到不同的地点,并在世界范围内外包产品加工和索取原材料。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和管理咨询公司以及其他许多服务部门的公司也正走向国际化,在世界各地进行国际兼并业务,并为全球性的公司提供审计和咨询服务。

47. 与日益加强的国际一体化相随产生的文化、政治和社会现象同样十分重要。通过经济交流和广告、媒体和通讯的作用,世界各地的人正在接受一种通过物质消费得到即时满足的文化的熏陶。此外,全球化还同当代的重大政治变革同步前进,例如,认同政治的举起、国际民间团体、新的治国之道以及普遍人权。

48. 全球化已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的词语,被用来描述上述各种现象以及走向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变革进程。这个词缺乏简洁的定义。就其经济范畴的意义来说,这个词通常包括以下密切相关但却不同的经济概念,即开放和自由化,一体化和相互依赖。因此,它所指的一种世界经济动向,其特征是自由贸易、金融和实际资产的自由流动,以及产品、技术、信息和消费模式的迅速传布。但是,即使这样一个相对狭义的经济定义所指的仍然包括许多种不断变化的现象,不同的观察者对这些现象有不同的认识和评价。

49. 在全球化时代,经济政策环境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各国政府关于国际贸易和资金流动的政策毫无疑问地转向支持更大程度的开放。这种政策变化为全球一体化辅平了道路,同时也是对全球化所释放的冲击作出的反应。

50. 所以,毫不奇怪,经济一体化所产生的经济效果对个人所产生的冲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无论是从其作为工人还是作为消费者的角度来说都是这样。在富有的国家以及在越来越多的较穷的国家,消费者购买物品的选择已经包括其他国家制造的产品。由于世界各地的消费者可以得到相同或相似的产品和服务,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也开始趋同,并开始出现新的混合个性。工作领域同样发生了广泛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工作来自于新的国际化的活动。全球化所创造的新机会使一些公司及其工人富裕起来了,但是,还有许多公司在国际竞争中失败,危及其雇员、外包工和地方供应商的生计。

51. 关于全球化的许多争议不是因为对正在发生的变化的性质有不同意见,而是对其社会和经济影响存在分歧。一些观察者出于全球化的有利方面而对其加以肯定,另一些则认为,潜在的利益在许多实际的危害衬托之下变得无足轻重,因此,他们更强调全球化的风险。他们指出,经济变革的成果和代价在国家之间和国家之内都没有得到平均的分配。全球各地加剧的贫困、区域之间、不同收入群体和性别之间更大的不平等令他们忧虑。东亚的危机更是加强了人们对全球化的谨慎态度,因为现在已经看清,扩大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会削弱对外部冲击的抵抗力。该地区的初步事

实显示,妇女在经济危机中承受超出寻常的代价。198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执行结构调整方案时的情况也是如此。

52. 过去曾经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自由化和贸易增长对男女就业所产生的不同影响作过研究,从而对经济一体化对不同性别产生的影响以及对妇女的日益沉重的无报酬工作负担产生的影响进行评价。现在,人们公认,自1970年代中期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的妇女从事有报酬的、非农业性工作,这与经济一体化有着密切的联系。《1994年世界概览》对这种就业方面影响的主要特征作了描述和讨论。自那时以来得到的实践经验尽管主要是肯定的,却也使人们能够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理解对就业的影响问题。例如,有几个国家的事实显示,经济一体化也大大减少了妇女就业。更重要的是,近几年来,随着世界经济的迅速变化,我们的看法也产生了迅速的变化,近来从使用“国际一体化”这个术语转向使用“全球化”,这也说明了上述事实。工作本身的性质及其组织安排,而不仅仅是它的以性别划分的区域和部门的分布,在全球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现在人们对这一点已经有了更全面的理解。

53. 《1994年世界概览》主要讨论的是经济一体化对就业产生的影响,而本概览则着重于从性别问题的角度来探讨全球化如何给就业领域带来变化。

54. 通常被用来描述上述变化中的突出现象的词汇有:灵活安排劳工市场、临时工和非正式工就业以及所谓的非典型、不稳定或临时性工作的大批涌现。归纳在灵活安排劳动力标题之下的这种变化及其对不同性别的影响虽然或多或少是一种全球趋势,但是在发展程度、社会—经济结构以及与世界经济形成一体的形式不同的国家,这种变化不尽相同。就业方面的变化与出生率下降、妇女取得教育机会增加、都市化扩大以及家庭结构变化等长期趋势相互作用。例如,一项综合研究发现,一系列的可变因素影响了近来不同国家的妇女参加有报酬工作的趋势,这些因素包括生产的组织和结构、劳务市场的立法、在职培训和教育系统、对于性别角色的社会态度和价值观等(Rubery和Fagan,1995年)。此外,在不同的国家,灵活安排劳动力的趋势对不同年龄、阶级和教育程度的妇女产生了很不同、甚至两极化的影响。由于这个原因,很难对全球化对不同性别产生的影响一概而论,这对不同国家和地区以及一个国家和地区之中的不同群体来说都是如此。

55. 但是,在所有这一切不同中,仍然可以找出一些相同的规律,从中可以看到各国不同的群体在以下各种不同的阶段如何适应经济困难:

- (a) 1980年代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债务危机和结构调整;
- (b) 1990年代东欧和独立国家共同体的“转型经济体”的政治和经济崩溃;
- (c) 墨西哥(1994年至1995年)和东亚(1997年至1999年)的财政动荡以及汇率危机之后的经济萧条;
- (d) 1980年代中期迄今经合组织国家结构性失业增加,国家福利减少。

除很少几个国家外,大部分经历了上述情况的国家所采取的总体政策是,使经济更加自由化和与世界经济更加一体化。总的趋势是,市场推动的活动增加,劳务市场更加灵活。新产生的工作往往不正规、不稳定性。非正式工、分包、非全时工、自营职业和在家中工作等就业形式蓬勃发展,而拥有工会的工作单位减少,受标准的劳工法

保护的工人减少,其原因是政府没有执行或废除了这种法规,或者是因为企业得以绕过或避开这种法规。

## B. 性别问题在全球化过程中的经济作用

56. 赞成全球化的一个最简单、但也是最有说服力的理由是:全球化可以使资源用在最有生产效率的地方。但是,对此也应该提出警告:面对不断变化的世界经济,各国的经济必须能够不断地自行调整,才能够在全球化过程中获得经济利益。国家一方面必须促进部门之间的劳务和资源更多的流动,另一方面又必须承受由此造成的调整代价。这两个方面都带有固有的“性别”因素。

57. 全球化对妇女相对福利产生的影响这个问题尽管本身也很重要,但只是说明性别问题重要意义的一部分理由。同样重要的是性别问题对一国的经济发展能力所产生的影响,特别是在目前的全球化进程中更是如此。可以从三个方面来阐述这个论点:(a) 重新分配劳动力所产生的增加生产力的效果;(b) 如何处理经济调整的代价问题;(c) 投资于人力资源以促进经济增长。

### 1. 劳动力的重新分配

58. 下文第二章中将讨论的一个问题是,伴随着全球化而来的经济冲击对男女两性的就业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过去二十年来,世界各地除很少一些例外情况,女性的就业比例稳步增加。这一增加的大部分原因是妇女劳动力从没有报酬的家庭劳动和自给(农业)部门转向了有报酬有经济活动。<sup>11</sup> 与上述趋势并存的是,从总体上来说,在发达国家,就业和产出结构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在发展中国家,则从农业转向制造业和服务业。

59.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这些趋势具有很大的促进增长的效果,因为这意味着劳动力从低生产力的利用转向高生产力的利用。尽管世界各地的劳动力市场上妇女仍然面对严重的性别不平等问题,但是,劳动力转向高生产力的利用却是事实。妇女和男子所从事的工作在质量、条件和报酬方面确实仍然存在很大差距。在许多地区,甚至连妇女的行动自由都受到社会准则和习俗的限制;尽管这种准则和习俗很少得到法律的肯定,但是,在对社会规范的修改中也没有对它们提出挑战。不过,越来越多的妇女参加有偿工作可能也意味着至少是一部分障碍的削弱。例如,尽管各地的职业方面的性别隔离程度(这种障碍总和的大致标志)仍然很高,但在世界许多地区这种隔离已经减少(见第二章 C 节第 4 小节)。

60. 上面已经提到,在世界各地,正常的、全时有偿职业往往已被更加多样化形式的就业取代,其特征是就业的灵活化和临时化,具体的形式包括外包工、合同工、非全时工、在家工作和其他形式的不受标准劳工立法保护的工作形式(第三章对此作了详细讨论)。事实上,近年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就业增长大多是这样或那样的非正规的工作。这类工作的出现是企业对全球化之下的市场条件变化作出的对策之一,一方面是为了降低成本,另一方面是为了使产品能够跟上越来越变化不定的需求。

<sup>11</sup> 第二个重要原因是男性就业增长停滞不前。

61. 在上述过程中,妇女显然是更受欢迎的劳动力。在一些地区,由于长期存在的职业上的性别隔离,产出结构的改变意味着劳动力需求方面的性别成份的改变。在大部分发达国家的国民产出明确转向服务部门的过程中,这一点尤其明显(第三章,A 节第 1 小节)。但是,更重要的是,在世界范围内,看来对女工的需求增加是因为与男子相比,可以以较低的薪酬和较差的工作条件雇用她们。尽管有些妇女打破了禁区,得到了以前主要由男子从事的更好的工作,但是大部分妇女所从事的仍然是低报酬的非正规工作,很少有培训或晋升的机会。在大部分国家,虽然妇女劳动力在需要时很容易得到,在不需要时又很容易处置,然而,劳动力的灵活化看来是领取报酬的在职妇女队伍扩大的原因。

62. “劳动力女性化”一词被用来强调世界各地就业格局变化中与性别有关的现象(Standing,1989 年和 1998 年)。这一词的用法有时不太严谨,但它具有两个具体的含意。第一,它是指在有报酬的职业中妇女所占的比例迅速和大幅度地增加,这可能是由于妇女获得了传统上由男子从事的工作,也可能是因为主要由妇女从事工作的部门的增长比较快。下面将讨论的各种事实显示:自 1980 年代初期以来,在世界几乎所有地区,上述两种情况均有存在。第二,这一词还被用来描述就业性质的变化:从前被看作是妇女次要“就业”特征<sup>12</sup>的不正规的就业现在在两性中间都已经很普遍。

## 2. 调整的代价

63. 经济结构调整的目的是提高生产灵活性、成本竞争能力以及对世界经济市场条件变化的适应能力,进行这种调整需要负出相当高的代价。在调整中,劳动力更替速度加快,因此过渡工人人数也就增加;许多工人由于掌握的技术过时,如果不接受再培训就将永远失业。由于市场的不确定性,并且要求降低成本的压力增加,公司尝试减少其核心雇员,更多地依靠不固定的就业形式,这样,在经济滑坡时就不需要负担工人。灵活就业的趋势就这样将市场动荡的代价转嫁到工人头上,使他们在经济萧条来临时更加无助,并且威胁他们的工作和收入保障。最近的东亚危机使人们痛识到某些经济体的这种倾向,就在不久以前,它们还被看作是在日益一体化的世界市场条件下经济成功的榜样。

64. 全球化所造成的现状不仅增加了社会保护的 need,而且还改变了公共政策所面对的问题。由于受全球市场冲击的影响而造成的经济脱轨使工人受到不利的影响,而现在国家更加难以向受影响的工人提供缓冲(第五章将讨论这方面的问题)。公共开支受到世界市场的约束,除此之外,国家的税收能力看来也被削弱。在许多国家,这些趋势看来也阻碍了采用刺激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来改善工人的工作前景和增加工资。而且,各国政府还被迫削减住房、营养、保健和教育等社会开支的总数或者人均数。

65. 总体而言,这种趋势对妇女的影响较之对男子的影响更严重,其原因有以下几种。首先,尽管妇女与男子相比参加有偿工作的人数增加了,但是妇女往往缺少就业保障。因此,由于妇女较少受到劳工立法的和集体谈判的保护,她们往往比男子更容易受到经济滑波的打击。而且,即使她们受到正式的社会保障计划保护,与男子相比她们看来还是处在不利的地位(见第五章 A 节第 2 小节)。第二,在世界许多地区,妇

---

<sup>12</sup> 次要就业是相对于家庭中负责养家的男子的主要就业而言。

女参加有偿工作的人数增加了,但是她们的家务劳动和照料子女的责任并不见减少(见第二章 C 节)。第三,由于家庭是最后一道福利保障,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遇到经济困难的时期,家庭中对妇女无偿劳动的需求就会增加(见第五章 B 节)。这不仅增加妇女的负担,而且有损于妇女的利益,因为这往往加强了“家庭主妇”的角色定型。家庭中不平等的家务负担与在劳务市场的边缘地位可能会互为因果,使妇女更加难以摆脱家庭中的依赖地位和次要养家人的角色。

### 3. 人的能力

66. 一个经济体如何解决调整的代价问题也决定了一个社会的不同群体如何分担这些代价。尽管这首先是一个社会公平和福利问题,但这个问题的处理也会影响到一个社会造就人力资源的能力。在最近学术界“新的”增长理论中,这种能力被视为长期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

67. 调整代价的付出造成经济困难,并从而引起匮乏。经济匮乏对个人的能力和今后生活前景造成破坏,对此毫无准备的人受到的破坏程度最大。因此,将调整的代价转嫁给社会中最无助、最脆弱的人群通常并不是解决这个问题最有效的方法。例如,当经济匮乏使一名少年失学,这可能是个人的不幸,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一代儿童中有相当一部分儿童的教育受到有害的影响,其结果就是大量抽出对人的能力的投资。这种代价可能是无形的,因此很难看到,尤其是在短期内很难看到,但是,看不到并不减轻其后果的严重性。投资会增加经济增长的潜力,抽出投资则会减少这种潜力。

68. 因此就产生一些具有广泛意义的考虑。首先,防止经济匮乏损害失业工人的长期的生产能力不仅是一个社会福利问题,而且是一个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问题。强迫的过度工作或由于长期失业造成的长久闲散严重损害人的精神和体力。因此,必须恰当地处理经济结构调整的代价问题,不然的话,这个问题会象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使得预期从增加的世界市场一体化中得到的利益相形见小。对调整代价的分担如果从社会角度来说是不公平的,那么从经济角度来说也就可能不是最佳的。

69. 第二,随着社会进步情况越来越多地被纳入经济计算,性别问题也成为经济学的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妇女的附带问题。在社会结构中,全世界的妇女在与照料他人有关的所有社会活动中承担主要的责任。由于这样的活动一般不具经济目的,并通常没有市场关系的介入,所以直到最近这些活动仍然被认为不属于经济分析范围。但是,市场经济的运作涉及与非市场活动的一系列复杂的相互作用,本《概览》便试图阐明这一点。由谁负担养育孩子?如何再生劳动力并加以维持?以及社会如何扶持其被快速的经济变化和不幸事件抛下的成员?这一切都与性别化的、没有报酬的(非市场)活动有关,而这些活动又对有偿(市场)经济的运作产生重要作用。因此,尽管市场本身并不固有的性别特征,但是,市场却带有并传播家庭和总体社会所包含的两性之间的不平等。<sup>13</sup>

---

<sup>13</sup> 最近才开始对两性关系作经济学的分析。早在 1930 年代和 1950 年代,个别经济学家对“妇女问题”就有过辩论。但是,将两性关系看作可能与经济有联系的社会结构问题这一概念在 1970 年代初期才开始出现。详见 Beneria(1995 年)。

### C. 各章的内容

70. 第一章为以后各章关于全球化对两性的影响的讨论作出铺垫,其中描述了通常与经济范畴内的全球化有关的三个经济趋势:(a) 贸易自由化和贸易扩展;(b) 通过多国公司的国外直接投资在世界各地传布生产能力;(c) 金融自由化以及金融资本国际流动性的增加。

71. 第二章至第五章讨论了第一章中概述的趋势对不同性别造成的影响,其中分为以下三个题目:

- (a) 全球化产生的就业和失业影响(第二章);
- (b) 生产的国际化、工作的重新组织以及劳动力的灵活安排(第四和五章);
- (c) 公共政策环境的转变(第五章)。

72. 第二章着重于发展中国家,从性别问题的角度详细描述了随着全球化出现的经济趋势对就业和失业造成的影响的概况。第二章的后半部分讨论这些影响对世界各地妇女在家庭中和劳务市场上的相对地位产生的重要作用。

73. 第三章首先讨论了生产结构的重组如何导致了世界性产出结构变化以及灵活就业。该章随后着重描述了灵活的劳动力的各个主要形式——非全时制、非正规部门 and 在家工作,这些工作形式在过去 20 年中迅速发展。该章最后概述了国际流动劳动力的变化格局以及正在出现的移民劳工——又一种灵活的劳动力来源。

74. 第四章评价了市场自由化对不同性别产生的影响如何改变农村妇女的工作,该章着重探讨了生产中的男女分工,以及特别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和南亚私有化对妇女的土地产权及其使用权产生的影响。该章结尾部分概述了农村妇女如何应付市场自由化带来的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

75. 第五章解释为什么全球化往往会增加社会保护方面的要求,同时还会妨害国家提供这种保护的能力,并且对两性产生不同的影响。最后,第六章总结了《概览》中所讨论的劳动力市场的最新趋势,并且评价了这些趋势对两性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该章最后就在国家和国际各级制定考虑到性别因素的政策纲领提出了一些建议。

## 一. 贸易、资本和金融的全球化

76. 全球化的定义可以是:某些货物和劳务组合以及包括资本、劳工和金融资本在内的生产要素的跨国界流动的增加。在过去 100 年中,这四个类别中曾有一个或几个类别在不同阶段主宰了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趋势。

77. 就货物和服务而言,十九世纪末期的世界经济也许比今天的世界经济还要一体化。到 1890 年,贸易量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大约为:美国 5%、日本 12%、欧洲 17%。在美国和欧洲,贸易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达到了顶峰,随后在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间骤然下滑。后来,在 1950 年以后,贸易量大幅度增长,不过按上述标准衡量,现在这三个区域中无一显著地比 1800 年代末期更为开放。实际上,日本产出中的出口比例现在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还低。

78. 十九世纪末期,劳工大量跨界移徙。尤其是在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 40 年中,数百万欧洲移民使劳工队伍增加了 24%(Williamson, 1996 年)。

79. 在两次大战间隔期间,贸易量和移民数量减少,反映了跨国界经济交易量的下降。全球经济活动性质的一次重大转变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 1950 年代,贸易量开始加大。战后时期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外国直接投资在 1970 年代大幅度增加。在这十年中出现了在国外从事生产活动的多国公司,而以前时期的公司则仅是将产品销往国外。这一转变因对资本管制的放松以及对外国公司在发展中经济体业务活动所设限制的逐步减少而加快。新技术使运输和通讯费用降低,从而更加强了此一转变的势头。

80. 目前阶段自 1980 年代开始,由于实物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流动性,它与前期存在着实质上的不同。十九世纪技术进步改进了实物运输的手段并降低了其费用,从而促进了贸易,同样,现代计算机以及信息传送和电信系统的力量使得数据和金融指令能够在瞬间传送到遥远的地方,并在那里操作(Castells, 1993 年;Hamelink, 1997 年)。这种局面以及非国民参与国内金融市场所受控制的放宽使国际私人资本的流动量急剧增加。例如,在 1980 年代初,官方资本流动量占国际资本流动量的大部分,其主要形式是对政府的官方援助赠款和银行贷款。目前,它们所占份额小于私人资本数量,而且自 1980 年代初开始,其绝对价值和相对价值都出现下降。

81. 相比之下,私人资本流量在 1990 年代急剧增加。<sup>14</sup> 它们与新信息技术一道,是国际生产调整和世界就业转换的驱动力量之一。外国直接投资把生产能力引到了世界偏远地区,而金融投资则促进了生产活动的这一全球调整。

82. 现阶段的另一个独特的特点是,劳工流动性存在局限,尤其是与本世纪初相比。尽管存在明显的跨界移徙流动,而且在移徙人口中,妇女相对于男子的比例不断增加,但全世界范围的劳动人口基本上被局限在国界以内。<sup>15</sup> 在诸如欧洲联盟或海湾国家等少数国家中,有一小类跨国专业人员和工人的移民现象较为普遍。

83. 本章的其余部分叙述涉及下列方面的最新趋势(直至 1997 年世界市场爆发金融动荡为止):(a) 国际贸易的扩展,(b) 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动性以及生产能力在全世界

<sup>14</sup> 私人资本流动的期限各异。最长期的部分是外国直接投资,而涉及金融资产控股和短期银行贷款的(证券或金融)投资则是最短期的形式。

<sup>15</sup> 第三章最后一节讨论了国际劳工流动性的形态改变。

的扩散,以及最后(c) 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和金融资本的流动性。第五章论述了东亚危机及其所产生的性别方面的影响。

#### A.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贸易自由化和扩展

84. 以出口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来衡量,国际贸易流动量呈现全球化的趋势。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总产出中用于贸易的比例基本上有了稳步增加。在 1950 年至 1996 年间,世界出口量增加了 16 倍,而世界产出总量只增加了 6 倍。其中增长最快的产品类别是制成品。同样在这一类别中,出口增加速度也快于产生速度:在同一期间分别增加了 31 倍和 9 倍。目前,有将近 15%的世界产出用于出口,而 1950 年只有 7%。<sup>16</sup>

**图一. 1 1950-1996 年世界产出和商品出口的增长率**  
(年百分比-拟合对数线性趋势)

制成品

商品

<sup>16</sup> 1998 年 5 月 18 日《金融时报》。

85. 表一. 1 显示 1950 年以来总产量和制成品产出与出口的相对增长率。<sup>17</sup> 与进口增长相对应的是出口收益导致了进口的增加。由于出口收入的增加,进口货物和服务方面的开支在几乎所有国家中都有增加(贸发会议,1994 年 a)。

表一. 1

按主要产品类别分列的世界出口结构

贸易结构	按区域分列的比例(百分比)						按产品类别分列的比例(百分比)				
	共计			初级 a		制成品 b		初级 a		制成品 b	
国家	1975	1992	1995 <sup>d</sup>	1975	1992	1975	1992	1975	1992	1975	1992
世界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	55.8	72.4		42.0	55.4	84.4	77.7	25.4	18.6	73.0	78.8
东欧国家	9.0	2.6		8.2	5.1	8.8	1.6	37.1	48.5	56.5	45.7
亚洲社会主义国家	0.8	2.4		1.2	2.1	0.6	2.5	57.7	21.5	41.0	78.0
发展中国家	23.4	22.5	27.7	48.6	37.3	6.3	18.2	84.2	39.9	15.5	59.0
● 美洲	5.5	3.7	4.4	11.8	9.6	1.3	1.8	86.3	53.3	13.3	35.8
● 非洲	3.9	1.9	1.5	9.1	6.6	0.3	0.4	94.7	83.7	5.1	15.8
● 西亚	8.6	3.2	21.4	20.5	10.5	0.5	0.8	96.6	8.5	3.4	80.5
亚洲其它地区	5.2	13.4		6.9	10.1	4.1	14.7	53.8	18.2	45.5	80.5
最不发达国家	0.7	0.3		1.5	0.8	0.1	0.1	89.7	69.1	9.8	29.5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根据联合国统计司数据。

a 工贸分类 0 至 4 加 68。

b 工贸分类 5 至 8 减 68。

c 所列百分比相加不等于 100,这是因为剔除了未归类的出口(工贸分类 9)。

d 贸发会议(1998 年 a)。

86. 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市场中大致保持了它们的总体地位。按价值计算,它们在世界出口中所占的份额一直相当稳定:1992 年为 22.6%,而 1975 年为 23.4%。

87. 发展中国家在某些产品类别方面成绩卓著,但在另一些类别上却非常薄弱。制成品方面的成就最大。表一. 1 显示,发展中国家大大增加了其世界制成品出口总量中所占的比例,从 1975 年的 6.3% 上升 1992 年的 18.2%。电子部件和服装是发展中国家制成品出口中两个最重要而且增长最快的产品。它们在 1990-1991 年分别占发展中国家出口总额的 10% 和 6%。

<sup>17</sup> 由于现有数据不完整,服务贸易(包括运输和旅游业,但尤其是金融服务方面的贸易)方面的快速增长 并没有反映在图内。服务贸易占贸易总额的 20%(大约与商品贸易相同),而且现在是世界贸易中增长 最快的部分(贸发会议,1994)。

88. 但是,如表一. 1 所示,总体情况隐藏了产品类别及区域和国家类别两方面出口情况的巨大差异。出口市场,尤其是制成品方面的大部分成功是少数几个发展中国家所取得的。这些国家大多数在东亚,它们的出口收入非常高,而且经济增长速度极快,以致于它们基本上已经上升到中等收入或高收入国家类别。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的初级货物出口国在世界商品市场中则遭遇了悲惨的经历。它们出口的购买力出现下降,此外,如表一. 1 所显示,它们在世界初级产品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从 48.6% 下降到 37.3%。最不发达国家在世界出口总量中所占的份额下降了不止一半,从 1975 年的 0.7% 下降到 1992 年的 0.3%(贸发会议,1995 年),这主要反映了撒哈拉以南非洲贸易情况的恶化。在同一时期,非洲国家的初级货物在出口总量中所占的份额总体上略有下降,从 94.7% 下降到 83.7%。

## B. 实物资本和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动性

89. 全球化趋势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通过外国直接投资来向境外扩大企业的组织、生产和销售作业。在扩大外国直接投资总量的过程中,从定义上讲从事跨国经营的那些多国公司益于两种因素:(a) 运输和通讯方面的革新,以及(b) 实物资本和金融资本流动方面的规则和限制的放松。到 1990 年,世界总产量的 16% 是由非在本国经营的公司生产的。这比 1977 年增加了 40%(Lipsey,1998 年)。制造部门是国际生产中最大的一个组成部分。

90. 尽管外国直接投资有着很长的历史,但自从 1980 年代以来,它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已经加大。在 1985 年至 1992 年期间,发展中国家外国直接投资相对于固定资本总量的比例从 2% 增至 7%(贸发会议,1996 年)。目前它是有价证券投资价值的两倍多,总计达发展中国家所获外部资金总数的 40%(外国投资咨询服务,1998 年 b)。

91. 作为实际资本流动性相对增长的一个指数,从 1983 年到 1989 年,全世界的外国直接投资增长了 30%,而出口只增长了 10%。这一期间大约 80% 资金流动发生在发达经济体之间(Zysman,1996 年)。然而,由于发展中经济体的规模很小,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对其经济产生的影响相对较大。此外,自 1980 年代初期以来,流入发展中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出现了大幅度增加。表一. 2 显示了世界各地外国直接投资业务的规模以及它们在 1990 年代的迅速增长。

表一.2

外国直接投资业务的规模和增长率:外国直接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  
(百分比)

区域/经济体	1980	1985	1990	1995	1996
<b>发达国家</b>					
流入	3.8	4.9	6.6	9.1	7.6
流出	5.2	5.9	7.8	11.5	10.1
<b>外国直接投资共计</b>	<b>9.0</b>	<b>10.8</b>	<b>14.4</b>	<b>20.6</b>	<b>17.7</b>
<b>发展中国家或地区</b>					
流入	4.3	8.2	8.5	15.4	15.6
流出	0.6	1.2	1.8	4.5	4.9
<b>外国直接投资共计</b>	<b>4.9</b>	<b>9.4</b>	<b>10.3</b>	<b>19.9</b>	<b>20.5</b>
<b>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b>					
流入	4.0	7.8	13.5	16.8	21.8
流出	0.1	3.3	6.6	7.2	8.2
<b>外国直接投资共计</b>	<b>4.1</b>	<b>11.1</b>	<b>20.1</b>	<b>24.0</b>	<b>30.0</b>
安哥拉	1.7	11.1	13.2	33.6	59.8
博茨瓦纳	15.5	35.1	21.7	16.5	32.8
加纳	1.5	4.3	5.1	15.8	15.3
肯尼亚	4.8	7.1	7.3	7.7	7.7
毛里求斯	1.8	3.5	6.4	6.3	6.6
尼日利亚	2.6	5.5	24.9	22.7	39.9
津巴布韦	-	0.5	0.9	1.1	7.7
<b>南美洲</b>					
流入	5.8	8.9	8.6	14.3	13.8
流出	0.2	0.5	0.6	1.2	1.2
<b>外国直接投资共计</b>	<b>6.0</b>	<b>9.4</b>	<b>9.2</b>	<b>15.5</b>	<b>15.0</b>
巴西	6.9	11.3	8.5	17.8	14.2
智利	3.2	14.1	33.1	23.1	27.3
<b>加勒比和中美洲</b>					
流入	7.7	14.5	18.4	33.1	29.7
流出	0.8	2.1	2.5	3.3	2.5
<b>外国直接投资共计</b>	<b>8.5</b>	<b>16.6</b>	<b>20.9</b>	<b>36.4</b>	<b>32.2</b>

区域/经济体	1980	1985	1990	1995	1996
哥斯达黎加	13.9	24.4	25.3	30.2	35.5
多米尼加共和国	3.6	5.2	8.1	11.8	17.3
海地	5.7	5.6	5.6	5.7	5.0
牙买加	18.7	22.7	16.2	31.3	35.4
墨西哥	4.2	10.2	13.2	25.6	22.3
<b>南亚、东亚和东南亚</b>					
流入	3.8	6.6	8.8	15.1	15.8
流出	1.3	1.4	2.7	7.0	8.1
<b>外国直接投资共计</b>	<b>5.1</b>	<b>8.0</b>	<b>11.5</b>	<b>22.1</b>	<b>23.9</b>
孟加拉国	0.4	0.7	0.7	0.6	0.7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a	6.3	10.5	17.9	22.7	15.7
印度	0.7	0.5	0.5	1.9	2.6
大韩民国	1.8	1.9	2.3	2.3	2.6
新加坡	52.9	73.6	76.3	67.4	72.4
中国台湾省	5.8	4.7	6.1	7.3	7.3
越南	-	0.2	3.3	31.9	40.2
<b>中欧和东欧</b>					
流入	-	-	0.1	4.9	5.9
流出	-	-	-	0.3	0.4
<b>外国直接投资共计</b>	<b>-</b>	<b>-</b>	<b>0.1</b>	<b>5.2</b>	<b>6.3</b>
匈牙利	-	-	2.0	31.5	33.2
<b>最不发达国家</b>					
流入	1.8	3.4	3.9	5.2	6.1
流出	0.1	0.4	0.4	0.4	0.3
<b>外国直接投资共计</b>	<b>1.9</b>	<b>3.8</b>	<b>4.3</b>	<b>5.6</b>	<b>6.4</b>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1998年b;1995年的数字见:贸发会议,1997年b。

a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92. 该表编列了 1980 年至 1996 年期间外国直接投资累计资本在有关经济体规模(以国内生产总值表示)中所占的比例。“流入”资本项目指的是所有投资流入该国的累计价值,也即外国商户在该国境内所拥有的全部资本的价值。“流出”资本项目指的是该国或该区域的国民在国外所从事的投资。所列的数据分别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整体以及低收入最不发达国家分组的合计数。此外还为一些发展中区域编列了国别数据。<sup>18</sup>

93. 表一. 2 内数据显示,在 1980 年至 1996 年的 16 年期间,实物资本的流动性大大增加,显示多国公司目前在决定往何处搬迁其生产设施方面有着更大的选择余地。相比之下,在同一时期,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完全没有放松,甚至还有加强。在流动性方面的这一不平衡现象对于公司和个人在彼此之间以及与政府关系上的讨价还价能力产生了重要影响。<sup>19</sup>

94. 如该表部分显示的那样,在外国直接投资流动方面存在下列突出特征:

(a) 从累计来看,发达国家是外国直接投资的净输出国,而发展中国家则是净输入国。然而,在发达国家,外国直接投资的规模是相当大的,一些发达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外国直接投资的净接受国(如荷兰和大布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但作为一个整体,它们是资本的净供应国;

(b) 正象 1990 年至 1997 年期间出现的显著增加所显示的那样(见图一. 2),这一期间的流动外国直接投资的流量迅速增加。在 1980 年至 1997 年期间,发展中国家中的外国直接投资增长数量比发达经济体要大。在这一期间,外国直接投资总量在发达经济体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大致增加了一倍,亚洲、加勒比和中美洲等区域将近增加了六倍;

(c) 各个国家在所获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动资金数量方面有着很大差异。区域和收入程度平均数掩盖了很大的差异。例如,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大多数外国直接投资流动只涉及少数几个国家(即安哥拉、博茨瓦纳、加纳和尼日利亚)的采矿项目。除了南非和肯尼亚等几个国家或地区外,其他国家所得到的外国直接投资极少。同样,在亚洲,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新加坡的外国直接投资数目非常高,而象孟加拉国、印度和大韩民国等其他国家或地区得到的投资非常少。在转型期经济体及其各自的区域中,匈牙利和越南是明显的主要接受国;

(d) 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发展中国家通常导致“大篷车”效应。资本的流动基本上是朝向有选择的地方,完全绕开了许多国家。在 1997 年,10 个国家吸引了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大约 75%。在目前所优先选择的对象中,中国在绝对数量上甚至相对国民收入而言,都是吸收投资最多的国家(ODI,1997 年)。<sup>20</sup> 资源贫乏

<sup>18</sup> 表一.2 还编列了关于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数据,其定义为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和流出总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从而以此衡量实际资本的流动性。这一指示数很重要,因为它表明各公司在国内费用出现变动或当地出现会影响利润的其他状况时迁往他国的能力。

<sup>19</sup> 第五章论述了劳工市场中讨价还价能力的此一调整所涉及的性别方面的广泛影响。

<sup>20</sup> 1994 年和 1995 年,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6.5%。也许多达 50% 的外国直接投资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此投资的很大一部分并不真正是外国的,而来自中国,

和收入最低的国家则处于另一个极端。从绝对价值和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比例来看,它们所得到的外国直接投资最少;

(e) 在所有外国直接投资中,大部分(60%-70%)传统上是在劳工密集性工业(纺织和服装、工程和电子),其劳动力主要是女性。但是,特别是在一些亚洲国家中,这种情况出现了改变,转而偏向高技术、更加资本密集性的作业(外国投资咨询服务,1998年 a;Kasugo 和 Tzannatos,1998 年;Parisotto,1993 年)。

95. 外国直接投资常常是——但并不总是——金融资本流动的促进因素。一个外国投资者投入外国直接投资能够导致银行贷款以支持进一步的投资以及提供贸易信贷来资助出口(贸发会议,1996 年)。由于外国直接投资就其实质而言,意味着长期的投入,它的存在可以推动稳定,促进潜在投资者对有关经济的信心。

## 图一. 2 按类别分列的 1990 年和 1997 年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净额

---

并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回到中国,以便利用给予外国直接投资的特别优惠规定。见贸发会议,1997 年,英文第 51 页。

### C. 金融自由化和证券投资

96. 目前的全球化趋势不同于以往趋势的最重要的一点是资金流动的迅速增长。最近放开对非国民参与当地金融市场的管制是扩大国际金融流动的一个重要因素。1983年,在发展中国家几乎不存在纯粹的证券投资,但是到1993年,这一数目已经增加到每年500亿美元,到1995年增至1500亿美元。流入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区域的总体数量增加得更快,从1980年代中期到1994年增加了1200%(Eichengreen和Mussa,1998年)。

97. 过去,国际金融交易几乎总是同贸易信贷、保险单和汇款形式的贸易流动相联系。但这种情况已不复存在。债务、证券、债券、货币、期货合同和其他形式派生金融手段现在都在国际上交易,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完全独立于货物贸易。一些形式的金融交易,尤其是外国投资,现在导致出现其他的交易,例如利润汇兑和追加投资贷款,导致金融交易直线上升(贸发会议,1996年和1997年)。此外,越来越多的短期投资是出于想在货币和金融市场中获取投机利润的动机而流动的,这使它获得了“游资”的绰号(Griffith-Jones和Stallings,1995年)。

### 图一.3 1997年长期资源流动净额的区域分配情况

98. 自 1980 年代中期以来,国际金融交易的增长速度尤其迅速。出现了三大趋势:

(a) 在 1980 年代初期之前,官方资本流动数量占国际资本流动量的主要部分,主要形式为向政府提供的官方援助赠款和银行贷款。80 年代初期的债务危机几乎完全与国家债务有关,也就是政府的借贷。但是,官方流动资本现在比私人流动资本的价值要少。非洲是唯一一个官方资金流入数量仍大于私人资本流量的区域。但其实际数量正在下降,与 1990 年数字相比,1997 年的数字下降了四分之一。<sup>21</sup>

(b) 与外国直接投资一样,资金流动也是高度集中而且不平衡的,它倾向于把金融投资建立在“最佳”之上。证券投资的四分之三以上都流入了常常被称为“新兴市场”的区区 10 个国家;

(c) 虽然外国直接投资是私人流动资金的最大来源,但短期流动资金则以更快的速度增加。在 1990 年到 1995 年期间,“南方”的证券流动数量从 32 亿美元增加到 450 亿美元,这是由于一些发展中经济体开放了它们的证券市场,放松了对其金融系统的管制。

99. 正如第五章所讨论的那样,短期的证券投资可以是非常易变的。如最近的东亚危机明确显示的那样,金融市场中必然存在的“群聚”行为倾向有可能导致市场情绪的剧烈波动,引起私人资本流向的突然和急剧逆转。<sup>22</sup>

100. 以下各章从下列方面讨论了与全球化相关的这三个过程(贸易扩展、外国直接投资流动和金融自由化)对性别方面的影响:(a) 就业和失业影响(第二章);(b) 重新安排生产和工作的转变(第三和第四章),(c) 公共政策环境的转变(第五章)。

---

<sup>21</sup> 《金融时报》1998 年 8 月 15/16 日。

<sup>22</sup> 1997 年,从整个亚洲区域流出的私人资金净额大约为 200 亿美元,而 1995 年则净流入大约 700 亿美元,1996 年流入约 800 亿美元(发展研究观察,1998 年)。

## 二. 就业和全球化的迁移效应

101. 如图二.1 所示,妇女越来越多地参加有报酬的工作在全世界都是现实。<sup>23</sup>这种情况不仅在世界几乎所有区域都有增加,而且还带动了近年来的总体就业增长。实际上,1980 年以来,妇女就业比男子就业增长快得多(劳工组织,1998 年),只有非洲是个例外。男劳动力参与率停滞不前(或略有下降),因此许多区域男女劳动力参与率之间的差别已大大缩小。

### 图二.1 20 至 54 岁年龄组妇女活动率,1950 年至 2010 年

**资料来源:** 劳工组织,1996 年 a;统计局估计数。

102. 在经合组织国家,妇女进入劳动力队伍最为明显的是在荷兰和西班牙等国。1980 年代初期,这些国家的妇女在劳动力中并不活跃。在加拿大、美利坚合众国和斯堪的那维亚国家,妇女现在占从事经济活动人口将近一半,在核心年龄组的活动率超过 70%。在发展中国家,妇女劳动力参与率也一直在上升,目前已大大超过 60%。在大多数中东国家,妇女参与经济活动率仍然较低。<sup>24</sup>然而,发展中国家参与农村和城市非正规经济部门经济活动的妇女通常未得到充分计算。尽管如此,一般趋势似乎

<sup>23</sup> 20-54 岁年龄组妇女总体经济活动率现在接近 70%,而在 1950 年仅略高于 50%(劳工组织,1996 年 a)。

<sup>24</sup> 中东阿拉伯国家妇女参与劳动力的水平最低。然而,过去几十年,这一类国家妇女就业比例也在增加,从 1970 年的 22%增加到 1995 年的 27%。埃及和黎巴嫩从事经济活动妇女的比率最高,海湾国家最低。

不会错:发展中国家妇女参与有报酬就业的情况也在稳步增加。人们认为,全球化和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释放出了的经济力量,其影响在这一上升趋势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无疑,还有其他重要因素。其中包括妇女受教育水平长期不断提高,生育率下降,保健服务改善,以及不断变化的生活方式和态度。然而,与上述大多数因素密切相关的一国社会发展指标的普遍改善同妇女劳动力参与率并非直接关联。<sup>25</sup>鉴于其复杂性,这里重点相当突出,仅限于可以直接归因于以下方面的就业效应(a) 贸易扩展和外国直接投资和(b) 不断变化的产出结构和生产重组。<sup>26</sup>前者是本章的主题,而后者是下一章的主题。对于前者,发展中国家的数字比发达国家明显,对于后者,情况恰恰相反。本章末尾评估了有报酬就业在家庭和劳动力市场对妇女相对于男子地位的影响,并且审查了最近男女工资差别和男女职业隔离发生变化的证据。

## A. 就业效应

### 1. 制造业部门

103. 新兴工业化国家制造业生产十分注重出口。在这些国家中,女工在这些行业中的比例大幅度增加。确实,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不是靠女工来增加制造业出口的。全球化情况下的工业化是出口带动的,也是妇女带动的。人们迄今认为这是一个不变的事实(Standing,1989年,1998年;Joekes,1982年;Pearson,1992年;Tomoda,1995年)。

104. 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面向出口的就业效应一直是妇女参与货币经济的转折点。例如,1978年,孟加拉国只有四家服装厂。到1995年,该国有2400家,雇用了120万工人。其中90%是25岁以下的妇女(Amin和其他,1998年)。该部门雇用了该国70%的领工资就业妇女(Bhattacharya,1997年)。虽然孟加拉国可能是个极端的例子,但在许多国家或地区,出口制造能力和妇女在制造业劳动力中的份额也曾急剧增加。多米尼加共和国、印度尼西亚、毛里求斯、菲律宾、大韩民国、中国台湾省和突尼斯就是这样的例子。总之,出口越是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品,例如服装、半导体、玩具、体育用品和鞋类,那么女工的比例往往就越高(劳工组织/跨国公司中心,1988年)。此外,对于出口部门相同产品类别,外资公司女工比例似乎较高(Foreign Intelligence Advisory Service,1998年a)。

105. 然而,1980年代末以来,由于出口生产变得更加技能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许多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制造业对妇女劳动力的需求一直在减弱。例如,波多黎各,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省就是这种情况(Acevado,1990年;Berik,1995年;Joekes和Weston,1994

<sup>25</sup> 有证据表明,经济发展首先减少妇女有报酬的就业,然后再增加。经济发展中非农业妇女劳动力参与之间的关系是U字形(Schuite,1990年工发组织1993年,Cagatay和Ozler,1995年)。又见Erturk和Cagatay1995年关于这些长期趋势与较短期周期变量相关作用的讨论。

<sup>26</sup> 与金融自由化相关的就业效应在第五章中单独讨论。

年)。大韩民国也是如此,电子行业劳动力的构成已向男工倾斜,因为该部门的生产已转向较精密的通讯和电脑产品(Kim 和 Kim,1995 年)。同样,在墨西哥的出口加工区,女工比例从 1982 年的 77%降到 1990 年的 60%以下(Shaiken,1993 年)。这些趋势显示,世界各地妇女在制造业就业方面的增加不会持续很长时间。

## 2. 外国直接投资和出口加工区

106. 准确评估上述效应不大容易(Ward 和 Pyle,1995 年),因为现在越来越盛行通过当地中介机构与特定多国公司直接联系的分包作法,弱化了外国所有制和本国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此外,还可以提出一些数字,说明多国公司的直接就业效应大小的一般情况。在发展中国家,多国公司就业估计大约为 2 600 万人或 2 700 万人(贸发会议,1994 年;外国投资咨询处,1998 年 a;劳工组织,1998 年)。<sup>27</sup>1975 年到 1986 年,多国公司就业以每年 9%的速度迅速增长。1986 年到 1990 年,速度更快,每年为 14%(外国投资咨询处,1998 年 a)。尽管稳步增加,在大多数国家,外国直接投资就业在整个就业中仍然无足轻重。总体上看,只占发展中国家工资就业总数的 2%(外国投资咨询处,1998 年 a)。但是在一些国家,多国公司是主要的雇主:1985 年,加纳和突尼斯在外资下属公司就业人员的比例大约占有所有雇员的 50%,在阿根廷、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占 20%以上(外国投资咨询处,1998 年 a)。

107. 人们广泛研究了同出口加工区相关的外国直接投资按性别区分的就业影响。在这些发展中国家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和创造就业而建立的特别工业区,出口生产商和多国公司不受许多行政和财政规定以及保护工人法定规定的管束。一些国家甚至为出口加工区颁布特别劳工法,对劳工组织建立起比在国内经济情况下更难以克服的障碍<sup>28</sup>(Nam,1994 年)。现在 93 个发展中国家有出口加工区,而 1976 年只有 24 个国家有出口加工区(外国投资咨询处,1998 年 a)。<sup>29</sup>

<sup>27</sup> 这个总数不包括分包供应商和个人承包家庭工人间接创造的就业机会。

<sup>28</sup> 然而,这并不是说可以认为出口加工区的女工就不能组织起来;见方框二.1。

<sup>29</sup> 出口加工区的规模以及在整个出口制造业生产中的重要性如何,各国各不相同。在东亚大型出口经济中,只有新加坡有一个大型出口加工区(与其高额外国直接投资相符)。出口加工区 48%在拉丁美洲,42%在亚洲(不包括中国)。在中国,“经济特区”雇员人数(在 1400 万至 4000 万之间),远远超过出口区 200 万职工的水平。经济特区对于出口也给予优惠待遇,但规模和范围比出口加工区大得多,并同住宅和基础设施投资相融合(外国投资咨询处,1998 年 a)。

**表二.1** 出口加工区妇女就业情况

A. 若干亚洲国家出口加工区和非出口加工制造业妇女就业份额  
(百分比)

		整个经济	出口加工区	非出口加工制造业
马来西亚	1980	33.4	75.0	35.6
	1990	35.5	53.5	47.2
菲律宾	1980	37.1	74.0	未提供
	1994	36.5	73.9	45.2
大韩民国	1987	40.4	77.0	41.7
	1990	40.8	70.1	42.1
斯里兰卡	1981	36.0	86.3	29.8
	1992	46.4	84.8	46.0

资料来源: Kusago 和 Tzannatos,1998 年。

B. 若干中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出口加工区妇女就业总数和所占份额

国名	工厂数	纺织和服装业工人(百分比)	就业总数	妇女份额(百分比)
哥斯达黎加	250	70	50 000	65
多米尼加共和国	469	65	165 571	60
萨尔瓦多	208	69	50 000	78
危地马拉	481	80	165 945	80
洪都拉斯	155	95	61 162	78
尼加拉瓜	18	89	7 553	80
巴拿马	6	100	1 200	95

资料来源: Daeren,1997 年。

108. 表二.1 的上半部分显示,在亚洲五个主要出口国,妇女就业在出口加工区就业总数中比在整个制造业就业总数中占的比例大。然而,由于上文提到的制造业部门向劳动密集程度较低的活动转移,一般导致一些国家出口加工区劳动力中妇女的比例急剧下降(Joekes,1995 年)。

109. 出口加工区出口制造业妇女比例的总趋势似乎是达到高峰然后下降(劳工组织/跨国公司中心,1988 年)。同这一下降相关的是 (a) 出口产品混合多样化,倾向于增值较高、技术要求更高的产品类别, (b) 生产技术资本密集程度越来越高。似乎随着就业和工资的提高,妇女往往被排除在外。妇女的状况最终可能与 1980 年代之前面向

内销行业先前男子为主的就业模式相同,在高技术、资本密集型经营中职业的性别陈见很强。

### 方案框二.1

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斯里兰卡出口加工区中女工组织工会问题

出口加工区中雇用的主要是年轻和单身妇女,大多数来自农村地区,很少有雇佣就业的经历。她们对于工会和组织工会的作用往往知之甚少。然而,尽管有这些障碍,出口加工区女工中的工会活动一直很多。

在马来西亚,1971年第一个出口加工区建立以来,一直有自发罢工和组织工会的活动。1978年在大型纺织厂组织工会取得一些成功之后,1988年允许85 000名电子业工人组织内部工会。到1990年,马来西亚工会大会在大多数出口加工区都很活跃。虽然不能进行集体议价,但该机构能够协调私营部门工会,提供法律咨询,并帮助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妇女团体从1980年代初期以来在工会大会中一直很活跃,向女工提供法律帮助和开办培养当众讲话和领导技能的课程。其他社区组织,例如Teneganita妇女劳动力行动小组,也提供有关合法权利教育、打字、缝纫和当众讲话等技能的课程。

菲律宾有三个出口加工区。仅在Bataan出口加工区,到1983年就成立了41个工会组织,覆盖该区89%的企业。1980年代初成立的一个劳工联合会到八十年代末已有500 000名成员,30%的领导人是妇女。

然而,在斯里兰卡,尽管妇女有权组织起来,但工会活动仅限于现有两个出口加工区。八十年代,在这些出口加工区,各种妇女团体通过以社区为基础的组织同工人进行接触,并为教育女工成立了几个中心。

资料来源:Kumudhini,1994年。

### 3. 服务部门

110. 国际金融服务部门迅速扩张,似乎也雇用了很大比例的女工。就本部门低技能的工作而言,例如数据输入,情况似乎确实如此。至少从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数据依赖型服务公司,例如信用卡提供者、邮购商、航空和铁路系统,已经把交易数据送到国外处理。现已确立的这种商业中心是加勒比地区(巴巴多斯和牙买加,该地区有一个电子信息出口加工区,称为Digiport)和一些亚洲国家(中国、印度、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一般说来,这些公司的劳动力中女工比例至少同出口制造业部门一样高,而在加勒比地区,几乎全是女工。

111. 其他定制、高技能商业服务,例如软件设计、计算机编程和金融服务(银行业和保险业),也越来越多地迁到发展中国家,雇用妇女的比例较高,甚至等级也较高(Mitter和Rowbotham,1995年;Pearson和Mitter,1993年;Joekes,1995年)。然而,该部门此种类型的就业没有足够的综合数据证明其在全世界的重要性或趋势。

112.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除了面向出口的制造业,在服务部门(旅游业、金融业和信息处理)与贸易有关的就业也一直在增加。例如,在泰国,旅游业到1982年已成为最大的外汇赚取行业;到1990年,旅游业占出口总值的7%(Bell,1991年)。旅游部门很大

比例的收入来自色情业,尽管难以获得准确数据。色情业主要雇用妇女(Lim,1998年)。

#### 4. 非正规经济部门

113. 人们认为,在正规经济部门中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创造每一份工作的同时,在非正规经济部门内也创造出几个就业机会。全国性数据显示,一般说来,这个部门妇女就业的比例比正规经济部门高,甚至最劳动密集性的部门也是如此(Chen 和其他,1998年)。甚至在拥有相对发达的现代部门的国家中,女工在非正规经济部门中也占很大比例。例如,在大韩民国,这个数字是 43%,在印度尼西亚是 79%(世界银行,1995年)。

114. 这个乘数效应的规模也许相当大,但是对于同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创造的正规经济部门就业相关的非正规经济部门就业机会的数目,还没有一个全球估计数。如第三章所述,近年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非正规经济部门的就业机会是新的就业机会增长越来越重要的来源,特别是对妇女而言。人们现在更清楚地认识到非正规经济部门在发展中国家整个经济活动中的巨大相对规模(Mead,1998年;Charmes,1998年a)。

#### 5. 农业

115. 市场自由化和在农业方面鼓励种植出口作物,在发展中国家一般都伴随着贸易自由化,对于就业的影响很难说清楚。<sup>30</sup>例如,在拉丁美洲,出口作物的扩大实际上使妇女从长年农业就业转到季节性就业(粮农组织,1990年)。妇女失去了维持生计的土地,但是能够在农业出口领域手工劳动繁重的低收入工作中更容易找到季节性工作在巴西、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尼加拉瓜是收获咖啡、棉花和烟草;在墨西哥是种植草莓,在巴西是种植花生,在智利是种植水果,在哥伦比亚是培养鲜花(León,1987年)。同样在加勒比地区,种植非传统出口作物为妇女提供了低收入就业机会,但是同时却影响了为当地市场生产粮食。这可能对妇女产生过大的影响,因为妇女传统上一直是当地市场粮食的生产者和销售者(Antobus,1995年)。

116. 农业部门并非所有发展变化都符合这种模式。肯尼亚、乌干达和津巴布韦已使其商品出口多样化,包括了非传统的农业出口,近年来这方面出口收益增长迅速。在非传统农业出口部门生产和就业往往以准行业大规模企业的形式进行组织。妇女通常占本部门劳动力的绝大多数(90%以上),不仅是在肯尼亚,在其他非洲国家也是如此。妇女的劳动所得是现金,与家庭农场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不过,就小型农场而言,妇女掌管的非传统农业出口方面的收入比妇女在生产方面的劳动力投入小得多。

117. 非传统农业生产在拉丁美洲国家也主要依赖妇女劳动力,特别是在该部门完全确立的哥伦比亚和墨西哥。在这些国家,同利润相比工资仍然很低,职业危害可能很严重,两性之间的不平等也很明显(Thrupp 和其他,1995年)。最近对危地马拉若干贫困社区开始种植一些非传统作物进行了研究,发现男子同妇女共同分担工作,但不同妇女分享销售收入,男子占有的比例极大(Carletto,1998年)。

---

<sup>30</sup> 第四章讨论了农业商品化和市场自由化的广泛影响。

118. 在位于世界另一个地区的泰国,我们可以看到农业市场自由化创造新就业机会的另一个实例。妇女开始同多国公司签订分包合同,在家庭拥有的先前种植水稻的土地上生产玉米笋和芦笋。这些妇女是首次获得现金收入,而先前种植水稻投入长时间的繁重劳动却得不到报酬。同样,泰国南部妇女同外国公司签订合同养虾,在较短的工作日里能够获得比种水稻更多的收入。然而,许多研究者对这种工作能否持久提出疑问,并提请注意这样做对环境的有害影响、对健康的危害和市场波动问题(Stephens,1995年)。

## B. 迁移效应

119. 鉴于妇女在发达国家轻工制造业中人数过多,预期妇女在制造业就业中所占比例可能由于贸易自由化而降低,原因是发展中国家这种货物的出口增加了。然而,这种影响的证据十分有限,有时自相矛盾。例如,一些研究显示,随着同中国贸易逆差的增长,美国纺织业妇女就业受到不利影响。不过,没有什么系统的证据显示,工业化国家妇女在制造业的就业总体上下降了(Wood,1994年)。<sup>31</sup>缺乏这种证据的原因可能是:(a) 妇女的技能情况也许使她们比男子更易于被新创造的制造业吸收就业(Dean,1991年);(b) 在男子占主要地位的资本密集型和技能密集型行业中,由于贸易和生产率提高得更快,就业机会减少的速度也更快(Howes和Singh,1995年)。

120. 贸易自由化还导致发展中国家就业机会的减少,而且对于男女两性后果各不相同。来自低成本亚洲生产商更大的竞争造成某些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行业工人的迁移,主要是在非洲(Biggs和Srivastava,1996年)。例如,随着贸易自由化,1990年代中期,津巴布韦的纺织、服装和制鞋业产出和就业机会减少了。虽然这些部门的公司中男子占大多数,但是女工和男工都被迫迁移(Carmody,1997年)。一般说来,这些迁移者的两性比例取决于贸易自由化之前男女的就业比例,国与国各不相同(Fontana和其他,1998年)。但是总体上看,从1980年到1990年,妇女在非洲制造业中的就业没有增加(Mehra和Gannage,1999年)。在印度尼西亚(Evers,1994年)和斯里兰卡(Jayaweera和其他,1989年),由于1980年代的贸易自由化,手工织布行业的就业机会也减少了。

121. 如果说出口扩张对非正规经济部门妇女就业有正乘数效应,那么对于进口扩张来说情况恰恰相反。进口扩张的直接影响是负值的。本国生产商的市场份额输给了比较便宜的进口商品,结果造成就业机会减少。进口货物在非正规经济部门造成妇女不成比例地迁移,因为(a) 女工比男工多,(b) 作为小企业家,妇女面对更激烈的竞争,可能不具备进行生产活动升级的条件。

122. 例如,肯尼亚的一些个案研究描述了编织篮子的妇女如何由于消费者转向从东亚进口的大规模生产替代品而丧失就业和生计的(Joekes和Weston,1994年)。在大多数采取贸易开放政策的发展中国家,据信这种负就业效应相当严重。然而,与正就业效应不同,负效应未经深入研究,所以不清楚其确切的规模。

<sup>31</sup> 然而,Kucera和Milberg最近的研究(1999年)显示,经合组织在许多国家,从1978年到1995年与发展中国家贸易的扩张导致就业下降,妇女受到的影响大得不成比例。

## C. 评估全球化的就业效应

### 1. 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

123. 人们一般认为,有报酬的就业能够提高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由于对家庭的定义不同,经济学家对于有报酬就业如何提高妇女地位的解释也不相同。其中一种解释是,户主是一位仁善的男子,他在人力资本投资方面能作出明智的决定。<sup>32</sup>妇女有报酬就业的情况改变了他对妇女价值的看法,使他认识到投资与妇女人力资本带来的回报。户主便因此调整家庭支出模式,在妇女和女童保健和教育上花更多的钱。根据这一设想,妇女的社会地位最终取决于男子是否能认识到妇女赚取收入的能力。

124. 另一方面,家庭被看作(Sen,1990 年)一个合作社,同时被看成是一个角斗场,男子和妇女在这里讨价还价。妇女有报酬就业的增加据认为调整了家庭内部的力量平衡。通过带给家里现金收入,妇女在有关消费和人力资本投资的家庭支出决定方面获得了更大的发言权。结果,由于用于妇女(和女孩)福利和赚取收入能力的家庭支出比例比过去增加了。根据这种看法,妇女离开其丈夫独立生活的实际可能性越大,她们在家里的讨价还价能力便越强。

125. 不过,实际上,有报酬就业并不总意味着授予妇女权利。例如,青年妇女占出口加工区劳动力的大多数,但是她们不能控制自己的收入,这并非罕见。她们中许多人要把工资的很大一部分寄给老家的父母。在那里,这些收入有时被用来巩固男女之间的不平等,例如,用于供弟弟接受较多的教育(Wolf,1992 年;Sainbury,1997 年)。同样,对于前面提到的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服装部门工厂女工进行的研究显示,接近半数妇女要把收入交给丈夫或其家庭的其他男性成员(Hafeez,1989 年;Zohir 和 Paul-Majumder,1996 年)。在另外一些情况下,特别是农村地区,女工是通过男性劳工代理人(她们的父亲或第三方)雇用的,工资要交给他们。在印度尼西亚和突尼斯农村地区常常是这种情况。对于世界各地各种国家进行时间分配的研究显示,妇女的家务负担和照顾孩子的主要责任并没有随着更多地参加有报酬工作而减少(开发计划署,1995 年)。因此,有报酬就业在许多情况下给大多数妇女造成一种繁重的“双份工作”。有时,妇女开始自己赚取收入之后,男子,特别是孩子的父亲给她们的非市场来源的收入可能会相应减少(Elson,1999 年)。

126. 然后,还有迹象表明,有报酬就业在许多社会中也许会逐渐削弱传统的性别价值观念。与制造业之外没有技能的男子相比,现代出口部门工厂女工的收入较高,似乎使妇女的地位提高了,而且增加了她们在家庭范围内的决策权(Tiano 和 Fiala,1991 年)。即使在出口加工区工作的青年妇女必须把工资寄回家,据报导她们也能够积累存款,改善未来的个人前景。更重要的是,由于赚取工资的就业机会,不同国家的许多女工感到有更强的自尊和更广阔的生活选择余地(Tiano 和 Fiala,1991 年;Amin 和其他,1998 年)。例如,据报导,上述孟加拉国的服装工人对于随着赚取工资而来的新的自由认识得相当清楚(Amin 和其他,1998 年)。由于有独立的收入来源,她们能够摆脱无法忍受的婚姻,以较好的条件再嫁,或与自己的孩子一起生活。在男女等级森严的社会中,所有这些都是妇女前所未有的自由(Kabeer,1995 年)。同样,菲律宾和泰国的

<sup>32</sup> 对家庭的这种看法是根据 Becker(1965 年)的看法,他假定家庭户主是男性,而且仁善。从那时以来,他的假定一直受到女权主义经济学家的广泛批评。

年轻女工似乎也在某种程度上摆脱家务劳动,而先前只有她们的兄弟享受此种不做家务的自由(Sainsbury, 1997 年)。此外在出口制造业工作的青年妇女推迟结婚,这也许是为了抵制“双份工作日”。而双份工作日是许多妇女婚姻生活的标志(Amin 和其他,1998 年)。

## 2. 工作条件

127. 发展中国家面向出口行业近期妇女就业的增加主要涉及低质量工作。<sup>33</sup>消极因素、低工资和政治上顺从似乎是这些行业比较偏爱妇女劳动力的主要原因。工作时间长,宿舍居住条件拥挤,工作时受到极其严格的监督(上班不准说话,只有很短的工间休息,上厕所次数受到限制)上班赶路时间长,这些都是常见的情况。在当地较小的企业里,就业条件一般比多国公司和出口加工区更差(劳工组织,1998 年;Lim,1990 年)。在国内和外资公司里,劳动力更替率通常极高。青年妇女受雇时只有很少或没有就业培训,并且一怀孕或结婚便被解职了。因为随时有替代的妇女劳动力,雇主一般很少感到有压力要改善其工人的就业条件。

128. 人们认为,1980 年代的结构调整方案和其他紧缩时期促成寻求有报酬工作妇女的突然增加。由于男性就业水平和家庭收入水平下降,这些政策实际上把大量妇女赶进劳动力市场(Beneria,1992 年)。妇女劳动力的迅猛增加压制了实际工资,并且导致工作条件进一步恶化。找不到工厂工作的妇女不得不在非正规经济部门找工作,而且条件更差(Moser,1997 年)。因此,出口部门工厂的就业(即使是小企业)尽管条件极其恶劣,但似乎仍然优于妇女的其他选择(Van Diermen,1997 年)。

## 3. 男女工资差别

129. 男女工资差别(所谓“性别工资差异”)可能是妇女在劳动力市场处于不利地位的一个重要指标。在各种类型的经济中,妇女一般平均能赚取男子收入的三分之二(Standing,1989 年和 1998 年;Tzannatos,1995 年和 1999 年)。图二.2 显示了若干国家男女之间的工资差别。此外,这种收入差异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可归因于男女受教育水平和工作经验的差别。这似乎显示基于性别的歧视可能十分广泛地存在(Birdsall 和 Sabot,1991 年;Psacharopolous 和 Tzannatos,1992 年)。

<sup>33</sup> 就业质量是一个多方面指数,包括工资、非工资福利、就业的稳定性、就业合同的期限与条件、社会保障(保健、失业、养老金)、代表权(工会或其他手段)、工作时间、工作强度、职业风险、决策参与、职业晋升或技能提高的机会、与职业相关的社会地位(劳工组织,1998 年 c)。

插入图二.2

130. 对于性别工资差异是否或在那些情况下显示出随着妇女更多地参与有报酬工作而减少,存在着不同的证据。在一些工业化国家,例如美利坚合众国,这种差异似乎缩小了(Blau,1998年)。在另外一些国家,例如日本,这种差异加大了(Kucera,1998年)。同样,发展中经济体的趋势也各不相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例如萨尔瓦多和斯里兰卡,妇女的工资相对男子而言似乎略有增加,而在另外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例如香港特别行政区、缅甸、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省,工资差异加大了(Seguino,1997年a;Standing,1999年)。此外,还不清楚这种不大的变化是否或在何种程度上反映了妇女相对于男子的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Joekes,1995年;Cagatay,1996年)。<sup>34</sup>

131. 尽管证据不多,贸易扩张和外国直接投资的自由化可能以两种方式影响了性别工资差异:(a)通过对男女劳动力需求的不同影响;(b)通过相对于受资本输出直接影响行业中有组织工人的议价能力的提高。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可能会使妇女工资上升,因为外国直接投资往往刺激对妇女劳动力的需求。而另一方面,由于企业更有能力将其全部或一部分生产转移到其他国家,因此对受影响行业工人的工资形成一种向下的压力。目前数量不多的研究显示,后一种影响更强了。

132. 有证据显示,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以及伴随的迁移到海外的威胁,使美利坚合众国制造业雇主成功地抵制了增加工资的要求(Brorenbrenner,1998年)。同样,多国公司的外国直接投资倾向于从工资已经提高而且工作条件已经改善的新兴工业化国家转移到较不发达国家,例如印度、毛里求斯、斯里兰卡,最近还转移到孟加拉国、中国和越南(Lim,1997年)。因此,如果妇女比男子更多地集中在资本“流动自由”的行业(也就是说企业迁到国外的威胁真实可信),那么妇女相对于男子的工资也就不大可能提高。确实,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许多低工资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可能就是这样(Standing,1999年)。在努力实现出口带动工业化或建立出口加工区的这些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工资差别特别明显,便不足为怪了。<sup>35</sup>

133. 与此相对照,在一些发达国家,例如美国,全球化的力量对男子工资的不利影响比妇女大。过去20年间,贸易自由化和资本流动性侵蚀了男子集中的行业蓝领工人较高的工资。在这些行业男子是地位稳固的“自己人”。国际竞争的加强降低了这些行业男性工人的议价能力。这也许是性别工资差异缩小的一个原因(Black和Brainerd,1999年)。1970年代末期以来,美国工资差异的缩小估计有四分之三可以归因于男子实际工资的下降(Lawrence和Bernstein,1994年)。至少在一些国家,性别工资差异的缩小部分反映了男女之间“向下看齐的状况”。

134. 过去几十年,还有一些因素可能对性别工资差异产生了影响。如下文所详述,全世界按性别职业隔离的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虽然受不同程度教育的妇女收入仍比男子少,但是高级别职位妇女人数的增加,特别是在发达国家,确实提高了妇女相对于男子的劳动力市场总收入。其他重要因素(因区域和国家而异)如下:工资解决办法的

<sup>34</sup> 在所有地区,妇女相对于男子的教育水平都有提高,男女受教育年数比率的提高首先是在高速增长亚洲国家(1960年到1975年),随后是在拉丁美洲(1970年以后,在较高基础上)和在南亚(从1975年以后,在较低的基础上)(Barro和Lee,1993年)。

<sup>35</sup> 中国台湾省和大韩民国性别工资差异的不同趋势也许能说明问题。1981年以来,前者的性别工资差异不断扩大,而后者则略有缩小。在中国台湾省,资本比在大韩民国更可以“自由流动”。同中国台湾省相比,大韩民国流入和流出的外国直接投资则少得多(Seguino,即将发表)。

类型(在集中集体议价的国家,男女工资差异往往较小)、<sup>36</sup>企业规模(在同一个国家,大企业往往工资较高,而且更可能雇用妇女)、技术变革、工业发展模式、有关两性不平等的社会价值观。

#### 4. 按性别的职业隔离

135. 尽管近年来妇女有报酬就业迅速而普遍地增加,按性别的职业隔离仍然是世界各地的普遍现象。<sup>37</sup>这种分离并不总是对妇女不利,它是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不利地位的一个重要指标。确实,职业分离程度较高的情况通常伴随着妇女的劳动力市场条件较差:工资低、地位低、事业发展机会有限等等。这种隔离还可能造成劳动力市场的僵化,从而造成经济效率低。

136. 如图二.3 和二.4 所示,妇女比较可能从事“男人的工作”而不是相反。但是一般说来,妇女从事行业的范围比男子窄。<sup>38</sup>妇女在文秘工作和低收入服务行业(售货员、饭馆服务员、佣人、理发师、裁缝)占统治地位。妇女专业人员较多的是教师或护士。这些“妇女职业”一般工资较低,地位较低,晋升前景也较差。

---

<sup>36</sup> 在澳大利亚、挪威和瑞典,收入差异相对较小。这些国家是集中集体议价,一般注重平等工资的政策。在加拿大和美国,收入差距相对较大,因为工资的谈判是分散、面向市场并且在企业一级进行的(Lim,1996年;Kucera,1998年)。

<sup>37</sup> 本部分的讨论是依据 Anker 的论述(1998年)。

<sup>38</sup> 男子占统治地位的非农业职业比妇女占主要地位的职业多七倍。

插入图二.3

插入图二.4

137. 人们通常把职业隔离分为两种形式。一种称为“横向隔离”,是指男女分布于不同的行业(例如妇女做佣人,男子做卡车司机)。另外一种形式称为“纵向隔离”,是指男女分布于一种职业内的不同等级(例如做生产工人和生产监督管理人员)。这两种形式的职业隔离同各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完全吻合。两种形式都因区域而异。这说明,社会、历史和文化因素在决定按性别职业隔离的程度方面可能十分重要。<sup>39</sup>

138. 横向隔离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程度最低,在中东和北非程度最高,在其他发展中地区也相对较高,而在经合组织国家和东欧过渡经济体为中等程度。<sup>40</sup> 然而,横纵隔离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比世界其他地区程度高。出口驱动的工业发展显然使许多职业向妇女开放(从而大大减少了横向隔离),不过并没有减少职业范围内在工资、权利和事业发展方面的男女不平等(纵向隔离)。

139. 过去 20 年间,横向形式的按性别职业隔离在世界各地已大大减少。在过去隔离程度相对较高的国家,减少幅度最大,而在过去隔离程度相对较低的国家则没有变化。几个发展中小国和一些经合组织国家减少的幅度最大并能保持。其他经合组织国家和转型国家,以及东亚、中东和北非大国似乎没有什么变化,而在中国和中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这种隔离反而更严重了。在这种国家和地区,隔离减少的原因是职业范围内的男女融合,而不是就业的职业结构方面的转移。“女性”职业的扩展显然足以吸收明显增加的非农业妇女劳动力。随着进入非农业劳动力妇女人数的增加,许多妇女接受了传统上属于“男人”的工作,从而减少了按性别的职业隔离。

140. 为按性别职业隔离辩护的人常提出的理由是,妇女具有特定的素质,使其比男子更适于做某些类型的工作。他们声称,传统上的“女性”职业涉及一般家庭活动中护理类型的工作,需要手巧而有经验,所有这些素质都是妇女应该具备的。同样,温顺和顺从也是一般与女工相连的特点,据认为也是形成性别就业模式的因素。

141. 今天,世界各地的妇女比以往任何时候受教育程度都高,专业工作的级别也更高。然而妇女很少能打破所谓“玻璃天花板”,这个玻璃天花板把妇女同高级别管理职位和专业职位隔绝开来(劳工组织,1997 年)。<sup>41</sup> 尽管最近取得了一些进展,玻璃天花板仍然完好无损。妇女在公司最高职位中不到 5%。即使妇女好不容易升到了最高职位,妇女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几乎总是比男子低。职位越高,性别差异越显著。此外,过去有人声称没有足够数目的合格妇女填补更多的最高级职位,这种说法已经过时。虽然在专业选择方面,性别差异依然存在,但越来越多的妇女开始参与科技领域的研究。除了工程等领域之外,在大多数领域,妇女的受教育程度正在接近男子。

<sup>39</sup> Anker 在关于按性别职业隔离的著作中(1998 年)划分了五个“区域”:经合组织国家、转型经济体、中东和北非、亚洲和太平洋、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sup>40</sup> 经合组织国家各分区按性别职业隔离的程度也大不相同。北美程度最低,斯堪的纳维亚分区程度最高。后者职业隔离程度较高,似乎与斯堪的纳维亚的福利国家发展有关。在这个地区,“护理经济”全面货币化创造出仍然属于妇女的职业(Anker 和 Melkas,1998 年,第 9 页)。

<sup>41</sup> 见方框二.3。

142. 在许多工业化国家,在妇女有机会获得更好的和更高级别的工作方面,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数目众多的妇女毕业于医学、法学、会计和商务研究。这些领域过去都是男学生占统治地位。就业机会越来越多,而且雇主愿意雇用妇女,这也刺激了对这些领域课程的需求。虽然在大多数国家,各个教育水平的妇女的工资仍然比男子低,受教育程度较高妇女的工资差异已经小的多(劳工组织,1998年,第145页)。至少是在一些欧洲国家和美国,近年来女工工资提高的部分原因是职业隔离模式发生变化,因为妇女受雇的级别更高了。

143. 受教育程度似乎也有助于妇女保住就业。妇女面对的一个重大危险是,在退出劳动力市场生孩子或应付其他家庭责任时会丧失职业。在大公司担任较高级别职位的妇女雇员,特别是在实行“机会平等”政策的公共部门,比较有可能依赖各种保护措施,帮助她保住劳动力市场中的位置。然而,如果职业培训主要是依赖非正式的工作经验,而不是认可的可转移的技能,离开劳动力市场一段时间之后,职业地位下降的风险就更大了。的确,在培训系统,例如基于工作场所的培训、终生学习、失业者培训方案、新技术培训,妇女任职人数不足,实际上也许加重了按性别的职业隔离(劳工组织,1998年,第6章)。

144. 从事行政和企业管理的妇女比例提高了,但妇女晋升途径的性质阻碍着她们升到最高职位。在较低的管理级别,通常把妇女安置在非战略性的部门,安置在人事和行政管理职位上,而不是能够升到最高职位的专业和部门管理职位。这种最初的不利处境往往由于被排除在正规和非正规的关系网之外而更加严重,这些关系网对于企业范围内的晋升至关重要。在产品开发和公司财务部门任职的妇女很少,因此必须制定明确的把性别问题纳入主流的战略,在这些领域提高妇女地位,如方框二.2 所概述。参与决策证明是抵抗男女平等最强的领域之一。

#### 方框二.2

在国家和国际各级的经济决策中将性别观念纳入主流的战略

为了实现明显和可持续的变化,所有行动者必须把性别方面的考虑纳入国家和国际各级机构决策的各个方面,从整体指导思想和战略目标,直至业务和行政管理政策和程序。在这方面,建议采取下列行动:

(a) 政府应该物色一批合格的妇女,并任命合格的妇女在国家和国际委员会以及国际金融机构的管理层任职;

(b) 国际金融机构应该在方案和项目的筹备和管理各个阶段审查其性别方面。应该由性别比例均衡的审查委员会并同非政府组织及民间社会其他成员广泛协商进行这种审查;

(c) 多国公司需要的技能一般超出了一国的要求,应该制定能够反映在全球化情况下所需新技能的人选标准,例如在迅速变化和多样化的环境中有效工作的能力,以及对性别问题的承诺;

(d) 非政府组织应该通过监测和宣传最佳和(或)最差作法以及向优胜者颁奖,监测不同行动者在消除妇女参与决策所面临障碍的努力方面的进展(联合国,1996年)。

资料来源:联合国,1996年b。

**方框二.3**

妇女在管理阶层打破“玻璃天花板”战略的若干因素

- ☐ 消除基于性别的歧视的规范机制和法律框架
- ☐ 真正改变态度的肯定行动和准则
- ☐ 企业、机构和政府采取适当步骤,确保雇员认识到自己的权利与义务,包括平等就业法规定的权利和义务
- ☐ 积极行动与平等机会政策,以在招聘和晋升方面创造平等条件,并确保给妇女平等机会和待遇
- ☐ 确定途径,包括更灵活的工作时间,缩短工作时间并提供适当照顾儿童和老人的设施,使妇女和男子能够把事业同养家结合起来
- ☐ 为妇女提供指导,提供咨询意见并培养其专业技能
- ☐ 在公司的人事部门任命负责在整个企业监测和推行男女机会均等的公司官员
- ☐ 妇女获得商业技能培训的途径,使其能够经营自己的企业
- ☐ 同事和同侪群体之间的“网络化”联系

**资料来源:**劳工组织,1997年。

### 三. 生产国际化、工作重组和劳动“灵活安排”

145. 在 1970 和 1980 年代,多国公司某些阶段(或类型)的生产日益移交给其他地点独立的生产单位。这样做是为了将低技能、劳动力密集型的工序转到低工资地区,而发达经济体将专门生产技能更高、资本密集型货物。生产能力的这种移交被称为“新的国际劳动分工”。

146. 美利坚合众国许多劳动力密集型企业率先迁移到加勒比、东亚和拉丁美洲低工资地区。迁移的企业中属制衣和制鞋业的居多,生产电子产品的次之。结果,一些人称这一进程为“美国非工业化”。(Bouestone 和 Harrison,1982 年)。到 1980 年代中期,日本公司也参与类似的进程,将许多劳动力密集型生产迁移到东南亚。随着贸易壁垒日益减少,这一进程在全世界势头日增,因为发达国家的多国公司可在受限制较少的情况下将在低工资地点生产的货物重新出口到发达经济体。

147. 资本流动最后阶段的主要特征之一是跨国生产网络的发展。在这样的生产网络中,多国公司在本国拥有尖端的生产、产品设计和财务部门,而其标准化生产则分散到全球各地低收入地点(Parisotto,1993 年;Papalauer,1998 年)。由于有了新的信息和传播技术,数据处理、帐户管理等办公室从事的工作也如同涉及制造业的其他标准化作业一样广泛分布于各地。上文提及的服务业国际贸易的扩展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一新趋势。

148. 当前阶段的另一特征是,鉴于市场自由化往往造成产品需求变换无常、市场动荡剧烈,为了应付这一局面,人们努力使在全球的生产具有更大灵活性。各多国公司已开始依赖不那么专一、但更加灵活的技术,并裁减了长期全职人员,同时增加聘用非全职人员、临时人员和其他应急人员。虽然产品革新和设计作为这种已发生变化的生产环境中的竞争战略,正在变得更加重要,但靠低工资和低福利、更多利用临时工和裁员来降低费用仍然也十分重要。

149. 外国直接投资的去向是由这一复杂的竞争战略确定的。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多数外国直接投资流动目的通常是在新产品开发和市场扩展方面在各多国公司间建立新形式的联系。<sup>42</sup> 就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而言,最主要的动机是降低费用。近年来,这些投资流动日益以各种“外国间接投资”的方式出现,各跨国公司经常将标准生产要件交给特许生产商、分包商或合同制造商,并同当地生产商办合资企业,而不是在发展中国家建立独资附属企业。

150. 在无法将生产迁移到国外的情况下,雇主用移民工人、主要是女工取代本国工人,以尽可能减少费用。发达国家衰退行业的中小型公司往往有这种情况,在一些出口加工区也是如此。这些出口加工区吸引了邻国农村年轻妇女前来工作。

#### A. 工作的改变

151. 全球化时代变化的经济环境的根本特点是竞争增加,新技术的采用,生产国际化,工作重组,劳工流动性出现新形式。这些过程对劳工市场和对性别问题的影响在各类国家内以及在全球国家间均不一样。然而,为我们的目的,这些影响可归纳为三大类:(a) 产出结构不断变化,同时劳动力的性别组成也不断变化;(b) 劳动变得更加灵活、更加非正式;(c) 国际劳工流动形式不断变化。

<sup>42</sup> 这种投资流动的另一推动因素是有必要采取预防措施,保护进入市场的机会,以防发达区域贸易保护主义壁垒抬头。

## 1. 变化的产出结构

152. 随着国际劳动分工不断变化,发达国家日益摆脱制造业工种(减少这些工作所占增值份额),同时保留产品开发、工程、广告等技术工种,广泛而言,即保留创造知识财产的工种。劳动力密集型工种首先从发达经济体出口。自此以来,资本较为密集的制造业工种也开始迁移到发展中国家,因为技术转让已变得更加容易,在全球组织的生产也已有改进。在早期阶段,妇女丧失制造业工作的特别多,因为她们主要集中于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然而,在较晚的阶段,男子丧失高薪蓝领制造业工作的人数开始超过失去工作的妇女人数。<sup>43</sup>

153. 妇女虽然在制造业失去了一些就业机会,但服务部门的发展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因为在过去 20 年中发达国家就业的增加相当部分是在服务部门。在欧洲联盟,在 1980 年至 1996 年期间,服务部门就业人数增加了约 1 900 万,弥补了工农业部门失去的 1 300 万份工作。就业人数增加最多的是“照管”服务(保健、社会服务和教育)、各种商业服务和环境活动以及旅馆业和饮食业(Rubery,1998 年)。由于传统上从事服务业的妇女特别多,因此就业机会集中于这些部门也使她们受益特别大。

154. 对技术工的需求相对增加(在服务业和制造业都是如此)以及对没受过大学教育的职工的需求减少还导致薪金日益两极化,这种情况在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最为明显。服务业的许多新创造的就业机会是在信息和知识密集型部门,需要高水平的劳工技能,而其余工作则是低技能、低工资、劳动力密集型职业。事实上,低技能就业机会增加的唯一地方是低级服务部门。这种就业机会的增加的相当一部分是主要由妇女承担的非全职工作,因为低技能男子和妇女全职工作的总数一直在减少(劳工组织,1998 年,第 34 和 35 页)。

## 2. 追求灵活机动,实现劳工市场自由化

155. 在发达国家,各多国公司力图使就业变得更加灵活,从而导致非正规形式就业扩散,外包给非正规部门的业务增加,同时加快了劳动力密集型生产工序迁移到发展中国家低收入地点的步伐。在宏观一级,另一结果是力争放宽对劳工市场的管制,即取消保护性规则以及被视为阻碍“市场灵活性”的劳工市场体制。促使放松对劳工市场的管制和使劳工更加灵活的努力开始于若干发达国家。自此以来,这已成为一个全球趋势。在多数国家,受标准劳工法律保护的工人较以前更少,因为各国政府未能实施或已废除劳工规则。与妇女的时间和努力有关的灵活性似乎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加强了各企业适应变化的市场条件的能力。各企业发现采用主要由妇女从事的灵活就业形式相对容易,而且招聘妇女从事这种非正规工作也相对容易。<sup>44</sup>

156. 在发生这些变化的过程中,无意中受打击的是“养家男子”的就业模式。根据这一模式,核心工作由男子承担,这些男子需要养家糊口,需要就业安全、晋升机会和生活的工资。之所以产生这一局面,是由于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类似于妇女从事的“次级”就业。这些新的就业机会中的大多数工资低,无保障,缺乏社会保护和福利,极少有培训或晋升的前景。曾经一度被视为是非典型(即从男子的角度来看)的工作,现在对男子和妇女来说都已很普通,但妇女在这类所谓灵活就业中的人数仍然远远

<sup>43</sup> 例如,在欧洲,自 1980 年代以来,失业人数集中于主要是男子从事的体力劳动职业。从事这些职业的人数减少了 20%。

<sup>44</sup> 在工农国进行的研究表明,性别差别在雇主的就业政策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就业结构和通过非标准就业合同寻求灵活性方面尤其如此(Rubery 和 Wilkinson,1994 年)。

超过男子。如下文详述,并非妇女可从事的所有灵活工作都必然不是好工作,但这类工作的确有可能在劳工市场上面临边缘化。

157. 在发展中国家,在 1980 年代急剧变化的条件下,非正规就业和在家工作的重新出现已成为全球趋势。经济调整、金融业和服务业的扩展、劳工市场规则放松及生产和市场全球化看来已创造一种经济环境,使多国公司能够将竞争增加和顺应变化的市场条件的代价转嫁给“非正规部门”,并且尤其是转嫁给工人(Sasen,1998 年)。结果,虽然非正规部门有了扩展,但核心正规部门就业不断减少。然而,如果认为非正规活动只是发展中国家劳工市场的一个特征,那就是错误的。例如,在美利坚合众国,电子、制衣等部门的非正规就业不断增加,来自拉丁美洲和亚洲的工人在血汗工厂干苦力(Eenandez-Kelly 和 Sasen,1993 年;Christerson 和 Appelbaum,1995 年)。根据记录,在这些行业,在新英格兰也有相当多的非移民工人从事非正规部门的工作(Nelson 和 Smith,1999 年)。

158. 然而,在发达国家,非全职工作是许多妇女从事的主要灵活就业的形式(见图三.1 和三.2)。<sup>45</sup> 一般认为,妇女因其家庭责任,往往喜欢非全职工作。尽管如此,许多只能找到非全职工作的妇女希望能有全职工作。例如,法国、意大利和瑞典很高比例的妇女表示,她们之所以从事非全职工作,只是因为找不到全职工作。同样,在芬兰从事非全职工作的 40% 以上的妇女希望能有全职工作(欧洲统计,1998 年)。即使非全职就业时间上的灵活性可能对工人有好处,但对那些不得已从事这种工作的人来说,有两个主要缺陷使这种就业不那么可取:收入低<sup>46</sup> (没有福利);更重要的是,没有职业晋升、培训或提高技能的前景。如果按照预计,技术工的收入继续增加,那么前面提到的第二问题就只会变得更加严重。

159. 本章其余部分重点探讨不同类型的灵活工作,讨论非全职、非正规部门的工作和在家工作以及季节工问题。

## B. 灵活工作的增加

### 1. 非全职工作

160. 根据劳工组织的定义,非全职工人为“一受雇人员,其正常工作时间少于‘同其类似的全职工人’的工作时间,但具有同他们一样的就业关系,从事同样或类似类型的工作和职业,或受雇于同样的公司、企业或分公司”。<sup>47</sup>

161. 与全职工作比较,非全职工作工时较少,每周薪酬较低。这种工作的就业形式、所依据的原则、对工作的规定和条件都与全职工作不同(Rubery,1998 年)。由于上述区别等其他原因,近年来非全职工作在调整工资和就业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发达国家尤其如此。

<sup>45</sup> 在欧洲,1996 年,虽然 74% 的全职雇员签有无限期合同,但签有这样的合同的妇女有 59%,而男子有 83%(欧洲统计,1998 年)。

<sup>46</sup> 在法国、卢森堡、荷兰、西班牙和联合王国,非全职雇员的收入不到从事同样工作的全职雇员收入的 60%(欧洲统计,1998 年)。

<sup>47</sup> 《劳工组织非全职工作公约》,1994 年(第 175 号)。

插入图三.1

插入图三.2

162. 从事非全职工作的男女都有(见图三.1 和四.2)。一般而言,在生命周期内,男子和妇女从事非全职工作的程度和形式不同。妇女参加非全职工作往往是因为生儿育女,而男子更可能是在进入或退出劳工市场时参加非全职工作的。然而,妇女参加有酬工作的情况在不同国家差异很大,至于生儿育女在何程度上使妇女转向非全职工作,各国差异尤其大。在家庭内的男女劳动分工使妇女比男子有更多的机会从事非全职工作。但国家政策也对劳工供应计划和行为产生影响。因此,有无工人能从事非全职工作的情况不仅取决于家庭状况,而且也取决于多国公司的行为、劳工市场政策和规则以及国家涉及面更广的劳工市场政策(O'Reilly 和 Fagan,1998 年)。

163. 非全职工人的平均时薪低于全职工人的时薪。除时薪较低外,他们的福利更差。然而,关键问题在于非全职工作是参与劳工市场的“桥梁”还是“陷井”(Butchermann 和 Quack,1989 年)。这究竟是使工人陷于不稳定就业的一种边缘化的廉价劳动形式,还是进入有酬就业和保持就业的一个机会?有人认为,虽然非全职工作本身并不一定会产生边缘化作用,但长期从事这种工作会创造不利条件。“就资格和收入而言,由于失去培训和晋升机会,这些工人被推向劳工市场的边缘,他们终身积蓄的应享养恤金也较少”(O'Reilly 和 Fagan,1998 年)。

164. 大批非全职工人的存在随时可以替代全职工人的工作,这可能会限制全职就业机会的增长,至少在经济某些部门是如此。另一方面,非全职工作的普遍存在可能会使妇女作为非主要养家人的地位更加根深蒂固,并加深家庭内不平等分配家务的现象。此外,有证据表明,在非全职工作较为普遍的国家,男女全职工人工资的差距可能更大(Rubery,1998 年)。

165. 在欧洲各国,非全职工人可分为三类:<sup>48</sup>

(a) 被视为不是主要或独立的赚取收入者的临时参与劳工市场的人。在许多国家,非全职工人获得失业金、养恤金和/或病假工资的权利有限,在他们未能达到收入或工时的特定标准时以及在他们将工作与教育、照料等其他活动相结合时尤其如此。不享受社会保护福利金可能会增加非全职工人眼前的现金收入,但会丧失应享福利。强调雇员临时受聘的性质使雇主和政府不再有任何道义责任在工人没有工作、包括假日、生病、需求减少和老龄时提供收入保障;

(b) 临时自愿减少工时的持续参与者。这类人主要是妇女。她们在生儿育女期间减少工时,但仍然长期参与劳工市场。非全职工作的权利被视为一种特权。雇主或国家不补偿全职和非全职收入的差额。弥补生计需求和实际收入之间的任何差距的责任在于家庭。多数减少工时的人保留与全职工人同样的福利权利和工作条件。减少工时的机会通常由国家予以保障,或根据个人和工作的特点而定。例如,法国公务部门让工作母亲有这样的机会。但更通常的是,雇主更愿意提供这样的机会以留用技能较高的雇员;

(c) 劳工市场全职持续参与者的非全职工作。接受非全职工作时,他们可能要求得到补偿。由于政府采取政策将非全职工作扩大到非传统的劳动力部门,并且由于在更多的国家,妇女日益被视为长期参与者而不是临时参与者,这类人数可能会增加(Rubery,1998 年)。然而,必须指出,妇女参与灵活工作时间的安排时,她们因失去收

<sup>48</sup> 本节其余内容大量参考 Rubery 的著作(1998 年)。

入而得到的补偿十分有限。男子更加可能会得到安排,使他们能够保持全职收入。在壮年男子受雇用的地方,通过调整加班来适应需求,但如果变动幅度极大或政府有补助,就可采用缩短工时但附加补偿收入来避免过剩。这种安排主要是针对重工业的男性体力工人。妇女因不能实际作满全职工时而得到补偿的情况极少。在妇女从事的工作中,非全职工作往往被用于缓和需求的波动。由于存在着养家男子的概念,才会产生短工时补助,这仍然是许多国家劳工市场政策的一项关键内容。

166. 总体来看,非全职工人与全职工人相比,往往享受较少的就业保护权利。现已作出一些努力,以缩小这两类工人之间的差距。尤其是,欧洲联盟已试图将全职标准就业条件按比例适用于非全职就业人员。即使需要满足按比例的条件,雇主仍然有兴趣创造和促进非全职工作,因为他们从非全职工作中得到的好处主要在于有机会裁减不必要的工时,或较少地利用昂贵的加班工作。将非全职工人纳入规则系统的努力的结果是,工资和工作条件向低看齐而不是向高看齐。<sup>49</sup>

## 2. 非正规部门性质的变化

167. 虽然某些活动可能会更易于变得“非正规”,但除了对经济机会的反应及其界线流动不定以外,并没有内在的一套特征可以确定什么是非正规活动。劳工组织于1972年首先正式采用这一术语。自此以来,关于非正规部门的定义和特点,已进行了很多辩论。正式的国际定义包括:(a) 小于一定规模的未经注册的企业;(b) 非正规企业里的有酬和无酬工人;(c) 没有固定雇主的临时工。关于非正规企业的标准,例如最多有酬工人人数、家庭佣人和农业部门是否包括在非正规部门之内等等,各国均不相同。此外,在每个国家都有法规确定什么是经注册的/正规企业或未经注册的/非正规企业。

168. 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非正规部门被视为是不发达的一个主要特征,并预计非正规部门会随着经济增长而消失。但与这些预计恰恰相反,自1980年代以来,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非正规部门成了就业增长的温床。由于推行结构调整方案,增长方式改变,竞争更加激励,必须采取紧缩政策。在这样的环境中,正规部门无法为与日俱增的劳工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随着非正规部门规模扩大,日益难以将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的区分同传统和现代的区别相挂勾。

169. 一方面,非正规部门是一块巨大的“劳工海绵”,吸收了正规部门的过剩劳工(劳工组织,1991年)。非正规部门的许多企业主要是自营职业的生产者所有,他们资本、技术和技能都极其有限。这些企业遵循维持生计的逻辑。由于缺少机会进入有组织的市场,得不到信贷、正规教育和培训,得不到公共服务和福利,这些企业收入很低,很不稳定,员工很少,且很不固定(Tokman,1990年)。另一方面,1980年代由于条件改变,非正规部门恢复了活力,成为经济调整的一部分,为正规部门企业提供了灵活性和降低成本的机会(Sassen,1998)。非正规部门不但没有过时,反而已成为正规部门的一个组成部分。

<sup>49</sup> 在国际一级,对非全职工作日益注意。1994年,国际劳工大会通过了《非全职工作公约》(第175号)和《建议》(第182号)。1997年,欧洲联盟各社会伙伴及欧洲工会联合会、欧洲工业和雇主联合会同盟和欧洲公共企业中心签署了一项框架协议。

170. 鉴于非正规部门企业极其多种多样,可以根据其生产力水平和与正规经济相联系的性质区分三类非正规活动。第一类非正规活动是城乡自营职业的穷人的“自给性”生产。这种活动的生产率很低,与正规经济即使有联系,也是极其有限。第二类生产率相对较高,工人在具有资本性质的环境中从事有酬劳动,与正规部门具有密切联系。非正规部门的这类企业经常分包正规部门的业务,使正规部门能够降低成本,并能灵活应付需求的动荡。<sup>50</sup>最后,第三类非正规企业由独立专业人员组成。他们按客户特定需要提供高价格的服务和产品,以满足迅速增加的高收入人口的需要。

171. 在多数国家,由于正规部门中妇女所占比率过低等其他原因,在非正规部门,尤其是在前面两类,大多数工人是妇女。第一类的非正规活动产生的增值极少,收入十分有限,几乎没有节余,无法重新投资以提高生产率或扩大生产规模。这类活动是维持生计的手段,而不是一种创业活动,进行这种活动是因为别无它路,而不是为了追求利润(Joshi,1997年)。穷人家庭的妇女由于没有可以推销的技能,只有纷纷从事这类非正规活动,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创造一些收入。她们所处环境竞争性很强,进入和退出都十分容易,开办和失败的比率都很高。对许多人来说,经济活动的生命周期相对较短。许多妇女还在家工作,为制造业企业进行计件劳动。这可能属于第二类非正规活动,因为对妇女临时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与上文所讨论的生产调整和技术变革有关(Pollack 和 Judisman,1997年)。

172. 在许多国家,国家管制框架对大型企业和国营企业有利。小企业为了生存,往往得采用非法手段(De Soto,1986年)。取得完全合法性的障碍有许多形式,并可能存在于工作进程的不同要素:劳工地位、工作条件或管理形式(Castells 等其他,1989年)。虽然某些过分的官僚要求的确是产生不必要的障碍的原因所在,但需要有政府规则来保护社区的总体利益。因此,一方面需要采取管制措施保护公共卫生和安全,另一方面又要注意不制造不必要的障碍,以免阻碍非正规部门企业的运作,要在这两者之间实现适当平衡并不一定很容易。困难是在于需要制定政策,促进非正规部门蓬勃发展,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收入,但同时又支持为那些想在非正规部门谋生的人创造更好的条件并提供更加广泛的保护。

173. 当然,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非正规部门,不遵守劳工法和基本劳工标准的现象普遍存在。这个问题的最终根源是该部门非正规企业的存在很不稳定,劳工的组织十分困难(见方框三.1)。如果这些企业无法在较为稳定的环境中运作,就不能指望在这方面取得多大进展(劳工组织,1991年)。此外,最近关于保护正规部门工人的标准受到削弱,这只会使改进非正规部门工作条件变得更加困难。

### 方框三.1

#### 印度自营职业妇女协会

在古吉拉特邦 Banaskantha 区易发生干旱的地区,自营职业妇女协会已开始支助妇女的经济发展活动。该协会是创办于 1972 年的工会,其目标是将自营职业妇女组织起来,因为她们获得社会服务的机会十分有限,而且她们的就业很不稳定。该协会的成员在 1995 年共有 220 000 人,其中包括小商人和小贩、在家工人、体力劳动者和提供服务的人。

<sup>50</sup> 这一类还包括财政上有困难的公司。这些公司以非正规方式开展业务是生存的手段。

该协会作为工会的活动包括争取最起码的工资、为街头商贩获得执照以及对在家工人进行法律权利方面的教育。由于自营职业很不稳定,该协会还帮助成员组织合作社,以创造收入,争取社会保险,增强能力,促进就业。

该协会最初是古吉拉特邦政府和德里妇女发展中心推广到 Banaskantha 区的。该协会对妇女的需求进行评价,发现妇女主要是缺乏固定就业。该协会重点注意发展地方经济组织,由妇女生产商经管,并与政府管理的称为“农村地区妇女和儿童发展”的方案建立伙伴关系,组成生产者团体。

这些团体现已发展成区一级的联合会,成为 Banaskantha 农村地区妇女和儿童发展协会,负责促进各生产者团体的活动,并使他们同市场、银行、政府机构建立联系。该协会还提供各种投入,例如用于苗圃的种籽和维修房屋用的无息贷款。该协会工作的重点是支助和宣传。

**资料来源:**Bhowmik 和 Jhabvala,1996 年。

### 3. 对非正规部门的衡量

174. 关于非正规部门的现有统计数据表明,在多数发展中国家,与全国产出相比,非正规部门的规模相当大(见表三.1)。然而,用统计方法对非正规部门进行衡量并不容易,因此不应根据其表面价值看待现有数据。

175. 各国之间的差距应予以仔细分析,不仅是因为每个国家本身具有特点,而且也因为所采用的方法各有不同(De Jeu,1998 年)。方法方面的第一个差异在于调查的范围,即:

- (a) 首都、城市地区或全国是否都属调查范围;
- (b) 所涉经济活动分支,造成差异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农业是否包括在内;
- (c) 调查范围是否包括具体群体或工人。在此,主要区别在于是否包括有酬帮佣工人。

176. 第二个主要区别在于确定非正规部门的准则不同,即这一准则是否涉及:

- (a) 企业规模;
- (b) 关于没有登记的标准,这实际上是令人迷惑的,因为登记受法律/行政规则管制,而这些规则因国而异;
- (c) 关于企业合法组成的标准(不具有法人资格或具有法人资格)。

表三.1

就就业和国内生产总值而言,非正规部门所占比重

	非农业部门		共 计	
	非正规部门就业在非农业部门就业中所占比例	非正规部门在非农业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	非正规部门就业在全部就业中所占比例	非正规部门在全面统计的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
贝宁	93	57	41	37
布基纳法索	77	40	9	25
乍得 1993	74	45	12	31
哥伦比亚 1992(10 年都市地区)			55	18
斐济 1990			43	2
印度 1993-94		47		63
马达加斯加 1995 (塔那那利佛)		26		17
马里 1989	79	42	13	23
毛里塔尼亚 1989	75	14		10
毛里求斯 1992			24	19
尼日尔 1987				30
菲律宾 1988			26	12
塞内加尔 1991		41		
泰国 1995			6	1
突尼斯 1995	49	23	38	20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1991			22	32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达累斯萨拉姆)			30	65

资料来源:De Jeu, 1998 率。

177. 尽管在衡量方面存在着问题,发展中国家的非正规部门无疑提供了大多数的就业机会。例如,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1990 年至 1993 年期间,83%的新的就业机会是在非正规部门创造的。拉丁美洲绝大多数城市穷人在非正规部门工作。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制造业部门未经组织的活动估计分别占整个制造业的 75%和 70%。

178. 在撒南非洲,非正规部门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所占比例从不到 15%至超过 60%不等,据报告城市非正规部门所占比例最高的是塞内加尔(77%)和贝宁(80%)。非正规部门就业在非农业就业中所占比例更高一些:在布基纳法索为 77%,在马里 79%,在贝宁为 93%。

179. 此外,根据现有数据,也许除在拉丁美洲区域以外,发展中国家大多数从事经济活动的妇女是在非正规部门工作。在非洲许多国家,三分之一以上从事非农业活动的妇女是在非正规部门工作,在赞比亚和冈比亚这个比例分别高达 72% 和 65%。在利马(秘鲁)、印度尼西亚和大韩民国,从事非正规部门工作的妇女比例分别为 80%<sup>51</sup>以上、65% 和 41%。

180. 有理由认为,这些数字可能会高得多。最近对布基纳法索进行的一项研究(Charmes,1998 年)表明,非正规部门的规模和贡献受到低估的主要原因仍然与妇女有关,其原因至少有三个:

(a) 她们从事的这些非正规活动最难以统计和衡量:在家工作或外出工作、街头售货(经常作为未经衡量或没有注册的制造业活动的延伸);

(b) 与男子相比,她们更多地参与第二种活动或多种活动,在农村地区尤其如此;

(c) 她们的生产活动被她们作为家庭妇女、家庭农工或街头小贩的地位所遮盖,使她们的贡献局限于商业的边缘,从而使她们在转换过程中的增值受到忽视。

#### 4. 在家工作

181. 在家工作有两个重要特点。第一,在家工作涉及在家工人和雇主、分包商、代理或中间人之间的一种有酬就业关系。各方间的协议可以是非明言的或明言的,可以是口头的或书面的。但薪酬通常是计件支付。第二,工作地点是在雇主厂房以外,可以在工人家里或不属于雇主的某一街坊工作场所。<sup>52</sup>

182. 在一些情况下,在家工人拥有自己的工具,而在另一些情况下,雇主出租工具或以由工人分期付款购买办法提供工具。通常,在家工人从雇主处获得原材料(或在市场上购买原材料),然后将成品或半成品销回给雇主。通常很难区分在家工人和独立(自营职业)工人。许多作为自营职业者统计的人可能实际上是另一种赚取工资者。<sup>53</sup>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许多自营职业者的工作可能受别人控制,自营职业者需要靠这些人提供住房、信贷或投入。

183. 绝大多数在家工人是妇女。虽然在家工人的总数难以估计,但据认为,在工业国和发展中国家在家工人人数都在增加(劳工组织,1995 年)。近年来,由于采用了信息技术,以前的白领职业也出现了新形式的在家生产。结果,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家工作包含相当多样的职业、薪酬系统和订约安排,涉及多种多样的服务行业和制造业。似乎技术变革将继续影响今后在家工作发展的方式。“电传工作”尤其有可能变得更加重要。

<sup>51</sup> 印度尼西亚和大韩民国的数字是最近东亚发生危机以前统计的数字。

<sup>52</sup> 1996 年《劳工组织在家工作公约》(第 177 号)的定义是,在家工作是一人在其家中或在其选择的属于雇主的工作地点的其他房舍进行的有酬工作,这种工作的结果是提供雇主所具体要求的产品或服务,无论提供所用设备、材料或投入的为何者。此定义不包括下列工人:根据国家法律、规则或法院裁决,具有“足够”自主性而被视为是“独立工人”的人。

<sup>53</sup> 赚取工资者因其劳动获得报酬,而自营职业者的收入是对资本和劳动、创业技能和冒险的回报。

184. 在多数国家,工业类型的在家工作仍然占主导地位,无论在工业国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是如此。活动与产品的范围很广。在欧洲、东南亚、北美和拉丁美洲,服装、纺织品、地毯和某些皮革产品(例如鞋子)传统上都是在家制作。所需设备极少。在许多情况下,工具或机器都不是电动的。这是一种劳动力密集型的工作,可以分别作业,计件分包。

185. 近年来,在家工作的范围已经扩大,超越了上述行业。高技术制造业以及电器产品、塑料制品和轻金属制品也有许多劳动力密集型工序,可以分为自成一体或独立操作的工作。诸如分类、清洗、包装和贴标签等辅助工作都是劳动密集型的业务,适合于在家工作。

186. 服务部门在家工作也在增加。在法国、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等国家,有证据表明,服务部门在家工作人数大大超过在家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数。许多这种工作是文秘性质的工作:打字、文字和数据处理、单据处理、编辑和翻译(劳工组织,1995年)。

187. 在欧洲,德国、希腊、冰岛、意大利和荷兰在家工人中妇女所占比例为 90%至 95%不等,在法国、西班牙和联合王国分别为 84%、75%和 70%。有子女的已婚妇女占多数(多数属 25 至 45 岁年龄组)。在一些工业国,在家工作主要集中于传统工业区和大城市,在这些地方有许多新移民(通常是非法移民)和少数民族居民。

188. 在发展中国家,妇女在在家工人中也占绝大多数。例如,在印度,90%的烟草工人是妇女。<sup>54</sup>在越南进行的一次调查表明,90%的在家工人是妇女,其中 37%以上属以妇女为家长的家庭。<sup>55</sup>在工业在家工作方面,男子通常承担分包商或中介人的作用,或从事辅助工作,例如收集和运送材料和成品。他们本人很少在家劳动,或协助妇女。但在一些国家有一些男子从事的职业,这些职业往往需要较多的技能或手艺。例如,在印度的手工纺织家庭,妇女和儿童往往只做准备工作,而进行实际纺织的是男子。

189. 在农村地区,农业政策有时造成无地穷人的增加。这些人寻找农业季节工或在农闲季节寻找其他种类的工作做。甚至在“传统”农村家庭,越来越多的妇女被迫靠在家工作来补充家庭收入。在亚洲和拉丁美洲进行的实地研究表明,在家工作与农村人口中与目俱增的贫穷和无土地现象密切相关(劳工组织,1995年c)。

190. 有人认为,在家工作对雇主和工人都有好处。在家工人使雇主有了灵活性,并且有了减少劳工成本的机会。雇主通常为“正规”有薪工人支付福利和社会保险,但他们不必为在家工人支付福利和社会保险。由于在家工人的收入是计件而不是计时的,因此就特定质量和数量而言,他们的收入远远低于有薪工人的工资。对雇主来说,在家工人所做的工作成本较低,还因为诸如租金、电力、水、工具等许多与生产有关的费用是由工人自己承担的。就劳工灵活性而言,雇主在以下三个方面从在家工作中获得好处:更自由地改变生产量;更灵活地对市场需求的波动和异常现象作出反应;有更多的机会调整工作性质。

<sup>54</sup> 见方框三.3。

<sup>55</sup> 见劳工组织(1995年)。

191. 对许多妇女来说,在家工作是争取收入的唯一选择。这些妇女由于需要照料年幼子女、有病或年老的家庭成员而必须留在家里,或因需要遵循现行家庭和社会准则而不能在家庭以外工作。

192. 然而,在家工作一般收入低、无形、工作时间长、工作条件差。与生产同样质量和数量的物品的工厂工人相比,在家工人的收入要低得多。他们通常技能有限,受教育差。如果他们处于有薪就业机会很少、廉价劳动力充足的环境,他们就不敢抬高价格,以为如果他们抬高价格,承包商就会转而雇用其他在家工人。此外,多数在家工人无法利用网络或其他组织基础,以进行讨价还价<sup>56</sup> 或对现行工资率进行比较。

193. 在家工人的工作没有保障。只有在有工做时,他们才能获得收入。由于数额很低,在家工人只得工作很长时间,以尽可能多地争取收入。在家工作的妇女通常在同一房舍内将家务和有酬工作相结合。“无形的”女工工作时间经常远远超过法定每日工时或工作日的时间。在以妇女为家长的家庭中,工作条件是最差的,对于有年幼子女的单身妇女来说尤其如此。另一个危险是,在家工人可能会利用儿童作为家庭的一部分劳动力,使他们得不到教育机会。妇女参与分包工作时,或需要更多的帮手帮助在很紧的期限前完工时,利用童工的情况可能特别多。

194. 对在家工人来说,获得社会福利和保护也是一个问题。通常他们不受国家劳工法保护,结果只得做出地下工作安排。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多数在家工人是根据口头协议承担工作的,因此很难确立雇主与雇员之间的法律关系。工人通常不了解在他们居住和工作的地方他们可能享有什么样的权利和特权。他们没有机会享有养老金、医疗保险和残疾保险、产妇保护、有薪假日和劳工补偿。

195. “一些种类的在家工作有可能会使工人患上职业病,但由于国家当局没有意识到在家工人的很差的工作环境,而且在发展中国家通常没有适用于在家工作的劳工检查制度,工人可能会因工作条件差以及所用工具和有害化学品而面临患上职业病的危险。在设计不良的椅子上以同一姿势工作很长工作还可能会造成背痛和脖子痛,光线不足还有损于视力”(劳工组织,1995年)。

### 方框三.2

印度泰米尔纳德邦在家女工成立工会的情况

手工卷烟业的多数工人是妇女。在泰米尔纳德邦有 50 多万手工卷烟工人,在 Madras-Chengalpet 区有 5 万手工卷烟工人。手工卷烟业实行一套分包制度。这意味着烟草公司和在家工作的妇女之间没有直接合同,而是由分包商向工人提供烟草。

手工卷烟有三个步骤,通常由不同家庭成员操作。例如,在一些地区,妇女切烟

<sup>56</sup> 但缺乏组织支助的现象可能正在发生变化;见方框三.1 和三 2。

叶,男子卷烟叶,儿童封口。然而,最低工资的确定是假设工作是一人做的,而且泰米尔纳德邦的最低工资也低于周围各邦。这造成贫穷,导致长期使用童工,压低了妇女的工资,因为她们主要负责切烟叶,而不是从事男子所做的收入较丰的卷烟工作。雇主和与分包商接触的人还用欺诈手段扣除妇女应得的政府支助资金。

泰米尔纳德邦的手工卷烟工人工会在劳工教育与发展中心的协助下成立,正在为生产不同阶段力争(更公平的)起码工资标准,并为改善工作条件举行了罢工。该工会还帮助工人获得教育资金、福利和住房。由于多数人居住在城市贫民区,缺乏基础设施,住房对他们来说尤其重要。工会大多数会员是妇女。另外还成立了一个妇女委员会,以加强领导作用。

**资料来源:**Ramakrishnan,1996年。

### C. 不断变化的国际劳工流动格局

196. 劳工移徙基本上是对国家内和国家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作出的反应。最近信息技术的突破使全球各地的人们更加了解发达区域的状况和机会,同时运输业的进步又使长途旅行更加容易,费用更低。在微观一级,劳工移徙通常是由于人们希望提高生活水平。移徙的决定是由个人或集体作出,是家庭或其他社会网络生存战略等其他计划的一部分内容。

197. 二十世纪前半叶,移徙浪潮主要是由欧洲流向美洲,在欧洲内部人口流动也很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非殖民化时期,在全球各地又出现了另一轮重大人口流动。在本世纪下半叶许多时间里,移徙的主要推动力是经济因素,虽然在某些时期也有主要是以政治为动机的。例如,1960年代相当一部分的移徙是南方过剩劳动力大规模移向劳动力短缺的北方。

198. 自1970年代以来,在世界各地这类长期劳工移徙的现象不断减少,一个重要原因是发达国家加强了对国际劳工流动的限制。<sup>57</sup>然而,自此以来出现了复杂的、新形式的人口流动,因此在理解移徙格局以及在将其归类时,过去关于长期/临时、经济/政治、农村/城市、自愿/非自愿等的二分法不再那么有用。新的流动可大致分为相互关联的五类:(a) 由于战争/饥馑/环境退化/国内冲突而造成的人口流动,具有经济后果;(b) 北方到南方、城市到农村的反向移徙和返回;(c) 在具有密切联系的两类以上的国家间穿梭移徙;(d) 非法国际移徙劳工安排,包括贩卖妇女;(e) “租用”劳工的临时移徙。

199. 新的流动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妇女人数大增,而且在移徙人口中妇女对男子的比例也不断上升(Lim,1998年;Skeldon,1998年)。虽然移徙男子总数仍然超过妇女人数,

<sup>57</sup> 似乎自相矛盾的是,目前劳工流动性更大,但同时又更加稳定。“……劳工自由流动的障碍与日俱增,而与此同时,对跨国工人流动的需求恰恰也不断增加”(Skeldon,1998年,第4页)。

但在 1985 年至 1990 年在全球六个区域中的四个,妇女移徙人数的每年增加率高于男子人数的增加率(见表三.2),<sup>58</sup>自 1965 年以来,妇女移徙人数增加率在持续上升(见表三.3)。有关妇女的报道也日益增多,就上文所列最后两种形式的人口流动而言尤其如此。除人数增加以外,她们以主体身份出现的情况也与日俱增,有的自己移徙,有的作为主要养家人移徙。

200. 现有数据表明,多数移徙女工从事服务部门传统女性职业的工作,即帮佣工作、护理、教学、娱乐和制造业(诸如纺织品、电子产品和玩具等轻工业)。帮佣工作、包括卖淫在内的娱乐部门以及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的装配线工作吸引了无技能的移徙妇女。移徙女工可分为三类:专业和高技能工人、短期合同的制造业工人和帮佣或娱乐部门雇员。

---

<sup>58</sup> 1990 年,全世界移徙妇女和男子的人数分别为 5 710 万和 6 260 万(联合国,1997 年)。然而,由于这些数字不反映无证流动(并考虑到国际贩卖妇女的现象有增无减),这些统计很可能低估了妇女的真实人数(Lim,1998 年)。

表三.2

## 1965-1990年按区域和选定国家开列移徙妇女和男子估计人数的增加情况

	移徙人数的增加(以百万计)						年平均增加率(百分数)					
	女			男			女			男		
	1965-	1975-	1985-	1965-	1975-	1985-90	1965-	1975-	1985-	1965-	1975-85	1985-
全世界共计	5.1	9.9	7.1	4.2	10.8	7.4	1.4	2.2	2.7	1.0	2.2	2.5
发达国家 <sup>a</sup>	4.5	4.8	3.1	3.4	4.9	3.2	2.7	2.2	2.4	2.0	2.3	2.5
发展中国家 <sup>b</sup>	0.6	5.1	4.1	0.8	5.9	4.3	0.3	2.2	2.9	0.3	2.1	2.6
非洲	1.5	0.8	1.5	1.7	0.5	1.6	3.7	1.5	4.7	3.1	0.8	4.2
北非	0.0	0.5	-0.1	0.1	0.6	-0.1	-0.1	6.9	-2.1	1.8	6.9	-1.7
撒南非洲	1.5	0.3	1.6	1.6	-0.1	1.7	-1.2	0.7	5.9	3.3	-0.2	5.3
亚洲(包括中国)	-1.0	3.8	2.2	-0.6	5.1	2.3	-0.7	2.4	2.4	-0.4	2.7	2.0
东亚和南亚 <sup>c</sup>	-0.2	-0.1	0.3	-0.1	-0.1	0.1	-0.5	-0.3	1.6	-0.2	-0.2	0.5
南亚	-1.4	1.9	0.8	-1.7	1.7	0.8	-1.8	2.3	1.7	-1.9	1.9	1.5
西亚	0.6	1.9	1.1	1.1	3.5	1.4	2.5	5.3	4.3	3.5	6.7	3.6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0.0	0.4	0.5	-0.1	0.2	0.6	0.2	1.4	3.0	-0.3	0.6	3.3
加勒比	0.1	0.1	0.0	0.1	0.0	0.1	2.8	2.5	2.8	1.7	2.0	2.8
中美洲	0.0	0.3	0.4	0.0	0.3	0.6	0.0	7.8	14.1	-0.8	8.1	16.5
南美	0.0	0.1	-0.1	-0.2	-0.1	-0.2	-0.1	0.2	-0.4	-0.8	-0.5	-1.0
北美	2.0	2.4	1.6	0.4	2.9	1.9	2.7	2.6	2.8	0.6	3.6	3.6
加拿大	0.3	0.2	0.2	0.2	0.2	0.2	1.8	1.3	1.9	1.3	0.9	1.8
美利坚合众国	1.7	2.2	1.4	0.2	2.8	1.7	3.0	3.0	3.0	0.4	4.4	3.8
欧洲和前苏联	2.2	1.9	1.1	2.7	1.5	1.0	2.7	1.9	1.9	3.0	1.4	1.7
转型经济体 <sup>d</sup>	-0.2	-0.1	-0.1	-0.2	-0.1	-0.1	-1.7	-0.7	-1.4	-1.7	-0.9	-1.5
西欧	2.4	2.0	1.2	2.8	1.6	1.1	3.6	2.3	2.2	3.7	1.6	1.9
大洋洲	0.5	0.4	0.3	0.3	0.4	0.3	3.2	2.3	2.9	2.5	1.9	2.3
澳大利亚	0.4	0.4	0.3	0.3	0.3	0.2	3.2	2.6	3.1	2.5	2.2	2.6
新西兰	0.1	0.0	0.0	0.0	0.1	0.1	3.0	0.1	1.5	1.9	0.1	1.0

资料来源:Lim,1998年。原数据来自《总体移徙趋势》第4修订版(POP/18/96/1/Rev.4),数据库由联合国人口司保持。

- <sup>a</sup> 包括欧洲和北美所有地区、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
- <sup>b</sup> 包括非洲、亚洲(日本除外)和拉丁美洲所有地区以及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和玻利尼西亚地区。
- <sup>c</sup> 不包括中国。
- <sup>d</sup> 包括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前捷克斯洛伐克、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和前南斯拉夫,不包括前苏联。

表三.3

## 选定年份和区域移徙妇女和男子(包括难民)估计人数

主要地区或区域	移 徙 者 (以百万计)						妇女占移徙者总数的百分比		
	女			男			1975	1985	1990
	1975	1985	1990	1975	1985	1990			
全世界共计	40.1	50	57.1	44.4	55.2	62.6	47	48	48
发达国家 <sup>a</sup>	19.2	24	27.1	19.1	24	27.2	50	50	50
发展中国家 <sup>b</sup>	20.9	26	30.1	25.3	31.2	35.5	45	45	46
非洲	4.9	5.7	7.2	6.3	6.8	8.4	44	46	46
北非	0.5	1	0.9	0.6	1.2	1.1	46	46	45
撒南非洲	4.4	4.7	6.3	5.7	5.6	7.3	43	45	46
亚洲(包括中国)	13.5	17.4	19.4	16.1	21.4	23.3	46	45	45
东亚和南亚 <sup>c</sup>	3.6	3.5	3.6	4.2	4.1	4	46	46	48
南亚	7.3	9.2	10	8.3	10	10.8	47	48	48
西亚	2.7	4.6	5.7	3.7	7.2	8.6	42	39	40
北美	8.2	10.6	12.2	6.9	9.8	11.7	54	52	51
加拿大	1.7	2.0	2.2	1.7	1.9	2.1	50	51	51
美利坚合众国	6.4	8.6	10.0	5.1	7.9	9.6	56	52	51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2.7	3.1	3.6	3.1	3.3	3.9	47	49	48
加勒比	0.3	0.4	0.5	0.4	0.5	0.5	46	47	47
中美洲	0.2	0.5	0.9	0.2	0.5	1.1	50	49	46
南美	2.2	2.3	2.2	2.5	2.4	2.2	47	49	50
欧洲和前苏联	9.3	11.2	12.3	10.3	11.8	12.8	47	49	49
转型经济国家 <sup>d</sup>	1.3	1.2	1.1	1.1	1.0	0.9	55	55	55
西欧	7.9	9.9	11.1	9.1	10.7	11.8	46	48	48
大洋洲	1.6	2	2.3	1.7	2.1	2.4	47	48	49
澳大利亚	1.3	1.6	1.9	1.4	1.7	2.0	47	49	49
新西兰	0.2	0.2	0.3	0.2	0.2	0.2	50	50	50

资料来源:Lim,1998年。原数据来自《总体移徙趋势》第4修订版(POP/18/96/1/Rev.4),数据库由联合国人口司保持。

<sup>a</sup> 包括欧洲和北美所有地区、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

<sup>b</sup> 包括非洲、亚洲(日本除外)和拉丁美洲所有地区以及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和玻利尼西亚地区。

<sup>c</sup> 不包括中国。

<sup>d</sup> 包括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前捷克斯洛伐克、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和前南斯拉夫,不包括前苏联。

201. 发达国家和石油丰富的中东国家一直需要一些从事护理等传统女性职业的女性专业人员(Skeldon,1998 年)。例如,菲律宾是主要护士输出国,估计每年 7 000 名毕业护士中有 70% 移徙国外。<sup>59</sup> 在与日俱增的跨国流动高技能专业人员中,妇女人数也在不断增加(Galtung,1996 年)。金融服务的全球化和多国公司的扩展帮助造就了一批高技能的国际专业人员、经理和顾问。他们的工作经验开始类似于国际组织人员和外交官。妇女承担这些跨国专业工作的人数虽少,但在不断增加。进行政策讨论时,极少重点谈及这一类移徙妇女,主要是因为她们所面临的问题与非专业移徙妇女所面临的问题相比通常显得微不足道。

#### 1. 从事制造业装配线工作的“受租用”工人的临时移徙

202.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各国相互竞争,兜售其劳动力,出最低价获得业务(Donahue,1994 年,第 47 页)。“雇主为了对付全球竞争,尽可能降低成本,可将生产迁移到国外或雇用移徙工人,从而用外国工人取代本国工人”(Lim,1998 年,第 5 页)。换言之,劳动力密集型工作或者迁移到可获得廉价劳动力的地方,或者在无法迁移时,就“租用”劳工从事这些工作。在这一过程中,无技能的移徙妇女是廉价、灵活的劳工的另一来源。

203. 与大公司不同,工业国的中小型公司通常缺乏迁移到低工资地点所需的资源。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日本、大韩民国、中国台湾省等国家和地区对外国工人的需求不断增加,而同时各公司在其他国家的投资也不断增加。在这些国家,“……本国几乎没有可灵活聘用的工人,小规模制造业仍然相当重要,对公司的灵活性又有各种限制,所有这些产生了对外国工人的需求”(移徙新闻,1996 年,第 2 页)。在 1980 年代前的经济蓬勃发展时期,这些国家能够以“婴儿高潮期”出生的新工人、以前的农民和进入劳工市场的妇女填补新创造的就业。<sup>60</sup> 然而,在 1990 年代,对这些经济体来说,由于不再有国内预备劳工,就得利用移徙工人作为“缓冲器”(移徙新闻,1996 年,第 2 页)。在大韩民国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雇用外国工人是小型工业的一个现象,接受采访的三分之二的公司称,年纪较大的韩国工人和家庭妇女无法从事外国年轻工人能够做的强体力劳动”(Lim,1997 年,第 8 页)。同样,在美利坚合众国,以劳动力密集型的生产工作为主的制造业不断萎缩,因此,这项行业对无技术的移徙女工的需求不断增加(Sassen,1993 年)。这些部门的生产也日益迁移到低工资国家。

204. 在过去 20 年中,劳动力密集型生产从高工资国家迁移到低工资国家的过程还刺激女性劳工从农村涌向城市,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不仅有国内移徙,而且还出现了跨国移徙。在东亚和东南亚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这种情况特别突出,那里的出口加工区具有吸引力,使农村妇女临时移徙到城市,并刺激了国际移徙。例如,迁移到泰国的公司从农村地区吸引了许多年轻妇女从事轻工业工作(主要是纺织品、电子产品和玩具)。在 1985 年至 1990 年期间,从农村地区移徙到曼谷的妇女与男子的比例是 100 比 87(移徙新闻,1996 年,第 15 页)。<sup>61</sup> 然而,1997 年开始席卷亚洲的经济危机使东南

<sup>59</sup> 据认为,这些专业妇女移徙的主要原因是增加其收入,并有更好的职业发展机会 (Stalker,1997 年)。1991 年,菲律宾护士在海湾国家赚取的收入是在菲律宾的收入的 3 倍,在美国赚取的收入是在菲律宾收入的 18 倍(同上)。

<sup>60</sup> Heyzer(1982 年)记载了妇女从农村到城市的移徙情况以及从马来西亚西部移徙到新加坡从事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工作的情况。

<sup>61</sup> 无技能的男性移徙者主要从事建筑业工作(Skeldon,1998 年,第 15 页)。

亚各城市工业生产规模萎缩,就业机会极少,迫使失业者返回他们原来所在的农村地区(Ghosh,1998年,Richburg,1998年)。

205. 在拉丁美洲,虽然传统上移徙到区域以外各国的人是前往北美,主要是前往美利坚合众国,但在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期间,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尤其是该区域石油生产国的迅速工业化导致出现了区域内的流动。阿根廷、墨西哥和委内瑞拉吸引了许多分区域的移徙者。预计在今后几年内,随着经济一体化的进展和经济运作的改进,区域内劳工移徙流动可能会加快步伐。目前分区域的一些人口已转而流向智利,因为智利的出口和收入都在迅速增长,而传统上吸引玻利维亚和巴拉圭移徙者的邻国阿根廷却正处于衰退之中,失业率很高。

## 2. 帮佣工人和娱乐界雇员

206. 帮佣工人的工作又脏、又危险、又困难,富国工人不再愿意做,因此,国际上对帮佣工人的需求为妇女提供了少有的机会,使她们可以作为工人合法移徙到发达国家。移徙帮佣工人使发达国家妇女能有更大的流动性,使她们不必做家务,从而随着收入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可以从事专业职业。随着发达国家劳工市场就业机会的增加,对帮佣工作的需求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很可能会增加。由于发达国家人口老化,更加需要工作,因而又增加了对移徙工人的需求。性别隔离的情况持续存在(照料工作和帮佣工作都划归为女性工作),这意味着这些趋势对移徙女工的影响不成比例地大于对男子的影响。

207. 在西亚,对下列各种活动的需求不断增加,首先是帮佣工作、娱乐界工作(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色情业者的工作),其次是护理和教学,因此,西亚是移徙女工前往的另一区域。在中东石油丰富的国家,由于收入增加,产生了新的生活方式。“……在阿拉伯家庭,雇有外国帮佣成了繁荣的象征”(Alunan,1993年)。在一些中东国家,例如科威特,在亚洲移徙妇女就业增加的同时,当地妇女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就业不断增加(Russell,1995年)。在东亚新兴工业国,中等收入家庭对帮佣的需求也在增加,因为这些家庭的妇女已越来越多地进入正规劳工市场(Lim,1998年,第9页)。

208. 移徙妇女由于她们的移徙地位和性别,就国际移徙而言,还由于她们是外国人,遭受多种形式的歧视和暴力。如上文所述,占比例越来越高的移徙女工从事帮佣工作和娱乐工作。在对移徙帮佣工人需求增加的许多区域、国家和地区(例如西亚和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订有接纳外国帮佣工人的特别规定。但虽然合法接纳能保证公平对待移徙帮佣工人,但同时也使工人束缚于某一特定类型的就业,甚至只能替特定雇主工作。帮佣工人通常在孤立的工作环境中工作,劳动时间长,缺乏社会接触。此外,由于移徙帮佣工人须依靠雇主才有权留在东道国,并且缺乏充分的法律保护,因此她们很容易遭受暴力,包括性暴力和其他暴力(Eelens,1995年)。

209. 尽管存在这些问题,对许多国家的政府来说,输出女工已成为一项主要经济战略,借以获取处理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所迫切需要的外汇。<sup>62</sup> 输出移徙女工的主要国家是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斯里兰卡和泰国;接纳移徙女工的主要国家和地区是文莱、香港特别行政区、日本、科威特、沙特阿拉伯、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省(联合国,1997年)。到 1995 年底,在香港至少有 152 000 名外国帮佣,在新加坡有 8 万多名。另据报告,到 1996 年,在科威特有 133 000 名女佣(联合国,1997年,第4页)。

<sup>62</sup> 例如,印度尼西亚在其 1989-1994 年五年计划期间打算向外国输送 50 万移徙妇女(联合国,1997年)。

210. 由于许多接受国对接纳移徙工人实行限制,因此无证移徙者人数明显增加,她们愿意在非法条件下从事帮佣工作。无证移徙者容易受到警察骚扰、查抄和拘留,特别容易遭受虐待和暴力,因为她们得不到保护,在东道国经常受到迫害。直接同联合王国的外国帮佣工人联系的两个非政府组织<sup>63</sup>详细记录了 2 000 多个虐待和凌辱移徙帮佣工人的案件,受虐待的许多人是无证工人。有充分证据表明,通过非法、无证和地下渠道移徙的妇女人数已经增加(联合国,1996 年)。据估计,单单在亚洲就有 70 万非法移徙妇女(移徙新闻,1996 年)。

211. 与娱乐有关的就业是喜欢雇用移徙妇女的另一部门。由于在色情业作为“招待”或作为妓女的移徙者通常是非法工作,并且被认为是社会渣滓,这些人的人数难以查明。现有数据表明,这种经济活动在增加,并且通常是在贩卖人口的背景下发生的。例如,1994 年,约 90 562 人作为“招待”进入日本,而在 1990 年,这些人的人数是 75 091 人。大多数招待来自菲律宾和泰国(Skeldon,1998 年)。

212. 东欧有许多妇女移徙国外充当色情业者。东欧和中欧各国转型经济带来的失业和贫穷的增加对妇女的影响比对男子的影响更加严重,促使她们前往外国寻找就业机会。“皮包旅游”已成为许多妇女的普通职业,她们销售从邻国买来的货物。经常跨越国界也使她们了解其他谋生方式,最显著的是卖淫。一种与卖淫有关的主要贩卖活动已从东欧和中欧(主要是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发展起来,为西欧各国、亚洲一些大城市和世界各地的国际旅游中心提供色情业者。时至今日,贩卖妇女和卖淫已成为十分有利可图的行业,由具有国际规模、组织严密的犯罪集团经营(联合国,1997 年,第 48 页)。

### 方框三.3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加拿大和欧洲移徙帮佣工人的组织情况

虽然组织帮佣工人有困难,但在最近几十年中在若干国家已作出成功的努力。

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移徙帮佣女工已经组织起来,于 1988 年成立了亚洲帮佣工人工会。今天,该工会有 1 700 多名成员。这些成员分别来自菲律宾、泰国以及南亚和东南亚其他国家。该组织由其成员经管。

亚洲帮佣工人工会的工作是在劳工怨情(虐待或付薪不足)、警察案件(殴打和/或性攻击)和移民问题(非法工作、就业改变、滞留逾期)等方面提供协助。许多案件的处理已获得积极结果。此外,该工会还为遇到问题的工人提供电话咨询。

移徙妇女组织起来的另一例子是为争取留在加拿大的权利而开展的斗争。加拿大原来只允许帮佣工人凭临时许可证居留 3 年。结束对帮佣工人的剥削国际联盟于 1979 年成立,作为争取工人权利的各个社区团体的联盟,并成为一多种族的帮佣工人组织。1981 年,在该联盟的压力下,加拿大政府允许帮佣工人在加拿大工作两年之后有权申请永久居留地位。

最后,在欧洲已采取若干步骤使移徙妇女组织起来。1992 年在巴塞罗纳召开了题为“增强在欧洲的菲律宾妇女的能力”的会议。此外,欧洲一些附属于国际食品及有关行业工会联合会的一些工会也有帮佣工人作为会员。这些工会包括奥地利农业、粮食加工和饮食工会、德国粮食加工和饮食工会以及意大利商业、旅游业和服务业工人联合会/意大利劳工总联盟。

资料来源: Martens,1994 年。

<sup>63</sup> Kalayaan 和菲律宾移徙工人委员会。组织帮佣工人的努力见方框三.3。

## 四. 农村妇女不断变化的工作模式

213. 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部门都具有双重性:通常有一个由大中型农场(它们大都由男子或公司拥有)组成的健全的商业性农业次级部门,另外是由家庭经营的小块土地。

214. 小部分农村妇女在大型农场、种植园、农业加工厂和小型农村企业中找到工作。特别是在南亚和东南亚,妇女在种植茶叶、橡胶、可可、椰子和水果的种植园劳工中占很大比例。但是,发展中国家农村地区的绝大多数女工都是自营职业者。可将其分为三大类:

- (a) 农场或小型企业中的“共同耕种者”或无酬劳的家庭劳力;
- (b) 自给性农民(主要种植供家庭消费的粮食);
- (c) 微型非农业商人和工匠(基本上是非全日工)。

215. 除了生产性工作以外,多数社会的传统分工都让妇女主要负责家务活,例如清扫、烧煮、育儿、照顾病人和老人以及挑水劈柴等。除了这方面的责任之外,她们还要下田、从事有薪酬的劳作或产生收入活动,因此生活在贫穷中的多数男女工作负担都过于沉重。每天工时可长达 16 小时,很少有时间休息或娱乐。

216. 如方框四.1 所示,在发展中国家,半数以上的妇女仍从事农业。在某些地区,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和西亚,男子比妇女更快地离开农业,使从事农业的妇女相对更加集中。例如,在印度,有 86% 的农村女工从事农业,而农村男性工人只有 74%,而且,这一性别差距正在扩大。此外,女性在家庭户主中占很大的百分比(孟加拉国和印度大约是 20%), (Agarwal, 1997 年 a, 第 1376 页)。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这一数字大约是 30%。

### A. 计算农村妇女的工时

217. 农村妇女往往同时担任几种角色和应付几种活动,因此很难界定和衡量她们所做的工作。官方统计和调查仍倾向于只计算有酬劳的工作或询问一个人主要从事什么工作。在一天中,除了其他活计外,农村妇女可能要在家庭的小块土地上耕种、饲养牲口、捕鱼、拾柴火、运粮和卖粮、加工粮食、织布和做手工艺品,从而无法回答这类事先准备好的问题。她们在农忙时可能当领取薪酬的劳工,但是由于调查或普查是在淡季进行的,所以没有报告。可能是因为官方定义和资料收集程序不足以评估无薪酬、非正规经济活动的价值和性质及实际就业和活动水平,因此在确定和衡量农村妇女工作时会产生各种问题(粮农组织,1996 年 b;联合国,1995 年)。

218. 数据收集方法有所改变,列入自耕农的人数从而开始承认妇女从事的生产性工作。如此一来,妇女在劳工队伍中比率的有关估计数有所提高。例如,由美洲农业合作研究所(美洲农合所)——美洲开发银行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若干拉丁美洲国家的官方统计没有将妇女在家庭粮食生产中的工作计算在内,而未列入四分之一以上的农业劳动力(图四.1)。

插入图四.1

#### 方框四.1

##### 妇女参与农业

下列有关妇女参与农业的已有统计摘要是由粮农组织准备的。有关妇女参与农业的已有统计在多数情况下并未完全反映实情。据认为,有关妇女在粮食作物生产方面的作用的实际数字比本摘要的数字更加引人注目。

撒哈拉以南非洲:在供家庭消费和出售的粮食生产中,妇女占 60%至 80%的劳力。妇女在家庭粮食生产中的贡献程度不一,从苏丹的 30%到刚果的 80%,而妇女在从事农业经济活动的劳动力中所占比率介于布基纳法索的 48%和刚果的 73%之间(粮农组织,1995 年 c)。

亚洲:在整个区域大约 50%的粮食生产是由妇女进行的,但是各国的情况差别很大。举例说,泰国妇女在农业劳动力中占 60%以上、印度尼西亚妇女占 54%、孟加拉国、尼泊尔和菲律宾妇女约占 46%;马来西亚妇女占 35%(粮农组织 1996b;亚

太经社会,1996年 a、f 和 h)。东南亚的妇女在稻米生产中发挥重大作用,通常从事无薪酬的家务劳作或有薪酬的必要播种、耕种、收割和加工工作(粮农组织,1996年 b)。

太平洋:妇女在渔业和粮食销售以及包括棕榈油、干椰子仁、椰子油、香草、咖啡和可可在内的劳动密集型经济作物加工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人口绝大多数在农村(87%),妇女占农业劳动力的 71%。斐济的妇女占农业劳动力的 38%(粮农组织 1996 年 b)。

近东:现有的计算方法,加之男子不愿承认其妻子和女儿在家庭以外从事的经济活动,致使有关妇女参与经济活动的上报数字过低。最近的研究表明,如果将无酬劳和季节工计算在内,妇女对农业的贡献是重大的。在土耳其,妇女占无薪酬农工的 55.3%、在摩洛哥占 53.2%、在埃及占 50.7%、在黎巴嫩占 40.7%、在伊拉克占 30.7%、在毛里塔尼亚占 28%(粮农组织,1996 年 b)。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官方统计低估了妇女对农业生产的贡献,因为妇女主要在家庭农场从事无薪酬的劳动。将妇女在粮食生产方面的工作包括在内的一项研究表明,妇女在该区域的农村劳动力中占很大的比重(见图四.1)。还雇用更多的妇女从事非传统性的出口作物的生产。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1996 年 b。

## B. 农业的商业化和市场自由化

219. 在过去 20 年里,农业发展越来越面向市场。很多发展中国家为了促进新型增长,提出了经济自由化政策。这些政策促进了贸易和市场的自由化、倾向于大型商业性耕种和种植出口经济作物,而不是家庭自给性生产,其假设是,前者更容易提高生产力(粮农组织,1996 年 b)。为了促进市场关系,政府赞助的农业服务,列如培训和推广工作以及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相应缩减了(Alexandratros,1995 年)。

220. 期望通过这些政策,在增长和减少贫穷方面获得广泛和长期利益的目标未能实现。<sup>64</sup> 生活较富裕的农民似乎从中受益,但是对小户农民产生的总体影响似乎是消极的,有时甚至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例如,由于对农村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缩减,农村地区通往城镇的小型支线道路不能再得到养护,从而妨碍了小户农民实际进入市场。政府推广和培训方案的缩减也削弱了小户农民通过加强技能获取新的市场机会的能力,从而也破坏了促进市场关系的目标。

221. 总的来说,市场自由化使妇女受到过分消极的影响。与男子相比,她们无力保护自己不受其不良后果的影响,也不能从由其产生的机会中受益。一般来说,与男子相比,她们掌管或拥有较少的资产或财产、没有什么现金收入、政治权力微不足道和

<sup>64</sup> 世界银行(1994 年)强调市场自由化对农业产出的增长具有积极影响,但是其他人则在有关文献中指出它对贫穷的农民的福利产生的灾难性后果(cornia 等人,1987 年;Commander,1989 年;Duncan 和 Howell,1992 年;Stewart,1995 年)。在少数情况下,自由化可能既提高了产出的增长,又减少了贫穷(Beffes 和 Guatam,1996 年)。

受教育较少。此外,由于妇女并非总能控制其劳动所得,也可能因此而无意留心不断变化的市场信号(粮农组织,1996年 b;Jazairy 等人,1992年)。肯尼亚的例子说明奖励可产生不同的结果。在肯尼亚,用同样的改良方法生产玉米,由妇女掌管的土地的产量增加了 56%,而在由妇女耕种但由男子控制出售玉米的收入的土地上,产量只增加了 15%(Elson,1995年)。

222. 开放地方市场接受更廉价的进口货物和取消农业补贴使进行小规模生产的农民普遍丧失就业机会,而这些农民更有可能是妇女,而不是男子。第二章将论述按性别区分的这些工作消失所产生的后果和市场自由化产生的新的就业机会是否足以对此作出补偿的问题。本章的讨论重点是,面向市场的发展政策通过对性别分工、财产关系和家庭生存战略产生影响而在性别方面产生的其他结果。

### 1. 按性别分工

223. 从家庭自给生产转向经济作物的生产是农业商业化的特点之一。随着更多地采购投入物资和出售了大部分产出,通过市场与外界经济建立了联系。

224.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很多地区,经济作物的引进改变了性别的分工和对家庭资源的管理。一般来说,妇女继续管理家庭粮食生产(Tibaijuka,1994年),经济作物则成为男子的主要经济活动。要求妇女对经济作物生产(特别是劳动密集型活动)贡献劳力,同时接管传统上由男子承担的工作,例如土地整治和耕种。

225. 例如,尼日利亚的伊博妇女历来主要负责家庭粮食生产。她们参加播种、除草、收割,从事畜牧业和粮食加工业,而男人们则负责土地整治(Ezumah 和 Di Domenico,1997年)。然而,由于男子更多地种植经济作物、从事非农业活动和领取薪酬的工作,原先由男子干的活也由妇女负责承担(Karl,1997年)。同样,在加纳,在播种前清理浓密的灌木的活从来都是由男子承担,但由于他们要从事其他工作,因此作物轮作的时间加长,因为妇女靠现有的工具无法清理灌木(粮农组织,1996c)。

226.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很多地区,在前往矿区和城市寻找就业机会的移徙者中,男子占大多数,留下女农民承担男子干的农活。尽管几乎所有地区的女户主家庭都在增加,但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加勒比的情况十分引人注目,在这些地区,大约 30%的农村家庭的户主是妇女。在劳力不足的女户主家庭中,妇女安排与其他妇女换工,延长自己的工作时间,或在有足够的汇款或其他收入来源的情况下雇用劳工。但是,她们也可能采取其他应付战略,例如减少耕种面积、改种劳动强度较低,但是营养价值也较低的作物,这两种做法都会危及家庭的粮食安全(粮农组织,1995年 a 和 1996年 b;Heyzer,1987年;Jazairy 等人 1992年;Karl,1997年)。

227. 总的来说,用于自给生产的家庭资源的减少已产生了减少粮食安全的后果,即使是整个家庭收入因种植经济作物而有所增加(Lado,1992年)。这是因为,一贯由男子控制的经济作物收入一般都不充作家用,而妇女的收入主要用于食品和其他必须

品。这说明了为何由男子控制的现金收入的增加不一定能够改善家庭的营养摄取和粮食安全。<sup>65</sup>

228. 由于日益依赖以市场销售为目的的生产,农户的粮食安全与福利也受到威胁。农民更加经不起收成不好的打击,因为他们越来越依靠市场获取农业投入,而且市场自由化也致使价格提高和更为多变(Barrett,1998 年)。

229. 有些国家已认识到妇女从事家庭自给性生产对粮食安全的重要性并采取措施加以支持。例如,纳米比亚已改变了在这方面的政策。在 1995 年之前,政府的资源主要用于公有地区的商业活动,向能够供生产销售棉花等经济作物或牲畜的农民提供技术援助、投入和信贷。主要受益者是较富裕的农民,他们基本上是男子(Girvan,1995 年)。1995 年由政府核准的新的国家农业政策带来了巨大变化。该项新政策除了确认妇女在农业中的重要作用以外,还向中小型农民,特别是女户主家庭提供推广服务(纳米比亚,1995 年;Sontheimer,1997 年)。

230. 在其他多数发展中国家,支持市场自由化的农业政策一般都继续有利于被认为更有潜力提高产量的大型农场。尽管小农户和维持生计农民通常都占农村人口的绝大多数,但是由于其资产较少和潜力较小,决策人士、各机构和服务提供者对他们的注意也较少。

## 2. 私有化

231. 与这些面向市场的农业政策密切有关的另一趋势就是促成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的私有化。在多数非洲国家,带有西方色彩的私有财产制度正在取代传统的土地占有制度(Lastarria-Cornhiel,1997 年)。总的来说,私有化通过正式授予土地和水域的所有权,加强了力量已经很强大的集团对这些资源的控制,对小户农民造成损害,特别是限制了妇女的权利和她们对资源的获取(Lastarria-Cornhiel,1997 年;Meer,1997 年;Dey-Abbas,1992 年)。由于土地是贷款的抵押并是获取其他资源、服务和参与地方决策进程的一种手段,男女在拥有控制土地方面的差异可能是说明在经济福利、社会地位和赋予权利方面男女之间存在差距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Agarwal,1995 年)。

232. 在很多传统的耕作制度中,性别是决定土地保有权及控制和获取土地权利的一项基本因素。例如,在大多数非洲国家中,很少有妇女拥有或有权支配她们所控制的土地和进行自给生产的土地。但是,习俗制度承认她们有权拥有土地,尽管这些权利并非总是有明确的定义或与男子的权利相同(Lastarria-Cornhiel,1997 年)。相反,在南亚,农用土地已基本上为个人所有。并未正式禁止妇女拥有土地和财产。但是,特别是在习惯上的限制仍占上风的国家,与男子相比,妇女在遗产权方面实际上经常受到歧视。而且,她们也常常将继承的财产交给男性亲属,以确保继续获得男性的支助和保护(Agarwal,1994 年)。

<sup>65</sup> 出于同样的原因,妇女在商品农业和农工业中的就业机会使她们的工资有所增加,对整个家庭的健康和福利也产生了有利的影响(Collins,1995 年;粮农组织,1995 年 a、1995 年 c、1996 年 b;粮农组织/RAPA,1995 年;Jazairy 等人,1992 年;和 Karl,1995 年)。

233. 在有些国家,正式立法赋予妇女的权利可能还不如她们根据习俗惯例享有的权利。而另一些国家的情况则相反。法律可能肯定妇女拥有财产的基本权利,而习俗惯例可能限制法律的实施(粮农组织,1996年d)。在亚洲地区,保有权安排方面的变化多数都发生在对公有牧场和国家森林保护区的管理上。根据社区管理安排,正将更多的资源管理下放到地方一级。<sup>66</sup> 从原则上讲,妇女应能够从中受益,但是通常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妇女一般都处于新的社区管理结构的边缘(Guijt 和 Shah,1998年;Agarwal,1997年a;Sarin,1995年)。

234. 同样,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大力推行的由国家领导的土地改革计划中,妇女基本上受到忽视。由于这些方案将产权交给被假定是男子的户主,因此它们严重偏向男子。<sup>67</sup> 相反,在南亚(Agarwal,1994年)和拉丁美洲(Deere 和 Leon,1997年)的某些地区,由于最近的计划向配偶双方提供共有产权或试图单独以妇女为对象,妇女的境况似乎更好一些。例如在哥伦比亚,土地分配方案最优先考虑的是身为户主的妇女或按照其他标准被认为是处境不利的妇女;例如因战争而流离失所的妇女。

235. 1990年代的总体趋势是从国家领导的土地改革转为更加依赖市场机制。很多国家促进土地私有制,认为有明确可靠的土地保有权是小户农民对市场刺激作出反应的必要条件。据认为,如果没有一份明确和可靠的产权,农民就没有提高土地生产力的动力。不过最近几年,这一观点受到广泛的批评(Sjaastad 和 Bromley,1997年;Besley,1995年)。人们发现将效率不高普遍归咎于传统的土地保有制不仅是夸大其词,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低效率在建立在个人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制度中也是司空见惯的(Dujon,1997年)。同样,在印度的部分地区,社区资源管理在防止自然资源退化方面已证实比私有制或国家所有制更为有效(Agarwal,1997年b)。

236. 还有人提出,如果妇女拥有土地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可能会抑制她们对土地进行投资,因为提高生产力很可能导致她们失去对土地的控制。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确实发生过这种情况。男子接管了原来由妇女管理的土地上的收成。与依靠雨水浇灌的作物相比,引入灌溉系统使得劳作的收获有明显增加。对冈比亚进行的一些研究表明,妇女在稻田发展了灌溉系统之后,便丧失了固定使用和拥有稻田的权利,即使她们的名字仍列入政府颁发的租佃契据上。结果,稻米已不再是女性管理的一种作物,而是由男性户主控制的一种家庭作物。由于妇女不得不耕种由男子控制的作物,而非在自己的田里工作,男子也更加能够指挥女性劳工(Dey-Abbas,1992年)。同样,对亚洲进行的一些研究也表明,作为灌溉计划一部分引进的机械化导致耕作方式的改变,往往由男劳力取代女劳力(粮农组织,1996年c)。同样,大部分小户农民,特别是妇女粮食生产者或是因为买不起化肥和杀虫剂等,向外界购置的必要投入,或是因高产作

<sup>66</sup> 但是,在东南亚的部分地区,对拥有大片热带森林所作的安排正好相反:政府取消了农民和社区惯有的权利,通过发放许可证,将开发的专属权授予大型商业伐木商。

<sup>67</sup> 例如,在拉丁美洲的土地改革中,妇女的境况很糟,女性直接受益者在智利几乎是零,在墨西哥是15%。在土地改革中,很多政府发起的灌溉计划也严重偏向男子(Zwarteveen,1995年,NEDA,1997年)。

物的种植使她们处于边缘化地位,大都未得益于高产作物品种的引进(粮农组织,1996年 e)。

237. 尽管从理论上说,土地市场对每个人开放,但是农村的穷人——男子和妇女——由于缺少三个基本条件而不能利用市场制度:(a) 有关新法律和方案的信息;(b) 购买土地的资金;和(c) 获取信贷。但是,妇女的处境尤其不利,这并不是因为她们正式受到市场的排挤,而是因为与男子相比,她们更少有机会充分获得贷款、有政治关系和掌握有关公共机构的知识。人们对她们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所抱有的传统期望可成为一个严重障碍。能够存足钱购买土地的妇女一般都是受雇工作的城市妇女或近郊妇女,她们种植粮食是为了销售到城市市场(Lastarria-Cornhiel,1997年)。因此,妇女在习惯的保有权制度下享有的有限但得到社会公认的土地权利在过渡到以市场为基础的保有权制度时很可能会丧失。不论这一过渡是通过土地改革还是靠市场力量进行的,男子作为户主往往获得土地的全部合法产权,妇女往往处于边缘。但是,如以上冈比亚的例子所示,随着经济状况的改变,妇女在传统的土地所有权制度下对土地拥有的惯有权利也会被取消。

238. 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的南非政府力求解决其中的一些问题,在南非的土地改革方案中优先考虑穷人,特别是妇女。该项方案的土地分配部分,为贫穷家庭的人提供赠款,以便从愿意出售土地的卖主那里购买土地,试图以此推动妇女拥有土地。<sup>68</sup> 南非的方案所具有的启发性还在于,它表明各国政府都可以通过消除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所产生的不公平现象,在以市场为基础的土地改革中发挥关键作用(Meer,1997年)。同样的,最近的两项研究——一项是调查中美洲的土地改革,另一项是调查整个拉丁美洲的土地改革——表明,授予土地产权和私有化与国家发起的土地再分配相比,可能更有利于妇女,因为它通过购买或提出合法要求为农村人口获取土地提供了新的选择(Deere 和 Leon,1997年;Galan,1998年)。<sup>69</sup>

239. 非政府组织也想出一些其他的创造性办法,利用市场制度来使贫穷妇女获益。与印度南部 Andhra Pradesh 无地妇女合作社开展合作的非政府组织,德干开发协会便是一个有趣的例子。德干开发协会帮助贫穷的村妇利用政府减少贫穷的各项计划,通过购买或租佃方式获取土地。购买的土地通常都分割成块,分给合作社单独独立业主登记的合作社成员,但集体耕种(Agarwal,1997年 b)。在此过程中,妇女参与从销售产品到与政府官员打交道和雇用拖拉机和和其他设备的各种活动。印度其他地区 and 孟加拉国也有同样的例子,证明妇女在市场上采取联合行动,以克服她们独自面临的不利处境(Agarwal,1997年 b)。

<sup>68</sup> 但是,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也许需要作出更大努力,以确保妇女从土地改革中受益。有人指出,提供的赠款与土地价格相比是微不足道的(Meer,1997年)。

<sup>69</sup> 但是,这两项研究都强调,除了在法律上作出顾及性别问题的修改外,还需作出很大的努力,消除在民法和家庭法中残留的歧视妇女的法律障碍、使官员保持敏感以承认妇女的权利、与妇女交流信息,使她们了解自己的权利和向她们提供支助,支持她们根据再分配方案提出土地所有权要求。此外,接受赠款购买土地的人必须能够获得信贷和推广等服务,以便能够开发其土地,过上像样的农民生活。

## C. 家庭对市场经济的反应

### 1. 创业活动

240. 各开发机构日益促进农村妇女建立粮食加工和其他农工业的微型企业,作为减少农村贫穷、消除两性不平等和推动贫穷农业国家的经济增长的有利于市场的方法。面向市场政策和全球化目前促成的经济改革为农村妇女的创业活动提供了新的机会。但是,在妇女利用这些机会之前,必须克服获取投入、进入市场、得到技术培训和贷款方面所面临的限制。

241. 在过去 20 年,孟加拉国的一家农村银行(格拉米银行)<sup>70</sup> 首先执行了为支持农村贫穷妇女建立的小型企业而特别制订的微额信贷计划(Yunus,1997)。为了得到贷款,鼓励妇女参加初级培训课程并自己组成团组定期开会。格拉米银行活跃于孟加拉国半数以上的村庄,现已拥有二千多万名成员,其中 90%是妇女。格拉米银行在国际上得到广泛赞扬,它的成功——偿还率特别高——深深影响了为世界各地思考经济发展的方式。目前,微额信贷和提供信贷计划已成为多数双边和多边发展机构私营志愿组织和很多非政府组织发展项目的支柱。

242. 很多研究记载了格拉米银行的微额信贷方案对农村妇女产生的提高能力的效果。对六个村庄进行的一项研究(Hashemi 等人,1996 年)发现,参加方案的妇女提高了流动性和经济安全、加强了对重大家庭决定的参与并提高了自己的购买能力。随后利用这项研究数据所作的一项研究发现妇女获得贷款也增加了对避孕措施的使用(Schuler 等人,1997 年)。但是消极的方面是,捐助方和国际开发界更愿意首先奖励财政上的成功,当妇女的福利与财政可持续性发生冲突时,银行很可能会采取牺牲妇女福利的作法。据报道,“银行员工和同行成员向借款人施加巨大的压力,促其及时偿还并非象银行最初设想的那样,努力提高集体责任和赋予借款人权力”(Rahman,1999 年)。

243. 最近在世界各地进行的很多其他研究主张在看待微型企业(进而是微额信贷)在发展中的作用时持更加谨慎(甚至怀疑)的态度。<sup>71</sup> 有一项研究审查了微额筹资方案在三个非洲国家(加纳、肯尼亚、马拉维)所产生的影响,发现方案未对其受益者产生“重大”或“持续”的影响,并对最近“捐助者厚爱”微额筹资提出告诫,因为这会转移视线,不去注意其他必要的和可能为有关的干预措施(Buckley,1997 年)。最近在肯尼亚进行的另一项研究发现,在作为家庭生计唯一来源的农村微型企业中,15%所产生的收入金额没有超过世界银行确定的赤贫线。<sup>72</sup> 从统计上看,这些微型企业是否获得微额信贷对其可以赚取的收入金额并无重大影响(Daniels,1999 年)。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些微型企业不论是男人拥有还是女人拥有,其业绩都不会有何不同,即使有,

<sup>70</sup> 孟加拉国农村促进委员会(农村促进委员会)是孟加拉国另一家也活跃在农村贫穷妇女中的银行,这家银行采取了与格拉米银行相同的措施。

<sup>71</sup> 关于对世界各地各种微额筹资方案进行的比较性分析,见 Hulme 和 Mosley,1996 年。

<sup>72</sup> 世界银行将赤贫线界定为满足一个人的粮食需求及一些非粮食必需品消费所需的最起码支出。

也是微乎其微。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另一项研究发现,业主性别不同所造成的差别还是很大。在妇女拥有的微型企业中,妇女工作时间更长,而报酬比男子少。妇女的企业也更多设在家庭中,依赖家庭关系获取劳力和信贷。<sup>73</sup> 这项研究还发现,绝大多数微型企业,无论其业主是男的还是女的,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生存手段,而不是开展创业活动的工具(Cottam,1993年)

## 2. 调整家庭分工

244. 在发展中国家的很多地区,贫穷的小土地拥有者对市场自由化作出的反应是调整其主要资源,即他们唯一可以动用的家庭劳力。尽管全球各地实际采用的应对方式可能差别很大,但是基本原则似乎是相同的。农村家庭力图应付市场经济的不定因素,但是却没有一个可协助他们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情况的有效的正规/法律体制结构。为了尽量减少收入无保障的情况,他们力求使其资源来源多样化,这通常意味着仅对家庭(性别)分工作出调整。由于最近几年已较少将长期移徙作为一项选择,家庭中的一些成员留在土地上,而另一些成员则在其他地方寻找临时工作,促成人们所称的“多边活动”<sup>74</sup> Le Heron,1991年)或“立足于土地的自由流动劳力”<sup>75</sup> (Erturk,1998年)。

245. 妇女在养育幼儿,干家务和在年轻时从事家庭生产活动方面负担过重。家务活是她们的基本工作,无人可取代,男劳力则不是这样(Tully,1990年)。男子在根据已有的工作机会改变其工作和日程安排方面比妇女有更大的灵活性。由于妇女缺少与男子相同的流动性,她们劳动的机会成本更低,她们也更愿意从事报酬低微而劳动强度大的工作。结果,在很多地区,由于男子寻找报酬更多的非农业工作,妇女则越来越多地承担生产力低下的通常是由男子来干的农活。在家庭组建的最初几年,子女是家庭的一项费用。在以后的年月里,他们成为一笔资产。有他们就可以灵活地分派工作,从而提高了家庭的保障(Erturk,1994年)

246. 例如在中东,男子从事城市中的建筑工作(或其他形式的有薪酬工作),而出于文化方面的原因流动性较小的妇女则在村庄及其周围地区从事有薪酬的工作。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在前往矿区和城市寻找就业机会的移徙者中,男子仍然占大多数。男子通常与家中的农场保持密切联系,在收割和其他农忙季节时偶尔返回帮忙。

247. 但是,在以出口为主导的工业化大量需要女劳力的一些地区,这一按性别分工的情况正在改变。最近几年,在东亚和拉丁美洲某些地区,妇女往往占移徙劳动者的大

<sup>73</sup> 在世界各地的所有微额信贷方案中,妇女是否有能力继续控制她们所得到的贷款是一个引起重大关注的问题(Goetz 和 Sen Gupta,1996年)

<sup>74</sup> Le Heron(1991年)用“多边活动”来说明农村家庭寻求多种工作选择。他观察到,为应付自1985年以来农业收入面临的压力,新西兰的多边活动水平已初步增加,甚至在这种压力减少之后仍在增加。

<sup>75</sup> 这一概念用于表明特别是大部分人口仍然从事农业的国家中的劳力供应体制已经固定下来。这一概念不同于资本主义之前关系中传统的依赖土地的劳动力以及伴随资本主义产生的自由劳力。

多数。在这些地区,男子更可能留在土地上,而妇女则外出挣取现金。农村妇女,特别是未婚少女外出到工厂、自由贸易区和农业出口企业工作,在日益贫穷和收入不保的情况下帮助家庭维生。举例说,对斯里兰卡的一项研究表明,自由贸易区有 60% 的女工来自干零星农活的无土地农村家庭,20% 来自仅能维持生存的农民家庭。他们外出是因为家庭极端贫穷而且在家乡没有就业选择,只能干零星农活和卖粮食(Goonatilake 和 Goonesekere,1988 年)。妇女除了在出口加工区寻找劳动强度大的装配工作以外,越来越多的人外出当家庭佣人或从事娱乐业工作<sup>76</sup> (Ghosh,1998 年;联合国,1995 年、1996 年 b)。

248. 但是,多数妇女移徙者象其男性同伴一样,一般都不能选择长期移徙。虽然国内大城市的失业人口增加、贫穷加剧和人口拥挤不堪使前往城市中心的长期移徙变得更加不可行,但是自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以来,国际劳工流动受到的限制也越来越紧。然而,在这个全球化年代,跨国的劳工流动增长率却不如资本流动增长率高。在农业市场自由化增加了离开土地的压力时,长期移徙的机会却稀少。由于多数发展中国家农村地区的劳工长期移徙前景日益渺茫,季节工/临时工的流动已成为很多家庭生存的模式。临时/季节性移徙的家庭成员的汇款使得留在土地上的边际生产单位也能生存,使农户能够作为独立的小土地持有者维生。很多土地上的小型和边际生产单位能够持续下去的这一进程也使得农村和城市劳力之间界线不明(Erturk,1998 年)

### 3. 组织

249. 参加农村组织可成为农村男女在一个日益以市场力量为特点的环境中巩固其地位的手段。但是,象工会这样的劳工组织的传统形式可能已经不是保护农村女工权利的最好工具。一方面,部分问题可能在于很难将农村地区的工人组织起来,原因是工作场所分散和相互隔绝,再加上既有自给性劳工、又有无报酬家庭劳工和领取薪酬的劳工。妇女识字率较低,没有时间组织起来,且传统价值观和权力结构把女性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这很可能使这些困难更加严重(Bullock,1994 年)。另一方面,另一部分问题可能涉及工会的组织框架偏向男子。工会是一个男性主导的政治等级制度,它们可能不愿意承认妇女本身就是农民并阻碍她们参加工会。即使妇女参加这些组织,她们也很少有人担任领导职务,(Bullock,1994 年;Heyzer,1987 年)。

250. 对斯里兰卡种植园女工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即使工会的活动协助消除男女工人之间工资的差距,妇女成员也认为,在工会向种植园管理局提出的要求中,她们提出的接受更好的教育、加强保健和改善卫生条件的要求未被列为优先事项(Samarasinghe,1993 年)。尽管农业部门的国际工会坚决致力于解决两性平等问题并制定了预先政策,但是在国家和区域一级开展工作的第一线工会领导人在将政策变成行动方面仍存在问题(粮农组织,1995 年 b)。

251. 然而,尼加拉瓜的另一个例子表明,农村工会似乎愿意让占工会成员将近一半的女工以更加直言的方式积极参加工会工作。例如,农业工人联盟在其女工的鼓动下,

<sup>76</sup> 请见第三 C 章。

将带薪产假、洗衣服和育儿服务作为工会合同谈判中的一个优先事项。到 1980 年代末,农业工人联盟还利用当地雇主和国际组织提供的资源,建立了 108 个农村托儿中心,联盟中有 35%的领导职务由妇女担任(Perez-Aleman,1992 年)。

252. 农村工人组织<sup>77</sup>是另一个赋予农村妇女权力的潜在有效的方法。这类工会在地方一级开展工作,目标是改善其成员的生活条件。这些组织的成员中不仅有领取薪酬者和农业劳工,还有自营职业的边际农民和企业家。农村工人组织的重要性在于它们通常是接触边际工人的唯一途径。尽管各国的农村工人组织的成员来源差异很大,但是,其成员却占世界农业、林业和渔业部门劳工的 7%至 15%左右,其中 25%至 40%是女性。农村工人组织(a) 通过施加压力制订更好的立法和改善谈判地位,协助其成员改善土地保有权和工作条件;(b) 提供自己的农业支助服务或施加压力,从政府或开发机构得到这类服务;和(c) 支持通过小型经济企业开展创收活动(Bullock,1994 年,粮农组织,1994 年)。

253. 但是,如果农村妇女参加了组织就有可能丧失工作的话,她们就不愿意参加组织。组织起来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可使她们失去企业在雇用廉价女工时要看到的“相对优势”。企业可以干脆转移到工人得不到保护的其他地区,将工作也一起带走。鉴于妇女依赖并似乎更愿意成为领取薪酬的非农业劳工,在这种情况下将女工组织起来,可能既有利也有弊(Sachs,1996 年)。

254. 在发展项目和方案中帮助妇女组成团结小组,例如社区储蓄俱乐部、自助组织和换工小组等,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趋势,上文对此已有更详细的论述。这些组织的成员帮助妇女群策群力和把储蓄集中起来,改善其经济现状并通过更多参与发展和决策进程,加强其权力。

---

<sup>77</sup> 农村工人组织的任务是维护各类农村工人的利益,根据劳工组织第 149 号建议的定义农村工人指在农村地区从事农业、手工业或有关职业的任何人,不论其为领取薪酬者还是自营职业者。

## 五. 公共政策环境的转变

255. 对一个经济体进行一揽子有价证券投资,如条件合适,其好处可能很大。流入的资本用于生产性企业支出,就会刺激经济增长,因此在就业和工资方面使妇女和男子都得益。但是,必须建立支助性机构,以确保经济稳定和持续的经济增长。遗憾的是,由于在当前体制安排下资本流入往往极不稳定,不能理所当然地期待它产生有利影响。

256. 国际经济环境的特点是资本流动不受任何管制,因此它往往一方面影响经济稳定,另一方面削弱各国采用预防周期性的政策来对付衰退的能力。这种趋势对妇女的影响通常特别大,因为衰退对妇女的冲击更为严重,原因有两个。第一,在正规部门,妇女往往比男子先失业,而且其失业补助金和社会保障补助金往往较少。第二,与男子相比,妇女在缓冲衰退对家庭的不利影响方面承担更大的责任。妇女的家务负担较重,为买到便宜货所花的时间较长,作为提供照料的人所付出的劳动较多。

257. 即便没有衰退,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对照料家庭的要求(因而对无报酬女工的要求)看来已提高,原因如下:第一,自 1980 年代以来,除少数情况外,收入不均已导致世界多数地区贫穷人数增加。<sup>78</sup>第二,劳动力市场更为动荡,原因是:一方面,因世界市场的调整,部门间劳动力流动增加;另一方面,因非正规就业形式增加,劳动力周转速度加快。第三,同样与全球化有关的是,在多数国家,国家为再分配目的筹措资源的能力看来已削弱,导致住房、营养、保健和教育方面的人均社会支出减少。因此,由于家庭是别无他法时的最终提供照料者,社会保障的缺失看来已成为世界经济日益开放的一个突出问题。

258. 本章其余部分从性别角度重点阐述全球化的某些方面,这些方面实际上(a)束缚宏观经济政策,(b)加剧动荡和经济不稳定,(c)削弱国家为再分配目的筹措资源的能力,造成社会保障的缺失。

### A. 宏观经济政策中的通货紧缩倾向

259. 金融自由化往往加剧接受资本流入国家的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经济情况好的时候,资本就流入,使经济增长更快;而在宏观经济指数显示任何经济恶化的征兆时,资本就迅速流出,从而加剧经济衰退。同时,对资本流入的依赖,限制一国实施防止周期性的政策来对付衰退和消除金融危机对实际经济的影响的能力(劳工组织,1999 年)。为了让金融市场有信心(从而尽可能减少资本突然流出的危险),各国政府通过限制支出和维持高利率来控制财政赤字。而这些措施往往有通货紧缩倾向,因为这种措施使就业和产出增长无法达到最佳状况。

260. 各国政府可能已经或者尚未充分意识到,吸引资本流入的成本抵消了吸引资本的好处,但业已变化的全球环境,却促使它们实施吸引资本的政策。因此,对资金的首要需求,会促使政府实施可能与某些发展目标冲突的宏观经济政策。

261. 政府实施何种政策来影响资本的流入? 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利润的资本流动,实际上被两个主要条件所吸引:高利率和低通货膨胀率。这两个条件向投资者预示,其金融投资预计会有一个较高的回报。高利率吸引资本,原因很明显:高利率能带来较高的金融投资回报率。低通货膨胀则确保金融投资的实际价值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其中任何一个条件,都为试图吸引资本的国家政府的货币政策确定了参数。

<sup>78</sup> 1980 年代以来贫穷现象的最近趋势,见开发计划署报告(1998 年、1997 年)、劳工组织报告(1996 年)以及 Berry 和 Stewart 报告(1996 年)。

262. 各国政府总的来说服从了维持高利率的必要性。为了在金融市场上建立“信誉”，它们抬高了全球的利率，以稳定资本流动。证据显示，1990年代世界各地的利率处于历史最高水平(Eatwell,1996年)。

263. 据认为，财政赤字会导致通货膨胀，并使金融市场感到不快，因此，投资者还会指望政府实施紧缩性财政政策。紧缩货币政策反过来可以抑制经济中的通货膨胀趋势，压低物价，并保护投资的实际价值。必不可少的紧缩货币政策和吸引全球资本所必需的财政紧缩一起产生的结果可能与资本流动造成的结果相互冲突。后者刺激增长，而前者却抑制总需求量，因而减缓增长速度。

264. 证据显示，通货紧缩倾向的不利影响可能压倒资本流动的有利影响。金融自由化期间投资数额的有关数据表明，过去20年占主导地位的趋势是，投资在国内总产值中的比例一直在下降。此外，在多数区域，由于资本自由化更为普遍，投资在国内总产值中所占比例下降的情况，在1980年代末更为突出。例如，在四分之三的综合组织成员国中，1980年代的投资/国内总产值比率低于1960年代。10个拉丁美洲国家中有9个国家的情况也是如此。只有在东亚和东南亚，1980年代投资比率一直比较高(菲力克斯,1995年)。同样，与1960年代和1970年代相比，1980年代到目前的主导趋势是，人均国内总产值增长率也在下降。这种趋势在所有区域都显而易见，包括在东亚和东南亚，尽管东亚和东南亚的投资/国内总产值比率呈增长趋势。所以，最近金融自由化趋势的一个重要影响是，投资和增长速度总的来说已减缓。这主要是因为各国政府为吸引和保持资本流动而不得不实施的宏观经济政策。

#### 1. 经济停滞对妇女的影响

265. 来自世界不同区域的证据表明，衰退、经济停滞和增长速度减缓，对妇女就业所产生的不利影响大于对男子的影响。例如，在欧洲联盟，因增长速度减缓而增加的失业，对妇女的影响就比较大。在中欧，1985年至1997年期间，妇女参加劳工队伍和就业的绝对数和相对于男子的比率都已下降。在匈牙利，妇女就业人数减少了40%，而男子则减少了30%。在俄罗斯联邦，这一期间妇女就业人数减少了21%，而男子就业人数则减少了6%。

266. 在美利坚合众国，增长减缓致使工资降低，而不是增加失业，因此对妇女的影响有所不同。由于最低工资的增长未能跟上通货膨胀的速度，工资的实际价值已低于1969年的水平。工资的下跌对妇女的影响大于男子，因为从事最低工资和接近最低工资工作的妇女比例特别大。这一结论与第二章中讨论的男女工资差距缩小并不矛盾，因为差距缩小主要是男子工资下调的结果，但这意味着妇女工资两极分化加剧。

267.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增长减缓加上第三章中讨论的成本竞争加剧，已使正规部门的就业机会减少。在这一背景下，自1990年代初以来，正规部门妇女就业人数相对于男子来说呈减少趋势(Standing,1997年)。最近几年，比较灵活和非正规的就业机会增加，是妇女在劳动力中所占比例呈上升趋势的主要原因。拉丁美洲近几年增长缓慢，自营职业(它表明非正规部门就业情况)增加的趋势特别突出。

#### 2. 社会保障制度中的性别偏见

268. 越来越多的妇女参加非正规就业，使妇女在职业保障和社会保障方面易受伤害。部分原因是男女在享受社会保障制度方面不平等，这一点对妇女的损害，现在比过去更为严重。

269. 在工业化国家，传统的社会保障形态基于一种传统观念：妇女是受抚养的配偶，妇女的收入被视为家庭的补充收入。一些国家已采取步骤，使它们的社会保障立法适应新的现实。促成这种新现实的是，更多的妇女参加有薪工作，家庭结构改变，其中包括户主为妇女的家庭及双职工家庭数目增加。但两性不平等依然存在。直接和间接

性别歧视是这种不平等现象的根源,而这种不平等在享有福利和社会保险方面根深蒂固。

270. 即便在方案设计时消除了歧视性做法,但只要社会保障的福利与两性不平等现象普遍存在的劳动力市场就业挂钩,妇女在社会保护方面就处于不利地位。从事有薪酬工作的妇女,已拥有独立权利在发生大多数意外情况时享受社会保障,包括养恤金权利和待遇、享受保健服务、领取失业补助金权利和在公伤事故方面受到保护的权力。但妇女在这些权利方面所享受的福利远远低于男子享受的福利,因为这些福利是与工作挂钩的。如我们所见,妇女的薪金一般低于男子,获得工作、特别是好工作的机会也比男子少。因此,凡在有薪就业方面使妇女处于不利地位的因素,也将影响到妇女的社会保障福利。

271. 譬如,在美利坚合众国,妇女从事非正规或非全时工作的可能性也较大,许多妇女如丢掉工作,没有资格享受失业保险,因为失业保险制度主要是为长年全时工作的人设计的。因此,女户主在丢掉非正规工作时,往往不得不依靠福利制度,作为自动的失业保险方案。但是,由于该方案于 1995 年解体,更多的妇女和儿童可能陷入贫穷。

272. 在发展中国家,社会保障计划效仿早期西欧的制度,在有薪就业的基础上实施,只适用于领取薪酬的工人。即便如此,(不论对于男子还是妇女,)完全享受社会保障的人数也很有限。因此,只有极少数的工人享受社会保障福利。最后,在一些国家,由于男子迁往城镇或男劳动力脱离农活另找工作的人数很多,妇女越来越多地承担起男子不再干的农活。这些妇女除了工资很低以外,一般也不能享受社会保障计划。

273. 在经济转型国家中,经济自由化损害了以往的社会保护制度,而在原来的制度下,妇女在妇幼保健方面享受优待。劳动力市场和家庭正在作出调整,以适应国家对家庭的支助大幅减少的时代。妇女受非薪酬劳动收入减少的冲击最为严重和直接,因为妇女以养育子女和维护家庭的方式承担起了社会繁衍衍首要责任。

## B. 风险和动荡的加剧

274. 全球化的一个特征是,资本根据经济条件的变化而迅速流动。这种特征在金融市场上最为明显。目前,限制资本流动的规定已消除,使投资者几乎可以即时对各国的预期利润的差别作出反应。正是放松管制的金融市场的这种特点,导致动荡加剧,它所造成的成本有可能抵消资本流动带来的好处。

275. 允许国际资本自由进出的国家所冒的风险是流入资本突然流出所带来的冲击。近年来,世界经历了数次金融危机,资本流入大幅增加的 trend 终于扭转,同样有大笔的资本迅速流出。情况往往是,流入的资本本身因其对宏观经济状况的影响而导致这一最终扭转。事态发展通常如下:大笔资本流入导致银行信贷迅速扩张,信贷扩张导致经济活动增加,而经济活动的增加最终往往引起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导致出口下跌,进口增加,造成贸易失衡。随后,外国投资者开始指望货币贬值,而投资者最终对宏观经济“基本要素”的衰减——通货膨胀上升、贸易出现赤字和币值过高——作出的反应,促使资本外逃。

### 1. 动荡问题个案研究:亚洲金融危机

276. 亚洲一直因其对贸易、投资和资金流动的开放而倍受赞扬。该区域发生的事件,说明了资本流动不稳定的危险。它说明,虽然获得全球资本可能带来一些好处,但对国内经济带来的代价也是巨大的。

277. 亚洲各国过去 20 多年的增长记录是众所周知的。近几年的经济增长,是紧接着 1980 年代中期日本在国外直接投资浪潮出现的。有人乐观地认为,亚洲经济将继续快速增长,因此,在过去数年内外国资本涌入该区域。流入的许多资本是短期资本,而不是长期资本或比较稳定的外国直接投资。

278. 何种因素导致了 1997 年 5 月首先在泰国出现的金融恐慌,众说纷纭。大量资本流入导致了通货膨胀和国内货币升值,并最终导致贸易失衡。有人认为,薄弱的银行系统将外国资金导向无利可图的投资。其他人则认为,资本流入过于迅速,无法有效地得到吸收。房地产领域的投机性投资居高不下就是例证。

279. 不论根源为何,自从 1997 年 5 月泰国银行出问题开始,外国银行和投资者迅速丧失信心,卖掉金融资产,导致泰国货币和资产价格直线下跌。这种因素也促使投资者审查在该区域其他国家的投资,并开始怀疑贷款者的偿还能力。因此,1997 年下半年从亚洲外逃的资金几乎达 1 000 亿美元(Griffith-Jones,1998 年)。泰国受到的打击特别大。虽然 1995 年净资本流入占泰国国内总产值的 12.7%,但因金融恐慌而流出的资本几乎占国内总产值的 10.7%。人们普遍认为,金融市场对亚洲经济状况的反应极为过度,而这种过度的反应对该区域产生了极为不利经济和社会影响。

280. 受冲击最严重的三个国家——印度尼西亚、泰国和大韩民国——在危机后产值萎缩特别严重,就业人数因此急剧减少。譬如,印度尼西亚 1998 年产值下降超过 15%。其失业率增加了一倍,从 1996 年的 5%增至 1998 年的 10%。同期泰国的失业率预计从 1.55 上升至 5.6%,而大韩民国出现的失业使官方失业率翻了两番,达到 8%(韩国银行,1999 年)。

281. 由于货币贬值引起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率的上升,实际工资也已大幅减少。尚无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可靠数据;但据报工资减少幅度极大。工资减少,加上通货膨胀率上升,意味着这些国家的实际工资急剧减少。印度尼西亚工资情况恶化特别严重,低收入群体的购买力直线下滑。据估计,该国贫穷人数从 2 200 万增至 1 亿,达人口的 48%。1999 年,如果经济状况不改善,贫穷人数预计会进一步增加,高达 66%(贸发会议,1999 年)。在大韩民国,从 1997 年底到 1998 年 10 月,平均实际收入下降 5.5%(韩国银行,1999 年)。

282. 亚洲危机的影响已不同程度地波及世界其他地区。例如,自从亚洲危机开始之后,南非宏观经济“基本要素”尽管良好,但其汇率受到投机商的袭击。除金融市场对风险感觉的极度敏感有所增强外,袭击的原因不明,但当局被迫通过提高利率来对付投机商的袭击和资本外流。由于这是在失业率很高而增长率很低的情况下发生的,南非经济进一步恶化(贸发会议,1999 年)。

## 2. 亚洲危机对妇女的影响

283. 由于劳动力市场和家庭中存在的男女不平等,亚洲危机对妇女的不利影响更为严重。在区域内劳动力市场上,危机爆发后,妇女一般先遭到解雇。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妇女集中的部门和公司受危机的冲击较大。大量雇用妇女的出口部门的许多小企业,比较易受影响,在危机初期就破产了。第二,即便在大公司,妇女也是先遭到解雇,表明要竭力保住“养家”男子的工作。妇女的工作被视为不如男子的工作重要,因此是可以牺牲的。

284. 就印度尼西亚和泰国而言,没有有系统的数据,无法按性别对解雇的趋势作分析。但非政府组织和工会的妇女分支引述传闻报告说,被解雇的妇女人数多于男子(劳工组织,1998 年)。在韩国,妇女丢工作的人数比男子多一倍,尽管在危机发生前,妇女是比较受欢迎的劳动力,当时其失业率为男子的一半(Wiltout,1998 年)。

285. 如上文所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很不完善,一般只适用于正式工人。因此,不享受这一制度的妇女人数多于男子。此外,在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社会保障计划将重点放在创造就业机会或创收活动上,而不是采取社会安全网的方式。大韩民国是亚洲地区有失业保险计划的少数国家之一。但即便在韩国,许多妇女不享受这一制度,因为这方面的立法只适用于员工人数在五人以上的公司。非全时工人和工龄不到 10 年的工人,被排除在外。由于覆盖范围有限,40%的工人仍不享受失业

保险,其中主要是妇女,因为妇女比较可能集中在小公司工作(Ranis 和 Steward,1998年;1999年)。这些数字不包括在非正规部门工作或在家里工作的大量妇女。

286. 正规部门就业机会的减少,看来已使更多的人到非正规部门工作。此外,在危机前没有正式工作的许多妇女,已开始寻找非正规部门的工作,以弥补因丈夫或其他男性家庭成员失业而减少的家庭收入。但是,找这种工作越来越难,原因是非正规部门的收入因劳动力供应过剩和需求减少而明显降低。

287. 此外,城市地区失业和贫穷人数增加,已影响到农村地区,因为农村地区的许多大家庭成员依靠在城市工作的亲属的汇款(Robb,1998年)。受危机影响国家的大量移徙工人,其情况也是这样。如第三章所述,在过去20年中,东南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中的国际移徙人数迅速增加。到1997年中,外国工人人数,马来西亚估计有2 500 000人,日本有1 354 000人,泰国有1 260 000人,新加坡有450 000人,大韩民国210 000人,其中很大比例的人没有正当身份,是非法的(劳工组织,1998年b)。由于危机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许多移徙者丢掉了工作,被鼓励离开。由于汇款渠道已枯竭,许多农村家庭一贫如洗。据最近来自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的报道,陷入绝境的家庭将女儿卖给妓院的情况越来越多。

288. 收入减少和通货膨胀,使各家庭很难维持原有的营养水平。例如,在印度尼西亚,提供每天的饭菜和做家务是妇女的职责,因此,购买力的下降造成了严重的问题。有证据表明,由于发生金融危机,爪哇已出现严重的营养不足问题(人口基金,1998年)。一项研究表明,经济困难造成消费水平下降,对妇女和儿童的影响通常大于对男子的影响(Robb,1998年)。

289. 在经济危机期间,心理压力加大,这尤其增加了妇女的负担,因为社会上期望妇女是心理的抚慰者。由于亚洲的社会安全网很不完善,失业和贫穷迫使人们更多地依赖家庭。而各种迹象表明,这种情况造成了家庭的痛苦。据报道,在危机发生后,该区域自杀人数、药物滥用以及家庭内对妇女和儿童的暴力都已增加(Shin 和 Chang,1999年;人口基金,1998年)。

290. 金融危机给人造成的损害显然将持久存在。据泰国教育部说,近6%的学生,即500 000名中小學生已被迫辍学。印度尼西亚的估计数甚至更高(人口基金,1998年)。其中大多数可能是女童。在许多亚洲国家,就象在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各家庭往往重男轻女,如果被迫作出选择,很可能选择投资于男童的教育,而不是女童的教育(Odaga 和 Heneveld,1995年)。由于许多父母指望男童养老,因此他们把对男童的投资视为养恤金计划(Greenhalgh,1985年)。

291. 保健的恶化是对人造成损害的另一个方面。譬如,公共保健方案已减少了对艾滋病毒/艾滋病病人的治疗,原因是货币贬值使进口药品成本大幅提高。目前,艾滋病毒感染率预计会上升,因为保健服务减少,卖淫现象增加。生殖健康也受到威胁。政府预算急剧减少,甚至妨碍了提供生殖健康资料的努力。据报道,为终止意外怀孕的不安全堕胎现象已增加,预防和治疗性传染疾病(性病)的经费已减少(人口基金,1998年)。

### C. 国家作用的削弱和社会保护方面的漏洞

292. 在发达国家,就国民收入而言,国家的经济规模比发展中国家大得多。<sup>79</sup>除了规模大以外,公共部门活动的范围也比较大。用于再分配的国民收入比例较高,目的是促

<sup>79</sup> 在经合组织各国,就国民收入而言,国家筹集和支出的资源数额比发展中国家公共部门管理的资源数额多近一倍(1990年的比例是近48%比26%)。

进公平和社会保护。发达国家受益于一个良性循环:政府的有效支出,增加了私营部门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促进增长和繁荣,而增长和繁荣又提供了公共支出所需的资源。

293. 在发达国家,国家的经济规模并非一直很大。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欧洲和美利坚合众国,公共支出占国内总产值比例都很低。但是,50年后,政府支出大幅增加,平均占国内总产值的47%(Rodrik,1997年a)。在这一期间,社会支出的增加促使公共部门的经济规模扩大,因为高速增长与经济开放提高了对国家的要求。造成这些趋势的一个原因是,受国际经济力量的影响有所增加。如上文所述,国际经济力量比一个封闭国家内部的经济力量更加不稳定。不足为奇的是,比利时及荷兰等较小的开放国家,相对于较大和较为封闭的工业化国家而言,国家福利的范围更大,更为全面,政府在社会方案上的支出数额更大。

294. 由于全球化,更加需要有一个社会安全网,其原因很多。一方面,全球化提高了劳动力的周转速度,因而增加了处于过渡期的工人人数。这就需要有时临时的支出,有时还需要长期的支出。支出不仅作为失业保险,而且作为间接的收入支助,以确保有医疗保健和充足的住房。另一方面,除了增加对社会保护的需求,全球化还提高了对教育和训练投资的需求,以确保一国的劳动力充分适应全球环境中不断变化的竞争条件。<sup>80</sup>由于多数员工没有资源来支付自己的训练和教育费用,因此,也越来越多地要求国家提供必要资源以用于人力资本投资。<sup>81</sup>

295. 因此,自相矛盾的是,依赖开放和市场自由化的增长战略是否可行,越来越取决于国家有多大的能力来保护本国公民免受市场变化多端的影响。国家在维持一个开放和竞争环境的经济优势方面的作用至关重要,因为企业要保持竞争力,就无法承担提供社会保护的費用。

296. 家庭和社区业已受到更大的压力,不仅因为收入不均和无保障,而且因为在核心家庭之外、乃至核心家庭之内的非正式社会凝聚关系也受到削弱。

297. 在全球化和市场自由化的条件下,国家提供社会保护和人力资本投资的能力似乎受到更加明显的限制。在上文讨论通货紧缩倾向时,谈到了公共支出受到了限制。除此之外,国家对资本征税的能力也已削弱。

#### 1. 税收基础的削弱

298. 资本的流动性和多国公司寻找低税收环境的能力,削弱了国家通过税收获得岁入的能力。在过去20年中,世界各国政府一直在降低公司税和资本利得税。美利坚合众国1986年税制改革说明,削减最高的资本税,看来产生了多米诺效应。除了瑞士和土耳其以外,在所有经合组织国家,1985年至1990年最高平均所得税从54%降至42%(Grunberg,1998年)。在许多国家,当地的资本税率也已降低,因为许多省或州竞相通过降低税收或规定免税期来吸引企业。许多政府设法通过提高薪金税来增加不断减少的税务收入。例如,在1980年至1993年期间,欧洲联盟各国的薪金税增加了

<sup>80</sup> 它们通常称作“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其目的是,防止受变革影响最不利的人加入长期失业的行列,通常由下列措施组成:训练、在公共事业部门就业、工资补贴、支助自营职业者以及一般就业(寻找工作)服务。多年来,这些措施在经合组织国家是标准做法,并正在向中等收入和经济转型国家推广(Fretwell等,1999年)。

<sup>81</sup> 此外,为了使本国成为对投资者有吸引力的地方,政府也必须投资建造实际基础设施。这些公共投资一般对私人投资起补充作用,因为这些投资提高了私营公司的利润。举例说,新加坡就是一个大量投资于公共基础设施的国家。许多多国公司指出,它们设在该国,而不设在其他国家,其部分原因是看中了该国的基础设施。

20%,而资本利得税收却下降了 10%。美利坚合众国的情况也是这样。就劳动力等流动性较低的要素而言,其税率已提高,就资本等流动性较大的要素而言,其税率有所下降。

299. 在发展中国家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趋势。为了吸引外国直接投资,除了低税率外,各国政府还向多国公司让税(给免税期或免税资格)。此外,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贸易自由化以及由此取消(或减少)对外贸易的征税,是税收方面的一个重大损失。鉴于其中许多国家的税收管理尚不完善,征税最有效的地方通常是在边界。据估计,征收贸易税的行政费用占国内总产值的 1%至 3%,而征收所得税的行政费用则占 10%(世界银行,1988 年)。在许多情况下,因贸易自由化失去的税收可能高达总税收的三分之一。

300. 影响政府征税能力的另一个因素,是所谓的制订转帐价格。这指的是国际公司采用旨在减少其应交税款的会计办法。各公司操纵公司内部国际贸易的发票,以确保利润在税收最低的国家显现。相反,这些公司在收税最高国家的分公司帐簿上显现最低的利润(Tanzi,1995 年)。所在国政府对这种做法一清二楚,因此被迫维持较低的、有竞争力的低公司税。

301. 许多国家设法通过提高所得税来抵补减少的税收,但成效有限。由于更多地依靠所得税和薪金税,因而转而采用一个递减幅度更大的税制,这似乎已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公众对社会支出的支持。在整个 1980 年代,许多发达国家政府是依靠减税节支的政治纲领当选的。在这些年中,对于社会支出是否给穷人造成了一个不鼓励脱贫的结构,国家干预是否扰乱了市场在快速结构改革和技术变革时期的调整能力,颇有争论。当时行的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拥护者认为,世界各地许多国家面临的财政危机,如果迫使政府缩小了公共部门的规模,也可能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许多人认为,国家的“精简”,除了提高效率外,还通过消除政府、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干预经济所造成的经济收益,从根本上解决了政治腐败问题。但是,在许多地方普遍产生的意外结果是,削弱了本已脆弱的公共治理结构。

302. 虽然很难确定因果关系,但有迹象表明,公共治理结构(因而征税的行政能力)的削弱与地下活动的增加是有联系的,而地下活动就其性质而言,是无法征税的。例如,在经合组织各国,1978 年末征税经济活动估计占国内总产值的 6%至 11%,欧洲联盟各国较新的估计数称其占国内总产值的 25%。在发展中国家中,未交税收的估计数要高得多(Grungerg,1988 年)。

303. 这些趋势表明,国家行政能力的削弱可能导致逃税,因而可能进一步减少国库的岁入。由于制造漏洞或忽略税务规定,以换取非法钱财的引诱力越来越大官僚机构可能受到外部腐败势力的影响(Chambas,1994 年;由 Grunberg 引述,1998 年)。一方面,国家面临的财政困难可能致使征税效力降低,促使人们设法逃税。另一方面,公共部门收入减少,会压缩公务员的工资,并损害职业保障,因此也可能使公职人员比较容易接受为换取优惠税收而给予的贿赂。

## 2. 不断变化的公共支出形态

304. 自 1980 年代中期以来,在世界所有区域,公共部门活动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不断上升的趋势已终止,南亚可能是一个例外(世界银行,1997 年)。政府支出占国内总产值的比率,虽然在经合组织各国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略有上升,但在中东和拉丁美洲已降低,在东亚则大致保持不变。就发展中国家的总体而言,这一比率略有下降。

305. 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由于 1970 年代末国际市场上利率上涨,一直从外部筹资的许多国家政府面临着无法持续的预算赤字。在整个 1980 年代,这些国家的公共支出的绝对数大幅下降,尽管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仍比较稳定,而国民收入因经济衰退

一直在减少。此外,用于消费和投资的公共部门支出降幅大于预算总额,因为在这些(实际上在所有)区域,数额日增的偿还债务支出在公共支出总额中所占的比例更大。这种情况还造成保健和教育支出在政府预算总额中所占的比例降低,意味着占国民收入的比率进一步下降(Grosh,1990年,第66页)。当然,在人口迅速增长的许多国家,按人口平均计算,这类支出的减少甚至更为严重。

306. 在1980年代困难的衰退时期,多数发展中国家政府选择先减少资本投资,而不是减少用于服务和社会支助措施的经常支出。但是,这种裁减不可阻挡地导致了社会方案现有基础设施的恶化。随后对经常支出的削减使问题更为严重,因为削减政治上较少争议的资本支出的余地已经没有了。<sup>82</sup>到1990年代初,调整对福利造成的损害很大,而且大多由最易受伤害人口承受。在一个又一个国家中开始有越来越多迹象表明对穷人、特别是贫穷家庭内的妇女的福利产生了不利影响<sup>83</sup>。

### 3. 结构调整的宏观经济学与性别

307. 1980年代中期,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严重的国际收支困难,被迫实施结构调整和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在这些方案中,有的是短期的紧缩措施,目的是控制总需求量,以减少通货膨胀,压缩预算和往来帐户赤字;有的则是长期政策,目的是实行贸易自由化、放松管制和私有化。

308. 据这种政策的倡导者说,不论造成宏观失衡的初期震荡如何,国际收支危机几乎总是造成对可买卖货物<sup>84</sup>的需求超过此种货物的供应的情况。那么,要解决问题,就必须增加可买卖货物的生产,减少其消费。有人认为,如果让市场自由运作,就会自动导致这种结果。换言之,有人认为,市场如果足够灵活,就能够并且一定会解决这个问题。因此,结构调整方案的总目标是,通过消除阻碍市场调整的结构和体制问题,提高市场系统的反应能力。

309. 通常,受到监督的主要对象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譬如,政府的各种方案,如价格补贴、转移性支付或外贸中的保护主义措施,之所以受到批评,不仅是因为这种方案引起庞大的预算赤字,从而引发通货膨胀,而且是因为这种方案扭曲相对价格,干扰了市场系统的分配职能。

310. 1980年代,陷入外债泥潭的各国不得不听从这一以市场为取向的忠告,才能得到亟需的国际财政援助。为了提高效率,一个又一个国家大幅缩减价格补贴、基础设施公共投资,并最终缩减教育、保健和公共服务支出。贸易和资本帐户放开,公共企业实行私有化。这些新政策立即对穷人、特别是对贫穷家庭中的妇女的福利产生了不利影响。这种政策往往将重新补充和保持劳动力的社会成本转移,除了妇女的劳动负担外,无法看到此种成本。妇女和穷人只得用大幅减少的家庭预算来养家糊

<sup>82</sup> 按比例而言,各区域发展中国家用于保健和教育的公共支出数额,看来已稳定在类似的水平(就1988-1990年的平均数而言,所有发展中国家教育支出占国内总产值的大约3.4%,保健支出占3.7%)。在收入最低的国家,这些数字比较低:教育支出占2.8%,保健支出占2.4%(Van Adams和Hartnett,1996年,引述开发计划署,1993年)。

<sup>83</sup> 在进行结构调整时,社会支出减少对妇女福利的不利影响已有充分记载(见下节)。但是,人们对福利的这种不利影响的普遍性和严重性也有质疑(世界银行,1999年)。一方面,有人认为,1980年代多数发展中国家政府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率已稳定在历史较高的水平上,也就是说这个比率一开始就过高。另一方面,有人认为,在许多国家,社会支出的减少未必使居民的教育和保健情况恶化。

<sup>84</sup> 指可以在国际市场上买卖的货物。

口。据调查,越来越多的妇女加入了劳工队伍,往往在无保障和日益恶化的工作条件下从事非正规工作,而且在收入减少的情况下不得不做更多的无报酬家务。换言之,妇女通过在家庭内外更长时间、更辛苦的工作,吸收了调整的冲击。但是,妇女的福利受到了影响,因为工作负担的加重损害了她们的身心健康。<sup>85</sup>妇女对结构调整的另一个反应是,建立自己的组织和生存网络(见方框五.1)。

311. 虽然结构调整政策是以提高效率的名义实施的,但其结果可能是降低效率,这种低效率只不过因家务活无薪酬而被掩盖而已。例如,通过收取使用费而使住院时间缩短来精简保健部门的措施,如果使在家里康复时间延长和无报酬(非货币化)的护理劳动支出增加,可能就不会提高效率。同样,选择在城区外修建新医院,对保健当局来说成本效率可能比较高,但如果将病人和探访者在往返医院的途中必须花费的时间计算在内,在市中心修建医院的社会效应可能更大。就宏观经济而言,问题很类似。只要无薪酬部门仍不在国民收入核算中显示出来,就无法评估各项政策对宏观经济效率的影响。<sup>86</sup>

#### 方框五.1

##### 利马社区食堂

利马妇女为了努力应付经济调整和城市贫穷,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和生存网络。其中一个例子是,自治大众食堂联合会下属的低收入妇女,每天聚集在住区食堂,设法集体为家人供餐。在整个利马市,4万名妇女聚集在2000个点,轮流负责,收取会费,采购和准备饭菜。

集体食堂是妇女活动分子网络的成果。第一所食堂于1980年代初建立,以应付结构调整方案的影响,当时主要由来自农村的中年移徙者经营。由于1980年底新的调整政策迫使人们进一步勒紧裤带,食堂数目从700个增至1000个。到1990年时,许多较年轻的、刚陷入贫穷的利马妇女开始加入食堂。

1988年,各食堂组织成联合会,取得了合法地位。自治大众食堂联合会等联合会代表这一运动与政府官员打交道,批量采购货品,组织小型企业活动,提出和传播关于性别和妇女参与社区的广泛观点。一些食堂得到天主教堂或政党的支助,而另一些食堂则比较独立。

妇女往往出于经济上的需要参加这类组织,但她们一旦加入组织框架,也开始关心政治和社会问题,参与社区决策,并与政府、宗教界、城市社会运动和私营部门打交道。

资料来源:Lind,1997年

## 六. 结论和顾及性别问题的政策框架

<sup>85</sup> 结构调整对妇女福利的不利影响,见 Standing(1989年)、Elson(1991年 a;1991年 b)、Moser(1992年;1996年;1998年)、Beneria和Roldan(1987年)、Sen(1991年)、Beneria和Feldman(1992年)、Afshar和Dennis(1992年)、Bakker(1994年)、Sparr(1994年)、Cagatay和Ozler(1995年)、Gonzales de la Rocha(1994年)、Floro(1995年)。更详细的书目,另见Afshar和Dennis(1992年)。

<sup>86</sup> 世界银行在评估调整方案对提高经济总体效率方面的效力时,依靠的是资本产出增长比率统计数字。这一比率的下降被解释为经济总体效率提高。但是,在计算资本产出增长比率统计数字时通常忽略无报酬的工作。因此,鉴于再生产部门是不显示的,这一比率的下降很可能掩盖了不断降低的效率(艾尔森,1995年)。

312. 国际上越发关切经济调整对妇女的福祉产生的消极影响,使大会<sup>87</sup> 请秘书长审查目前的趋势和政策对妇女总的经济和社会状况的影响。要仔细审查(a) 妇女、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妇女的恶劣工作条件;和(b) 减少社会服务开支对妇女教育、保健和育儿的机会产生的影响。

313. 为了对该请求作出反应,本年度《妇女在发展中的作用世界概览》已开始考虑在全球化背景下近期世界劳动力市场趋势的问题,尤其是从性别角度来看工作场所正出现何种转变的问题。它发现:

(a) 在过去二十年里,有更多的妇女已变成有薪酬的员工,但通常是在不如男子的条件下工作;

(b) 妇女过多地承受经济调整的代价,尤其是贫穷妇女;

(c) 家庭和妇女在福祉方面的需求似乎有所增加,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因为社会部门开支已减少。

314. 对全球化问题难以统而言之,尤其是很难概括它对男女平等的总体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全球化释放出的力量已产生各种新机会,有可能加强妇女的能力。另一方面,它又造成不利于男女平等的经济状况,包括经济更加动荡,职业无保障和失去生计等。

315. 下文在总结前几章讨论的劳动力市场最近趋势后,将论述(a) 对这些趋势对性别关系很可能产生的影响的评价;和(b) 能使经济政策顾及性别问题的办法,以便尽可能减少全球化的消极影响,同时巩固全球化产生的益处。

## A. 劳动力市场趋势的总结

316. 自 1980 年代以来,妇女劳动力的增长速度在全世界已高于男子很多,唯一例外的是非洲。在发达国家,以男子为主的手工职业大部分为技术不高的制造业工作,一直在迅速消失。剩下的制造业工作继续在减少,仍然以男子为主。并逐步成为高技术的工作。在过去二十年里,就业机会的增加大都是在服务性部门。鉴于妇女大量集中在这些部门,妇女的就业比例已明显增加(第三章)。第二种趋势尤其在 1990 年代增加势头。它是指在制造业和不断扩大的服务性部门中的工作在所需劳动技术方面出现两极化。一些服务性工作,主要在注重信息和知识的部门,已要求高技术,而剩下的工作则集中在低技术、低工资和劳动力密集型的部门。最后,服务行业增加的妇女就业大都为非全时工和其他非正规形式的工作,主要是低工资的工作(第三章,B 节)。

317. 在发展中国家中,妇女就业的特点是,绝大部分妇女仍从事农业劳动。就发展中国家总体而言,农业劳动力总数的百分比仍高于 50%,而在 1965 年约为 70%,在过去二十年里已下降十分迅速。然而,如第四章所述,在一些区域,男子放弃农业工作的速度高于妇女,因而留在农村的妇女相对较多。这在过去二十年人均收入停滞不前或下降的国家里似乎更为常见。另一个重大趋势是,妇女在非农业就业总数中的比例几乎普遍增加,尤其是在近年来工业化发展迅速的“高增长国家”。

<sup>87</sup> 见第 49/161 号决议。

318. 以出口为主的正在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构成大部分高增长国家。在这些国家中,制造业生产面向出口的做法通常与女工人数增加有关(第二章,A节)。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大概早在1980年代末以来,全球化对妇女就业的影响至少在正规经济部门中一直在减少。这似乎是因为两个重要原因。第一,在许多中等和中等收入国家里,劳动力需求一直转向相对需要高技术的制造业,而传统上属于低技术部门的就业人数增长一直下降,这些部门包括女工占绝大多数的纺织业和服装业。第二,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里,非正式部门在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对妇女来说(第三章,B节)。据一些观察家所述,非正规部门重要性的加强可能只是一种人为现象,反映我们能够更好地记录和从数量上确定各种非正规形式的就业。然而,许多人都认为,发展中国家中正出现一个崭新的非正规部门,它是由全球化和技术改革的新的市场现实促成的。

## B. 对性别关系的影响

319. 在评估这些新趋势对性别问题的影响时,妇女上班领取薪酬一直是过去许多讨论的重点,这并不奇怪,因为这类妇女的人数在迅速增加。在早先辩论中有两个首要主题。其一是认为就业人数增加会使妇女得到更多的自主权和更高的地位,最终能加强她们在家庭中的影响。另一项主题是人们对妇女是在较差的条件下加入有薪酬工作行业所表示的关切。人们担心,家务事方面负担不平等和在拿工资工作中处于边缘地位可能只会相互强化,使妇女仅限于发挥家庭中次要谋生者的作用。如果妇女继续在家务事和育儿方面负首要责任,增加就业机会的结果只不过是必须应付繁重的“双重工作日”。

320. 虽然这些主题仍然激发当今的政策讨论,但目前辩论的内容正在转变。人们普遍认为,几乎在世界每个地方,妇女的工资和工作条件都远远落后于男子,甚至在考虑到妇女与男子在教育、工作技术和就业经验的差异之后仍然如此。但是,在最近几年这些男女不平等现象是否已消除,在哪里被消除以及哪些已结束消除的问题上,人们仍有分歧。另外,更为重要的是,人们无法确定所有这些意味着什么。似乎有充分证据表明,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美利坚合众国和其他一些发达国家在男女工资方面的差距正在缩小,而且人们普遍同意这一点(见第二章,C节)。<sup>88</sup> 同样,世界各地职业按男女区分的现象在过去十五年普遍减少的调查结果似乎也未引起争论。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中表明男女工资差异变化趋势的迹象不明确,人们也无法确定总的趋势是否是积极的。

321. 正如玻璃杯究竟是一半有水还是一半是空的这一众所周知的问题一样,这些趋势可使人们作出两种大相径庭的解释。其中的一种解释是,全球化及其相关的各种过程,如加强竞争、经济改革、劳工市场自由化和可能促进经济增长等,均对减少劳工市场男女不平等现象产生普遍的积极影响。这种观点基于两项论点:(a) 性别歧视是男女在工资方面差距的主要原因,无法根据男女之间在教育、技术和就业经历方面的差距用统计数据加以解释;(b) 对于雇主来说,歧视会带来很大的经济代价。按照这些论点,在(因全球化和劳工市场自由化造成的竞争加剧情况下,雇主越发难以进行歧视。相反地,在躲开竞争之后,惰性会使得工商界放弃它们原本可通过消除

<sup>88</sup> 然而,在诸如日本等其他一些发达国家中,男女在工资方面的差异一直在扩大。欧洲没有这方面的明确迹象。

业务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和所有其他形式的歧视)获得的潜在利益。因此,根据这种看法,通过减少劳动力市场中的保护性条例和制度加强竞争,不仅能提高经济效率,而且也有利于已被剥夺权力的群体,如妇女和少数民族,却不利于权力深受保护的既得利益者。

322. 相反地,另一种看法认为,劳动力市场变得自由和灵活只是扩大工商界在世界各地激烈竞争情况下的生存能力的手段,办法是减少它们相对的税收负担和劳动力薪酬。经济调整和变革的代价因此转移到最无法承担的、最为脆弱者身上。根据这种看法,一些发达国家男女工资之间差距正在缩小的迹象,更多是表明男子就业条件的恶化,而并不表明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中地位的加强。换句话说,这是男女之间“向下协调”。即使妇女就业比例普遍提高可能也是妇女福祉的恶化,因为在许多情况中,它是因妇女“廉价出售”劳力造成的。这些妇女因男子收入的减少而在支助家庭方面受到更多的压力。如果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劳动力市场“灵活性”被视为已加剧贫困现象和各国国内及各国之间的不平等现象,对那些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出售的人来说,这造成经济上更加不稳定,收入更加没有保障。即使那些直到最近仍被视为全球化成功事例的国家,也易发生外来震荡引起的经济危机。人们认为,贫穷妇女受这些消极影响的打击通常最重,因为对于因经济情况迅速变化而落伍的那些人来说,家庭是最后、(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是唯一避难所。

323. 目前这场辩论与早先辩论相比的另外一个新的方面可能是更加强调必须加强妇女的能力,以便在实现劳动力市场中男女平等方面取得持久进展。然而,新的市场经济是否以及如何促进加强妇女能力仍然无定论。对加强市场机制的好处通常抱有乐观期待的那些人认为,私营部门的发展为能够带来新的创业机会,从而赋予妇女权力。相反地,对于持怀疑态度的人来说,妇女在从事有薪酬的工作(无论是正式或不正式的工作)时进入或创造的社会网络才赋予妇女权力。<sup>89</sup> 他们怀疑,进一步参与劳动力市场本身会使妇女得到解放,认为这种参与很可能会在家庭中老的性别隶属关系正在消失的同时造成工作场所中新的性别隶属关系。然而,他们强调在某些条件下,提高就业率通过提供妇女集体组织起来的基础,可以是妇女加强自身能力的关键首要步骤,而加强自身能力是持久改善家庭内外性别关系的主要途径。

324. 他们还进一步告诫说,许多发展中国家家庭的负担增加,已导致一些人采取可具有自我破坏性的生存战略。在面临资源减少的情况时,家庭不得不转向较不具有持续性或更加危险的各种经济活动。因此,某些类型的生存战略(例如,让子女退学以便他们能够协助增加家庭收入)在减少收入不稳定方面短期内可能有效,但对家庭的长期利益不利。此外,根据这种看法,这些通常出于绝望而采用的战略会加剧男女不平等状况,因为家庭很可能在作出经济决定时依循当时流行的性别偏见,选择将有限的资源用于男孩教育和保健等,因为女孩教育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收益较少。

325. 最后,目前的辩论适逢全球化正改变实施公共政策的环境。我们时代的一个重大政策挑战是,如何防止每个国家凭借廉价劳力和不严格的劳工标准进行有害的竞争。由于世界经济中的贸易走向和投资流向日益取决于各国之间成本差异,旨在加强各国劳工标准的政策则变得更难以实施。由于第五章所论述的原因,需要在区域

<sup>89</sup> 在最近几年里,这两种立场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对取得成功的微额信贷计划有相同的看法。这一计划由一些南亚国家的农村妇女积极参与和组织。

和国际各级进行政策协调和合作,但国家处理社会弊病的能力似乎同时在减少。尽管总的来说这有害于妇女的福祉,但这也可能为妇女运动带来新机会。妇女的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其他民间社会团体的影响在世界各地似乎有所增强,因为信息和通讯技术在全球的推广已为在基层直接进行国际联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

### C. 拟订一个顾及性别问题的政策议程

326. 经济决策的一项主要规则涉及以下这项原则:各项政策应针对问题的根源,而非处理它们的表象。经济生活中的许多性别偏见产生于家庭中的性别不平等和社会态度及习俗中的性别不平等。因此,只有当这些不平等现象被根除时,才能有长期的解决办法。创造家庭中平等分担生育责任和决策的条件;消除会防止或阻碍妇女参与经济活动和政治决策的法律、机构和文化方面的障碍,只是社会政策和立法必须寻求实现的一些目标。<sup>90</sup>

327. 然而,这并不排除需要使经济政策顾及性别问题,以促进妇女平等获得经济资源、教育和职业培训。需要牢记,虽然性别平等本身是一个目的,它也是经济发展的手段。迄今为止,已有大量证据表明,劳动力市场、获得信贷的机会、分配财富和收入以及决策等方面存在的性别偏见和不平等现象,会阻碍富有效益和成效地利用人力资源来满足人的需求。根据一项估计,消除就业分类和薪酬方面的性别歧视,会大量增加产出总数(Tzannatos,1992年)。同样,已经发现,享受教育方面的性别差异对经济增长可能产生很大消极影响(King和Hill,1995年)。有证据表明,那些在妇女身上投资不足而且没有减少性别不平等现象的国家,“要为此付出增长较为缓慢、收入较低的代价”(Dollar和Gatti,1999年)。认识到性别问题的经济政策能促进男女之间的平等,也能扩大经济增长。

328. 全球化对性别平等造成了模糊有时是相互矛盾的影响。我们时代的主要政策挑战是,如何得益于全球化释放出的力量,同时防止我们遭受这些力量产生的有害影响。例如,就业的灵活性已有效地使妇女从事有薪酬的工作,因此加强劳动力在性别方面的流动性;但是,同时就业灵活性也是把市场不稳定的代价转嫁给工人、大部分为妇女的途径,使其就业没有保障。同样,一方面,资本和新的信息技术的流通由于全球化得到加强,消除人的能力因性别不平等的现象的潜在能力已明显增强;另一方面,不平等地分配调整代价使不平等和贫穷情况加剧,致使许多国家大量减少在人的能力方面的投资,因此对性别造成消极影响。

329. 考虑到这些不同影响的性质,可能需要在性别影响经济发展的三个层面来论述经济政策(见引言):(a) 加强部门间和地区间的劳动力流通,以便更好地重新分配劳动力;(b) 尽量减少调整代价;和(c) 在人的能力方面进行投资。然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种政策也可能需要在宏观经济和国际一级进行协调。

#### 1. 加强性别平等和劳动力流动

<sup>90</sup> 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其国家宪法和(或)劳工法中禁止歧视,或要求男女之间享有平等待遇。女工享有平等地位的基本原则载于劳工组织七项基本公约中的两项:1951年的《同酬公约》(第100号),以及1958年的《关于就业与职业的歧视公约》(第111号)。这两项公约是劳工组织所有公约中批准国家最多的公约,截至1997年底,分别收到135份和129份批准书。

330. 全球化时代的特点是限制劳动力流动。由于始终存在男女不平等现象,妇女劳动力流动特别受到限制。所以,作为认识到性别问题的政策议程的组成部分,应采取下列纠正行动:

(a) 应颁布机会均等的政策和方案,减少按性别划分职业的作法。各项政策应协助男子进入传统上属于“妇女”的职业,并协助妇女进入传统上属于“男子”的职业。平权行动和平等机会方案以及反歧视法律有助于消除陈旧性别观念造成的障碍。另外,还需要提供儿童保育服务,并在非传统主题方面加强妇女的教育和培训。提供就业前和在职培训以及职业技术和技能的再培训,均能有效地加强工人的就业能力,是执行平等机会战略的一个途径;

(b) 各项政策必须使工作有益于家庭。随着妇女更多地从事有薪酬的工作,现在更需要颁布有利于家庭的政策,包括为照顾家庭成员使用的家事假和病假。各项政策应鼓励男女平等负责确保家庭福祉所需的照料工作;

(c) 应提供资助服务,协助妇女和其他处境不利的对象群体就业和持续就业。对家务事和照看子女负有首要责任,会减少妇女充分参与劳动力市场的能力。因此,各项政策应鼓励雇主协助工人履行家庭义务,办法是在工作地点提供日托托儿所、巡回育儿保健以及赞助学校放假时举办的方案等。政府和社区给予资助或协调对加强雇主采取这种主动行动通常是至关重要的;

(d) 按地域协助劳动力流动通常是用于处理劳动力供求在地点上有差异的问题。这种协助可以是职务空缺资料、关于工作条件的真实资料(尤其是该职务在海外时)和积极协助寻找工作等,它特别有助于来自农村的妇女和那些考虑到海外工作的妇女,因为她们所受的教育通常比男子低,获得资料的机会更少。需要对准备到海外劳动力市场工作的妇女提供协助,包括采取措施使她们免遭剥削和虐待。

## 2. 通过加强就业保障减少调整的代价

331. 妇女过多地承受调整过程中出现的代价。因此,需要采取下列行动,以期减少调整代价,加强妇女和家庭在就业和收入方面的保障:

(a) 必须采取各项政策,使女工能巩固更多地从事有薪酬工作所获得的好处,具体作法是享有工人的基本权利,即依照劳工组织的基本国际公约,自由结社,而且免遭歧视和压制。许多发展中国家出口制造业的工人,以及出口加工区的工人应享有国内经济待业中其他人相同的劳工权利;

(b) 各项政策必须旨在提高工作的稳定性。实现该目标的一个办法是,颁布各项政策,要求雇主在按比例分配的基础上向非全时制和临时工人提供福利。此外,社会保险政策(如失业保险)也需要将涵盖范围扩展到临时、非全日制、非正式部门和家庭雇用的工人。将非正式部门工人包括在内尤其具有挑战性,但却是必要的,因为大部分未受保护的工人是在该部门工作。目前正探讨三种为这些工人提供福利的途径:(a) 专门制订(自行资助)的社会保险计划,(b) 社会基金,(c) 正规部门社会保险计划的延伸和改革。

(c) 各项政策应满足在非正式部门中人数过多的妇女的需求,支持针对妇女的自营职业、培养创业技能和资助小企业的方案。在一些情况下,自营职业和小企业可以是替代有薪酬就业的可行办法。在其他一些情况下,则是万不得已的就业办

法。生产者协会和工人协会以及小企业信贷机构等组织能发挥重要作用,提高非正式部门的生产力和收入。为提高该部门中工人的生活标准,各项政策应支持努力调动和培训妇女,开展不断进行各种集体的活动,如采购、维修和管理共同生产设施以及推销产品等;

(d) 妇女在土地和其他资产方面的财产权利需得到加强,尤其是在最不发达国家。各项政策应鼓励当地妇女团体集体购买土地,并鼓励能使妇女获得更大的土地控制权的其他计划。另外,需采取各种措施,支持妇女关于劳作应获得现金收入的要求。一项简单的措施可以是制订一项计划,由地方采购中心来支付出口农作物的数额,根据每个家庭成员的劳动投入直接给予他们报酬,而不是直接支付给男性农民。

### 3. 人力资源方面的性别不平等和投资

332. 就业灵活的一个结果是劳动力更替速度加快,这可能会减少公司在人力资源方面投资的动机。所有企业均可从提高劳动力技能中获益。但是,如果每个公司无法成为唯一可能的获益者,它则不会投资提高某些资源的水平。如果通常无法期待工人能长久地从事一份工作,他们的雇主更加不愿意在他们身上投资。在市场自由化的情况下,跨国公司对其工人作出的(公开和暗中)承诺正在减少,同样的工人对公司的忠诚程度和他们预期任职的时间也减少。

333. 女工很可能因上述趋势而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因为妇女从事具有较高更替率的临时工作的人数比男子多得多,而且雇主通常认为,与男子相比较,妇女更有可能因育儿、结婚和照顾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员而离职。所以,需要有政策来:

(a) 鼓励各公司提高生产力,办法是在工人身上投资,而非依靠削减成本来提高其竞争力;

(b) 促进男女之间平等地获得培训和再培训的机会。

334. 具体政策措施可包括:(a) 在各类培训方案为女孩规定指标(配额比例或实际人数),尤其要鼓励她们进入科技领域,协助她们打破现有的职业区分;(b) 采取特别措施,便利具有家庭责任的工人进入面向劳动力市场的培训和再培训方案;(c) 在培训课程的设置,讲授和地点方面有灵活性,并将提供育儿服务作为这种方案的组成部分;(d) 在培训系统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确定更为有效的联系,以便妇女能得到更易于获得就业的技能,并能将她们的培训用到经济活动中;(e) 采取有具体针对对象的措施,向自营职业的妇女提供企业经营的培训;和(f) 创造机会使妇女能在增长较快的经济部门中从事依靠新技术的工作,同在基本衰退的部门中从事以往由男子从事的工作相比,这种办法能更有效地实现性别平等(劳工组织,1998年b)。

### 4. 使性别问题纳入宏观经济政策

335. 经济学家和决策者普遍持有一个一般性假设是,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和手段均不分性别。然而,一些经济学家认为 1980 年代在发展中国家通过结构性调整政策一直实施的宏观经济政策对性别造成不均衡的影响(第五章 C 节)。同样,在 1990 年代,宏观经济政策已造成通货紧缩趋势,对两性产生不一致的结果(第五章 A 节)。

336. 另外,人们认识到,宏观经济与性别关系之间的因果关系可以是相互的。有一种分析首先由持有女权主义观点的经济学家确认宏观经济政策不会产生不分性别的影

响,这种分析趋于注重性别关系对宏观经济产生的反馈影响。这种对宏观经济分析采取认识到性别问题的新办法在概念方面的出发点可概括为以下三个主要论点(Cagatay 和其他人,1995 年):

(a) 虽然社会机构本身并不带有性别色彩,但它们会产生和传递性别偏见。“自由市场”是由社会建立的机制,因此,也反应和加强性别不平等;

(b) 只要经济活动的范围不包括未付薪酬的“重新产生性的”劳动,在一个特定社会里重新产生和维持劳动力的代价仍然是无形的。因此,没有薪酬的工作需要引起人们的注意,而且需要重新界定工作在经济方面的含义,以便包括没有薪酬的重新产生性劳动。

(c) 性别关系在分工以及工作、收入、财富和生产投入的分配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并已产生重大的宏观经济影响。这意味着经济行为也是有性别之分。

337. 由于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将经济的法律和体制结构视为假定的事实,结果是不考虑性别问题,而非没有性别区分。它没有考虑到在劳动力市场立法,财产权利和遗产法中对男子的偏袒而这些偏袒都限制和决定妇女的经济活动。

338. 财政政策就是一个良好的例子,表明需要而且能够对宏观经济政策产生的性别方面影响进行详细研究(Elson,1997 年 b)。在澳大利亚、巴巴多斯、加拿大、南非和联合王国等不同国家里,妇女有关预算的说明和顾及性别问题的预算提案已经或正在变成一项手段,使宏观经济或财政政策能顾及到性别问题。这些说明和提案被用来审查和分析国家预算和开支,以确定哪些群体从财政政策中获益;预算和财务政策是否有对妇女、穷人或其他处境不利群体的不利之处。这些努力的最终目的是使宏观经济政策能满足被剥夺权力的群体和妇女的需求。<sup>91</sup>

## 5. 建立一个有利的政策环境的国际措施

339. 如上所述,对吸引资金和国际竞争力问题的关切会限制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同样,由于世界经济中资本和贸易流向越发依赖各国间在成本上的差异,也许现在更难以采取旨在加强各国劳工标准的政策。在全球化的环境中,可能愈加需要对国际政策进行协调,以防止个别国家之间,为在世界贸易和资本流通中获取优势而进行“降到最低点的竞争”。因此,为了能长期切实可行,在确定上述宏观经济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目标和措施的同时还需要在国际上采取以下一套措施:

(a) 贸易政策提案需确定它们很可能产生的超越生产者利益的社会影响,并列入经广泛讨论商定的福利支助措施。对性别的影响是社会影响社会发展的一个明确和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的贸易政策审查应包括审议现有和拟订的贸易政策对性别的影响;

(b) 要普遍实施核心劳工标准。核心劳工标准包括自由结社、集体谈判权力、消除各种形式的强迫或强制劳动、消除童工以及消除就业中的歧视。劳工组织

<sup>91</sup> 见 Budlender 和其他人(1998 年)和 Elson(1997 年 b);另见由开发计划署和妇发基金 1999 年 6 月主办的一次专题会议的详细记录,题为“有利于穷人、顾及性别和环境问题的预算”。可从以下网址查阅:<<http://www.undp.poverty/>>。

1998 年通过的《关于工作场所基本原则和权利的宣言》,呼吁建立一个国际监测机制,协助各国消除实施核心劳工标准的障碍;

(c) 需要稳定资本流通,防止波动太大和经济混乱。虽然对具体措施的讨论不属于本概览的范围,改革的总体方向必须是建立“减速路障”,减缓资本进出的速度。<sup>92</sup> 对管制资本流通的工作进行国际协调的另一个好处可能是能使各国放松紧缩的金融和财政政策,这能为国际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增加收益,但会减缓经济增长;

(d) 必须开展国际协调,促成有足够的全球经济需求。对于近年来宏观经济政策已出现的通货紧缩趋势,这将是一项对策。

---

<sup>92</sup> 关于稳定资本流通不同方法的讨论,见 Blecker(1999 年)。

## References

- Acevedo,L.D.A. (1990). Industrialization and employment:changes in the patterns of women's work in Puerto Rico. *World Development*,vol.18,No. 2 (February),pp. 231-55.
- Afshar,H.,and C. Dennis. (1992). *Women and Adjustment Policies in the Third World*. London:Macmillan.
- Agarwal,B. (1994). *Field of One's Own:Gender and Land Rights in South Asia*.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1995). Gender and command over poverty:a critical gap in 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 in South Asia. In *Reader:Gender and Macro Economic Development*. I. Van Staveren,ed.,in cooperation with D. Elson. Utrecht: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and Oikos.
- \_\_\_\_\_ (1997a). Editorial:re-sounding the alert ,gender,resources and community action. *World Development*,vol. 25,No. 9 (September),pp. 1373-1380.
- \_\_\_\_\_ (1997b). Gender,environment,and poverty interlinks:regional variations and temporal shifts in rural India,1971-91. *World Development*,vol. 25,No. 1 (January),pp. 23-52.
- Alarcon,D.,and T. McKinley. (1997). The sources of rising income inequality and polarization in Mexico from 1989 to 1994. Mimeo. University of Toronto,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 Alexandratos,N.,ed. (1995). *World Agriculture:Towards 2010:An FAO Study*. Chichester,England:FAO and John Wiley and Sons Ltd.
- Alunan,G. (1993). Abuses against Asian migrant women:a human rights issue. In *Women on the Move:Proceedings of the Workshop on Human Rights Abuses Against Immigrant and Refugee Women*,18 June 1993. Vienna:Family Violence Prevention Fund.
- Amin,S.,I. Diamond,R. T. Naved and M. Newby (1998). Transition to adulthood of female garment factory workers in Bangladesh. *Studies in Family Planning*,vol. 29,No. 2 (June),185-200.
- Anker,R. (1998). *Gender and Jobs:Sex Segregation of Occupations in the World*. Geneva:ILO.
- Anker,R.,M.E. Khan and R.B. Gupta (1987). Biases in measuring the labour force:results of a metho test survey in Uttar Pradesh,India.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vol. 126,No. 2 (March-April),pp. 151-67.
- Anker,R.,and H. Melkas (1998). *Gender Equality and Occupational Segregation in Nordic Labour Markets*. Geneva:ILO.

- Antrobus, P. (1995). Structural adjustment: cure or curse? Implications for Caribbean development. In Reader: Gender and Macro Economic Development. I. Van Staveren, ed., in cooperation with D. Elson. Utrecht: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and Oikos.
- Baffes, J., and M. Gautam (1996). Price responsiveness, efficiency, and the impact of structural adjustment on Egyptian crop producers. *World Development*, vol. 24, No. 4 (April), pp. 765-771.
- Bakker, I. (1994). *The Strategic Science: Gender and Economic Policy*. London: Zed Press.
- Bank of Korea (1999). *Monthly Statistical Bulletin*, May 1999.
- Barber, B.R. (1995). *Jihad vs. McWorld*. New York: Belantine Books.
- Barrett, C.B. (1998). Immiserized growth in liberalized agriculture. *World Development*, vol. 26, No. 5 (May), pp. 743-753.
- Barro, R.J., and J.W. Lee (1993). Losers and winners in economic growth. *Proceedings of the World Bank Annual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Barsotti, E., and L. Lecchini (1995). The experience of Filipino female migrants in Italy. In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Policies and the Status of Female Migrants: Proceedings of the United Nations Expert Group Meeting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Policies and the Status of Female Migrants*, San Miniato, Italy, 28-31 March 1990. New York.
- Becker, G. (1965). A theory of the allocation of time. *Economic Journal*, vol. 75, No. 299 (September), p. 493.
- Bell, P. (1998). Gender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ailand. In *Gender and Development in Southeast Asia*, Penny and John Van Esterik, eds. *Proceedings of the twentieth meeting of the Canadian Council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York University, October 18-20, 1991.
- Beneria, L. (1979). Reproduction, production and the sexual division of labour".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3, No. 3 (September), pp. 203-225.
- \_\_\_\_\_ (1992). The Mexican debt crisis: restructuring the economy and the household," in *Unequal Burden: Economic Crises, Persistent Poverty and Women's Work*, L. Beneria and S. Feldman, eds.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 \_\_\_\_\_ (1995). Toward a greater integration of gender in economics. *World Development*, vol. 23, No. 11 (November), pp. 1839-50.
- Beneria, L., and A. Lind (1995). *Engendering international trade: concepts, policy and action*. Gender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SD)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5.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 Beneria,L.,and M. Rordan. (1987). The crossroads of class and gender:industrial homework,subcontracting and household dynamics in Mexico City. 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Beneria,L.,and S. Feldman,eds.(1992). Unequal Burden:Economic Crisis,Persistent Poverty,and Women's Work. Boulder,Colorado:Westview Press.
- Berik,G. (1995). Growth with gender inequity: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in Taiwa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gender,adjustment,and macroeconomic models round-table discussion at the Allied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 meeting,Washington,D.C.,January 1995.
- Berry,A.,and F. Stewart. (1996). Market liberalization and income distribution:the experience of the 1890s. In Global Development Fifty Years After Bretton Woods,R. Culpeper,A. Berry and F. Stewart,eds. New York:St. Martin's Press.
- Besley,T. (1995). Property rights and investment incentives: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Ghana.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 103,No. 5 (October),pp. 903-937.
- Bhattacharya,D. (1997). Gender dimensions of labour market dynamics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Bangladesh's experience in the apparel sector. Paper prepared for an internal workshop on gender sensitization,UNCTAD,9 and 10 December 1997. Geneva.
- Bhowmik,S.,and R. Jhabvala. (1996). Rural women manage their own producer co-operatives:Self Employed Women's Association (SEWA)/Banaskantha Women's Association in Western India. In *Speaking Out:Women's Economic Empowerment in South Asia*,M. Carr,M. Chen and R. Jhabvala,eds. London:IT Publications.
- Biggs,T.,and P. Srivastava. (1996). Structural Aspects of Manufacturing in Sub-Saharan Africa. World Bank Discussion Paper,No. 346. Washington,D.C.:World Bank.
- Birdsall,N.,and R. Sabot (1991). Unfair Advantage:Labour Market Discrimin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orld Bank Regional and Sectoral Studies,Washington,D.C.:World Bank.
- Black,S.,and E. Brainerd. (1999). Importing equality? ,The effects of increased competition on the gender wage gap. Mimeo.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 Blau,F.D. (1998). Trends in the well-being of American women,1970-1995.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vol. 36,No. 1 (March),pp. 112-165.
- Blecker,R. (1999). Taming Global Capital. Armonk,New York:M.E. Sharpe,Inc. for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 Bluestone,B.,and B. Harrison. (1982). The Deindustrialization of America:Plant Closings,Community Abandonment,and the Dismantling of Basic Industry. New York:Basic Books.
- Boserup,E. (1970). Woman's Rol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York:St. Martin's Press.

- Brofenbrenner, K. (1998). Final report: the effects of plant closing or threat of plant closing on the right of workers to organize. Cornell University, submitted to the Labor Secretariat of the North American Commission for Labor Cooperation.
- Butchemann, C., and S. Quack. (1989). "Bridges" or "traps"? Non-standard employment in the Federated Republic of Germany. In *Precarious Jobs In Labour Market Regulation: The Growth of Atypical Employment In Western Europe*, G. Rodgers and J. Rodgers, eds. Geneva: ILO.
- Buckley, G. (1997). Microfinance in Africa: is it either the problem or the solution? *World Development*, vol. 25, No. 7 (July), pp. 1081-1093.
- Budlender, D., R. Sharp and K. Allen (1998). *How to Do a Gender-Sensitive Budget Analysis: Contempora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Canberra and London: Australian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Commonwealth Secretariat, 1998.
- Bullock, S. (1994). *Women and Work*. London and New Jersey: Zed Press.
- Buvinic, M., M.A. Lycette and W.P. McGreevey, eds. (1983). *Women and Poverty in the Third World*.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Cagatay, N., and S. Ozler. (1995). Feminization of the labor force: the effects of long-term development and structural adjustment, *World Development*, vol. 23, No. 11 (November), pp. 1883-1894.
- Cagatay, N. (1996). Trade and gender in issues of concern. Asian and Pacific developing economies and the first WTO Ministerial Conference. *ESCAP Studies in Trade and Investment*, No. 22. Jakarta: UNDP.
- Cagatay, N., D. Elson and C. Grown. (1995). Introduction to special issue on gender, adjustment and macroeconomics. *World Development*, vol. 23, No. 11 (November).
- Carletto, C. (1998). Household food security and the role of women: IFAD's experience in Guatemala. *Staff Working Paper on Household Food Security and Gender*, No. 3. Rome: IFAD.
- Carmody, P. (1997). Neoclassical practice and the collapse of industry in Zimbabwe: the cases of textiles, clothing, and footwear.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University of Vermont.
- Castells M., A. Portes and L.A. Benton (1989). *Informal Economy: Studies in Advanced and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Castells, M. (1993). The informational economy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In *The New Global Economy in the Information Age*, M. Carnoy, et al., eds.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Chambas, G. (1994). *Fiscalité et développement en Afrique subsaharienne*. Paris: Economica.

- Charmes, J. (1998a). Contribution of women working in the informal sector in Africa: a case study. Paper prepared for the 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 Division umbrella gender statistics programme and presented at a meeting of the Statistical Commission's Delhi Group on Informal Sector Statistics, Ankara, 28-30 April 1998.
- Charmes J. (1998b). A follow-up survey of microenterprises in West Africa. Paper presented at a conference on the theme "Enterprise in Africa: between poverty and growth", Edinburgh, 26 and 27 May.
- Chen, M., J. Sebstad and L. O'Connell. (1998). Counting the invisible workforce: the case of homebased workers. *World Development*, forthcoming volume.
- Christerson, B., and R.P. Appelbaum (1995). Global and local subcontracting: space, ethnicity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apparel production. *World Development*, vol. 23, No. 8 (August), pp. 1363-1374.
- Collins, J. (1995). Gender and cheap labour in agriculture. In *Food and Agrarian Orders in the World Economy*, P. McMichael, ed. Westport,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 Commander, S., ed. (1989). *Structural Adjustment and Agriculture: Theory and Practice in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 London: James Currey.
- Cornia, G., R. Jolly and F. Stewart, eds. (1987). *Adjustment with a Human Face*, two volum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Cottam, H., (1993). Women in microenterprise: productive empowerment or the feminization of poverty, a case study of the Dominican Republic. Unpublished paper.
- D'Intignano, B. M. (1999). *Egalité entre femmes et hommes: aspect économiques*. Paris: La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
- Daeren, L. (1998). Cuestiones en género en la industria maquiladora en América central y República Dominicana. Paper presented to an ILO subregional tripartite meeting, San José, Costa Rica, 25-28 November 1997. Cited in ILO, 1998, *Social and Labour Issues in Export Processing Zones*. Geneva: ILO.
- Daniels, L. (1999). The role of small enterprises in the household and national economy in Kenya: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or a last resort? *World Development*, vol. 27, No. 1 (January), pp. 55-65.
- De Jeu B., (1998). Contribution of the informal sector to the employment and value added in selected countries. Paper prepared for the second meeting of the Statistical Commission's Expert Group on Informal Sector Statistics, Ankara, 28-30 April 1998.
- De Soto H. (1986). *El Otro Sendero*. Lima: Editorial El Barranco.
- Dean, J. (1991). Sex-segregated employment, wage inequality, and labor-intensive production: a study of 33 United States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vol. 23, Nos. 3 and 4 (Fall-Winter), pp. 244-68.

Deere, C. D. and León M. (1997). Women, land rights and the Latin American counter-reforms. Paper prepared for presentation at the Twentie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Latin Ame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 Guadalajara, Mexico, 17-19 April 1997.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ights, (1998). Gone with the flow? ,Are free capital bonanzas good for development?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Issue 26 (ID21). Brighton: University of Sussex, June 1998.

Dey-Abbas, J. (1992). Gender asymmetries in intrahousehold resource allocation in sub-Saharan Africa: some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land and labor productivity. In *Intrahousehold Resource Alloc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Models, Methods and Policy*, L. Hadaad, J. Hoddinott and H. Alderman, ed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Dollar, D., and R. Gatti. (1999). Gender inequality, income and growth: are good times good for women? Policy Research Report on Gender and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1.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Donahue, T.R. (1994). International labour standards: the perspective of labour. In *International Labour Standards and Global Economic Integration: Proceedings of a Symposium*.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Labor.

Dujon, V. (1997). Communal property and land market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policy in Saint Lucia. *World Development*, vol. 25, No. 9 (September), pp. 1529-1540.

Duncan, A., and J. Howell. (1992). *Structural Adjustment and the African Farmer*. London: James Currey.

Eatwell, J. (1996). International capital liberalization: the impact on world development. CEPA Working Paper Series I, Working Paper No. 1.

Eelens, F. (1995). Migration of Sri Lankan women to western Asia. In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Policies and the Status of Female Migrants: Proceedings of the United Nations Expert Group Meeting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Policies and the Status of Female Migrants*, San Miniato, Italy, 28-31 March 1990. New York.

Eichengreen, B., and M. Mussa. (1998). Capital account liberalization and the IMF.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vol. 35, No. 4 (December), pp. 16-19.

Elson, D. (1991a). "Male bias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 overview". In *Male Bias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D. Elson, ed.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_\_\_\_\_ (1991b). "Male bias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the case of structural adjustment." In *Male Bias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D. Elson, ed.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_\_\_\_\_ (1995). Gender awareness in modeling structural adjustment. *World Development*, vol. 23, No. 11 (November), pp. 1851-1868.

\_\_\_\_\_ (1997a). Gender and macroeconomic policy. In *Gender and Development*, No. 2 (Summer), pp. 12-14.

\_\_\_\_\_ (1997b). Integrating gender issues into national budgetary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within the context of economic reform: some policy options. Preparatory Country Mission to Integrate Gender into National Budgetary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London: Commonwealth Secretariat.

\_\_\_\_\_ (1999). "Labor markets as gendered institutions: equality, efficiency and empowerment issues," *World Development*, vol. 27, No. 3 (March), pp. 611-27.

Ertürk, K., and N. Cagatay. (1995). Macro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cyclical and secular changes in feminization: an experiment at gendered macromodeling." *World Development*, vol. 23, No. 11 (November), pp. 1969-77.

Ertürk, Y. (1994). *Patterns of Child Labour in Rural Turkey*. Ankara: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Ertürk, Y. (1998). Community, convention and the trends of change. In *Agricultural Sector and Employment in Turkey*, T. Bulutay, ed., Turkish State Institute of Statistics, No. 2209, pp. 97-122. Ankara.

Eurostat (1996). *Labour Force Survey*. Luxembourg: Office for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_\_\_\_\_ (1998). *Social Portrait of Europe*. Third edition. Luxembourg: Office for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Evers, B. (1994). Gender bias and macroeconomic policy: methodological comments from the Indonesian example. In *The Strategic Silence: Gender and Macroeconomic Policy*. I. Bakker (ed.) London: Zed Books.

Ezumah, N., and C.M. Di Domenici. (1997). Enhancing the role of women in crop production: a case study of Igbo women in Nigeria. *World Development*, vol. 23, No. 10 (October), pp. 1731-1744.

FAO (1990). *Women, Food Systems and Agriculture*, Rome.

\_\_\_\_\_ (1994). *FAO Collaboration with International Trade Unions in Support of Rural Workers' Participation in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Rome.

\_\_\_\_\_ (1995a). *A Fairer Future for Rural Women*. Rome.

\_\_\_\_\_ (1995b). *Thirteenth Consultation between FAO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Unions*. Rome (December).

\_\_\_\_\_ (1995c). *Women,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A Synthesis Report of the Africa Region*. Rome.

\_\_\_\_\_ (1995d). *Gender Issues in Agricultural and Rural Development Policy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Bangkok.

\_\_\_\_\_ (1996a). Rome Declaration on World Food Security and World Food Summit Plan of Action. In Report of the World Food Summit, appendix. Rome.

\_\_\_\_\_ (1996b). Rural Women and Food Security: Current Situation and Perspectives. Rome.

\_\_\_\_\_ (1996c). Women and the Green Revolution. Rome.

\_\_\_\_\_ (1996d). Women and Water Resources. Rome.

\_\_\_\_\_ (1996e). Women: Users, Preservers and Managers of Agro-Biodiversity. Rome.

Felix, D. (1995). Financial globalization versus free trade: the case for the Tobin tax. UNCTAD Discussion Papers, No. 108.

Fernandez-Kelly, M. P., and S. Sassen. (1993). Recasting Women in the Global Economy: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Changing Definitions of Gender.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Working Paper, No. 36.

FIAS. (1998a).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Background paper by C. Aaron and T. Andaya. Paper presented at a FIAS/UNDP/HIID workshop on FDI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HIID, 28 and 29 May. Washington, D. C.: FIAS. Mimeo.

FIAS. (1998b). Anatomy of foreign investment. Paper presented by D. Weigel at a FIAS/UNDP/HIID workshop on FDI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HIID, 28 and 29 May. Washington, D. C.: FIAS. Mimeo.

Financial Times. 15 and 16 August 1998.

Financial Times. 18 May 1998.

Floro, M. (1995). Economic restructuring, gender and the allocation of time. World Development, vol. 23, No 11 (November).

Fontana, M., S. Joekes and R. Masika. (1998). Global trade expansion and liberalization: gender issues and impacts. Report Commissioned by the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nited Kingdom.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BRIDGE Report No. 42. Brighton: University of Sussex (January).

Fretwell, D., J. Benus and C. O'Leary. (1999). Evaluating the impact of active labor programs: results of cross country studies in Europe and Central Asia. World Bank Discussion Paper.

Galan, B.B. (1998). Aspectos jurídicos en el acceso de la mujer rural a la tierra en Cuba, Honduras, Nicaragua y República Dominicana. Draft paper of the Women in Development Service. Rome: FAO.

Galbraith, J., W. Darity Jr. and L. Jiaqing. (1998). Measuring the evolution of inequality in the global economy. CEPA Working Paper Series III, Working Paper No. 4.

- Galtung,J. (1996). The nation state and citizenship:and then global citizenship? ,The cultural,political and institutional background. Paper presented at a globalization and citizenship conference,UNRISD,September-November 1996. Geneva.
- Ghosh,J. (1995). Structural adjustment and female employment:issues relating to rural women. In Reader:Gender and Macro Economic Development. I. Van Staveren,ed.,in cooperation with D. Elson. Utrecht: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and Oikos.
- Ghosh,J. (1998). In ESCAP,Impact of Globalization on Women:Women and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in the Asian and Pacific Region. Bangkok.
- Girvan,L. (1995). Women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National sectoral report for Namibia. Rome:FAO.
- Goetz,A. M.,and R. S.G. (1996). Who takes the credit? gender,power,and control over loan use in rural credit programs in Bangladesh. World Development,vol. 24,No. 1 (January),pp. 45-63.
- Gonzalez de la Rocha,M. (1994). The urban family and poverty in Latin America.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vol. 22,No. 2 (Spring),pp. 12-31.
- Goonatilake,H.,and S. Goonesekere (1988). Industrialization and women workers in Sri Lanka:working condition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investment promotion zone. In Daughters in Industry:Work Skills and Consciousness of Women Workers in Asia,Heyzer,N.,ed. Kuala Lumpur:Asian and Pacific Development Centre.
- Gabel,I. (1996). Marketing the third world:the contradictions of portfolio investment in the global economy. World Development,vol. 24,No. 11 (November),pp. 1761-76.
- Greenhalgh,S. (1985). Sexual stratification:the other side of “growth with equity” in East Asi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vol. 11,No. 2 (June),pp. 264-314.
- Griffith-Jones,S.,and B. Stallings. (1995). New global financial trends:implications for development. In Global Change,Regional Response:The New International Context of Development,Barbara Stallings,ed.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riffith-Jones,S.,J. Cailloux and S. Pfaffenzeller. (1998). The East Asian financial crisis:a reflection on its causes,consequence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Discussion Paper,No. 367. Brighton:University of Sussex.
- Grosh,M. (1990). Social Spending in Latin America:The Story of the 1980s. World Bank Discussion Papers,No. 106. Washington,D.C.:World Bank.
- Grunberg,I.(1998). Double jeopardy:globalization,liberalization,and the fiscal squeeze. World Development,vol. 26,No. 4 (April),pp. 591-605.
- Guijt,I.,and M. K. Shah (Eds). (1998). The Myth of Community:Gender Issues in Participatory Development. London:Intermediate Technology Publications.

- Hafeez,S. (1989). Women in Industry,vol. 2. Islamabad:Women's Division,Government of Pakistan.
- Hamelink,C. (1997). New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social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Discussion Paper,No. 86. Geneva:UNRISD.
- Hashemi,S.M.,S.R. Schuler and A. P. Riley (1996). Rural credit programs and women's empowerment in Bangladesh. World Development,vol. 24 No. 4 (April),pp. 635-653.
- Heyzer,N. (1982). From rural subsistence to an industrial peripheral workforce:an examination of female Malaysian migrants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in Singapore. In Women and Development:The Sexual Division of Labour in Rural Societies,L. Beneria,ed. New York:Praeger.
- Heyzer,N. (1987). Women Farmers and Rural Change in Asia:Towards Equal Access and Participation. Kuala Lumpur:Asian and Pacific Development Centre.
- Howes,C.,and A. Singh. (1995). Long-term trends in the world economy:the gender dimension. World Development,vol. 23,No. 11 (November),pp. 1895-1911.
- Hsiung,P. (1998). Living Rooms as Factories:Class,Gender and the Satellite Factory System in Taiwan. 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Hulme,D.,and P. Mosley. (1996). Finance Against Poverty,two volumes. London:Routledge.
- Hytrek,G.(1995). Labour and social development:Costa Rica and Chile. Journal of Third World Studies,vol. 12,No. 2 (Fall),73-102.
- ILO (1975). Rural Workers' Organizations Recommendation,No. 149. Geneva.
- \_\_\_\_\_ (1991). The dilemma of the informal sector. Report of the Director-General (Part I)submitted to the seventy-eighth sess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Labour Conference. Geneva.
- \_\_\_\_\_ (1994). Convention on Part-Time Workers,No.175. Geneva.
- \_\_\_\_\_ (1995a). Home work. Report submit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Labour Conference,eighty-second session . Geneva:ILO.
- \_\_\_\_\_ (1995b). Invisible workers in Viet Nam. Report published by the Programme on Women,Development Policies Department. Geneva.
- \_\_\_\_\_ (1996a). Economically Active Population 1950-2010. Geneva.
- \_\_\_\_\_ (1996b). Globalization of the Textile,Clothing and Leather Industries.
- \_\_\_\_\_ (1996c). Statistics on Poverty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Geneva.
- \_\_\_\_\_ (1996d). Convention on Homeworkers,No. 177. Geneva.
- \_\_\_\_\_ (1996/7). World Employment Report 1996/97. Geneva.
- \_\_\_\_\_ (1997). Breaking through the Glass Ceiling:Women in Management. Geneva.

\_\_\_\_\_ (1998a). Labour and social issues relating to export processing zones. Report for discussion in a tripartite meeting of export processing zone-operating countries. Geneva.

\_\_\_\_\_ (1998b). The social impact of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Report for discussion at a high-level tripartite meeting on social responses to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Bangkok, 22-24 April 1998. ILO Regional Office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_\_\_\_\_ (1998c). World Employment Report 1998/99. Geneva.

\_\_\_\_\_ (1999). New Challenges for Employment Policy. Geneva.

ILO/UNCTC. (1988). Economic and Social Effects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in Export Processing Zones. Geneva: ILO.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1994). Emerging Stock Markets Fact Book.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Jayaweera, S., P. Alailima, C. Rodrigo and R. Jayatissa (1989). Women and structural adjustment: the Sri Lankan experience. In Women and Adjustment: Selected Case Studies. London: Commonwealth Secretariat.

Jazairy, I., M. Alamgir, and T. Panuccio (1992). The State of World Rural Poverty: An Inquiry into it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New York: IFAD/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Joekes, S. (1982). Female-led industrialization: women's jobs in third world export manufacturing, the case of the Moroccan clothing industry.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Research Report, No. 15. Brighton: University of Sussex.

Joekes, S. (1995). Trade-related employment for women in industry and servic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Occasional Paper, NO. 5. Geneva: UNRISD.

Joekes, S., and A. Weston (1994). Women and the New Trade Agenda. New York: UNIFEM.

Joshi G. (1997). Urban Informal Sector in Metro Manila: A Problem or Solution? Geneva: ILO.

Kabeer, N. (1995). Necessary, sufficient or irrelevant? women, wages and intra-household power relations in urban Bangladesh.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Working Paper, No. 25. Brighton: University of Sussex.

Kaplinsky, R. (1998). If you want to get somewhere else, you must run at least twice as fast as that!: the roots of the East Asian crisis. Paper prepared for the East Asian Conference,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Brighton, July 1998.

Karl, M. (1997). Higher Agricultural Education and Opportunities in Rural Development for Women. Rome: FAO.

Karl, M. (1995). Women and Empowerment: Participation and Decision-Making. London: Zed Press.

- Kasugo, T., and Z. Tzannatos, (1998). *Export Processing Zones: A Review in Need of Update*.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No. 9802.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Kim, T.H., and K.H. Kim. (1995).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in Korea and its consequences for women workers. In *Asian Women Workers Confront Challenges of Restructuring: Research Papers and Consultation Recommendations on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on Women Workers in Asia*, Committee for Asian Women, Asia, eds. Hong Kong, China: Committee for Asian Women.
- King, E., and A. Hill. (1995). Women's education and economic well-being. *Feminist Economics*, vol. 1, No. 2 (Summer), pp. 21-46.
- Krongkaew, M. (1994). Income distribution in East Asia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 update. *Asia-Pacific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8, No. 2 (November), pp. 58-73.
- Kucera, D. (1998). Foreign Trade and Men and Women's Employment and Earnings in Germany and Japan.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Analysis (CEPA) Working Paper Series I, Working Paper No. 9.
- Kucera, D., and W. Milberg (1999). Gender segregation and gender bias in manufacturing trade expansion: revisiting the wood asymmetry. Paper prepared for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Group on Engendering Macro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5 and 26 March. New York.
- Kumudhini, R. (1994). The conditions and organizational activities of women in free trade zones: Malaysia, Philippines and Sri Lanka 1970-1990. In *Dignity and Daily Bread: New Forms of Economic Organizing Among Poor Women in the Third World and the First*, S. Rowbotham and S. Mitter, eds. London: Routledge.
- LaCroix, S., M. Plummer and K. Lee, eds. (1995). *Emerging Patterns of East Asian Investment in China*. Armonk, New York: M.E. Sharpe, Inc.
- Lado, C. (1992). Female labor participation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nutrition and health in rural Africa.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vol. 34, No. 2 (April), pp. 787-807.
- Lastarria-Cornhiel, S. (1997). Impact of privatization on gender and property rights in Africa. *World Development*, vol. 25, No. 8 (August), pp. 1317-1333.
- Lawrence, M., and J. Bernstein. (1994). *The State of Working America*.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Inc.
- Le Heron, R. (1991). Perspectives on pluriactivity. In *Family Farming: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M. Alston, ed. Wagga Wagga, Australia: Charles Stuart University, Center for Rural Social Research.
- Lee, J., and C. Rhee. (1999). Social impacts of the Asian crisis: policy challenges and lessons.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Office Occasional Papers*, No. 33.

León,M. (1987).The situation of rural women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In Rural Women in Latin America. Rome:ISIS International.

Lim,L. (1990). The politics of a cause. In Persistent Inequalities:Women and World Development,I. Tinker,ed. New York an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More and Better Jobs for Women. Geneva:ILO.

\_\_\_\_\_ (1997). Flexible labour markets in a globalizing world:the implications for international female migr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a conference on the them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t century’s end:trends and issues”,organized by the IUSSP Committee on South-North Migration,Barcelona,7-10 May. Geneva:ILO.

\_\_\_\_\_ (1998). The analysis of factors generating international migration:The processes generating the migration of women. Paper presented at a technical symposium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29 June-3 July 1998,the Hague.

\_\_\_\_\_Lind,A. (1997). Gender,development and urban social change:women’s community action in global cities. World Development,vol. 25,No. 8 (August),pp. 1205-1223.

Lipsey,R. (1998). Internationalized production in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in industry sectors. NBER Working Paper No. 6405.

Martens,M. H. (1994). Migrant women as domestic workers. In Women in Trade Unions:Organizing the Unorganized,M. H. Martens and S. Mitter,eds. Geneva:ILO.

Martens,M. H. and S. Mitter,eds. (1994). Women in Trade Unions:Organizing the Unorganized. Geneva:ILO.

McCrate,E. (1999). The growing class divide among American women. University of Vermont,Department of Economics.

Mead,D. (1998). MSEs tackle both poverty and growth but in differing proportions. Paper presented to a conference on the theme “Enterprise in Africa:between poverty and growth”,University of Edinburgh,Centre of African Studies,26 and 27 May.

Meer,S. (1997). Gender and land rights:the struggle over resources in post-apartheid South Africa. IDS Bulletin,vol. 28,No. 3 (July).

Mehra,R.,and S. Gammage. (1999). Trends,countertrends,and gaps in women’s employment. World Development,vol. 27,No. 3 (March),pp. 533-550.

Migration News. (1996). Female migrants in Asia. In Migration News,vol. 3,No. 8 (August).

Mitter,S.,and S. Rowbotham (1995). Women Encounter Technology:Changing Patterns of Employment in the Third World. London:Routledge/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Institute for New Technologies.

- Moser,C. (1992). Adjustment from below:low income women,time and the triple role in Guayaquil,Ecuador. In *Women and Adjustment Policies in the Third World*,H. Afshar and C. Dennis,eds. London:Macmillan.
- Moser,C. (1998). The asset vulnerability framework:reassessing urban 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ies. *World Development*,vol. 26,No. 1 (January).
- Moser,C.,and J. Holland. (1997). *Urban Poverty And Violence in Jamaica*. Washington,D.C.:World Bank.
- Moser,C. O. N. (1996). Confronting crisis:a comparative study of household responses to poverty and vulnerability in four poor urban communities. *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udies and Monograph Series*,No.8. Washington,D.C.:World Bank.
- Moser,C. O. N. (1993). *Gender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Theory,Practice and Training*. London:Routledge.
- Nam,J. (1994). Women's role in export dependence and state control of labor unions in South Korea.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vol. 17,No. 1 (January-February),pp. 57-67.
- Namibia (1995). *National Agricultural Policy*. Windhoek:Ministry of Agriculture,Water and Rural Development.
- Nelson,P.,and J. Smith. (1999). *Working Hard and Making Do:Surviving in Small Town America*.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Netherlands Development Assistance (1997). *Rights of Women to Natural Resources,Land and Water*. Working Paper No. 2. The Hague.
- O'Reilly,J.,and C. Fagan,eds. (1998). *Part-Time Prospects: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Part-Time Work In Europe,North America and the Pacific Rim*.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 Odaga,A.,and W. Heneveld (1995). *Girls and schools in sub-Saharan Africa:from analysis to action*. Technical Paper No. 298,Washington,D.C:World Bank.
-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1997).*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ODI Briefing Paper. London.
- OECD (1997). *Employment Outlook 1997*. Paris.
- OECD (1998). *Employment Outlook 1998*. Paris.
- Ozler,S. (1999a). Exporting and female share of employment:evidence from Turkey. Paper prepared for an international working group on engendering macro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1999b). *Globalization,employment and gender*. Background paper for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9. New York:UNDP.

\_\_\_\_\_Papalquier,F. (1998). Competitive strategies,competencies management and interfirm networks:a discussion of current changes and implications for employment. Paper for an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the theme "Global production and local jobs:new perspectives on enterprise networks,employment and local development policy",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Labour Studies,Geneva,9 and 10 March.

Parisotto,A. (1993). Direct employment in multinationals enterprises in industrializ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 1980s:main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s. In *Multinationals and Employment:The Global Economy of the 1990s*. Geneva:ILO.

Pearson,R. (1992).Gender issues in industrialization. In *Industri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T. Hewitt,H. Johnson and D. Wiold,eds.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in association with the Open University.

Pearson,R.,and S. Mitter (1993). Employment and working conditions of low-skille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workers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vol. 132,No. 1 (January-February),pp. 49-64.

Perez-Aleman,P. (1992). Economic crisis and women in Nicaragua. In *Unequal Burden:Economic Crisis,Persistent Poverty and Women's Work*,L. Beneria and S. Feldman,eds. Boulder,Colorado:Westview Press.

Picchio,A. (1992). *Social Reproductio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Labour Market*.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ietila,H. (1999). Engendering the global agenda:a success story of women and the United Nations. *INSTRAW Occasional Paper Series*,No. 1.

Pollack,M. and C. Judisman (1997). *El sector informal urbano desde la perspectiva de genero:El caso de Mexico*. Serie Mujer y Desarrollo. Santiago de Chile:CEPAL.

Psacharopolous,G.,and Z. Tzannatos (1992). *Women's Employment and Pay in Latin America:Overview and Methodology*. Washington D.C:World Bank.

Rahman,A. (1999). Micro-credit initiatives for equitabl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who pays? *World Development*,vol. 27,No. 1 (January),pp. 67-82.

Ramakrishnan,G. (1996). A struggle within a struggle:the unionization of women in the informal sector in Tamil Nadu. In *Speaking Out:Women's Economic Empowerment in South Asia*,M. Carr,M. Chen and R. Jhabvala,eds. London:IT Publications.

Ramstetter,E.,ed. (1991).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in Asia's Developing Economies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Boulder,Colorado:Westview Press.

Ranis,G.,and F. Stewart. (1998). The Asian crisis and human development. Paper prepared for a seminar on the Asian Crisis,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University of Sussex,13 and 14 July.

Razavi,S.,and C. Miller (1995). From WID to GAD:conceptual shifts in the women and development discourse. *UNDP and UNRISD Occasional Paper No. 1*.

- Richburg, K. B. (1998). Jobless Asian migrants ending up down on the farm.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Paris), 9 September 1998.
- Robb, C. (1998). Social aspects of the East Asian financial crisis: perception of poor communities. Mimeo. Prepared for an IDS East Asian crisis workshop,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University of Sussex, 13 and 14 July.
- Robinson, D. (1998). Differences in occupational earnings by sex.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 vol. 137, No. 1 (January-February), pp. 3-31.
- Rodrik, D. (1997a). Globalization, social conflict and economic growth. Eighth Raúl Prebisch Lecture, delivered at the forty-fourth annual session of the UNCTAD Trade and Development Board, Geneva, 13-24 October 1997.
- Rodrik, D. (1997b). *Has Globalization Gone Too Far?* Washington, D.C.: IIE.
- Rubery, J. (1998). Part-time work: a threat to labour standards? In *Part-Time Prospects: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Part-Time Work in Europe, North America and the Pacific Rim*. J. O'Reilly and C. Fagan, ed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Rubery, J. and C. Fagan (1995). Gender segregation in a societal context. *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 vol. 9, No. 2 (June), pp. 213-40.
- Rubery, J. and F. Wilkinson (1998). *Employer Strategy and the Labour Marke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uigrok, W., and R. van Tulder. (1995). *The Logic of International Restructuring*. London: Routledge.
- Russell, S. (1995). Policy dimensions of female migration to the Arab countries of Western Asia. In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Policies and the Status of Female Migrants: Proceedings of the United Nations Expert Group Meeting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Policies and the Status of Female Migrants*, San Miniato, Italy, 28-31 March, 1990. New York.
- Sachs, C. (1996). *Gendered Fields: Rural Women, Agricultural and Environment*.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 Sainsbury, J. (1997). The new inequality; women workers' lives in Thailand and the Philippines. A CIIR briefing. London: Catholi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Samarasinghe, V. (1998). Access of female plantation workers in Sri Lanka to basic needs provision. In *Different Places, Different Voices: Gender and Development in Africa, Asia and Latin America*, J. Momsen and V. Kinnaird, ed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Sarin, M. (1995). Regenerating India's forests: reconciling gender equity with joint forest management. *IDS Bulletin*, vol. 26, No. 1 (January), pp. 83-91.
- Sassen S. (1998). Informalization in advanced market economies. *Issues in Development Discussion Paper*, No. 20. Geneva: ILO.

- Schuler,S.R.,S.M. Hashemi and A.P. Riley. (1998). The influence of Women's changing roles and status in Bangladesh's fertility transition:evidence from a study of credit programmes and contraceptive use. *World Development*,vol. 25,No. 4 (April),pp. 563-575.
- Schultz,T.P. (1990). Women's changing participation in the labour force:a world perspec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vol. 38,No. 3 (April),pp. 457-88.
- Seguino,S. (1997a). Export-led growth and the persistence of gender inequality in the NICs. In *Economic Dimensions of Gender Inequality:A Global Perspective*,J. Rives and M. Yousefi,eds. Westport,Connecticut:Greenwood Press.
- \_\_\_\_\_ (1997b). Gender wage inequality and export-led growth in the Republic of Kore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vol. 34,No. 2 (December),pp.102-32.
- \_\_\_\_\_ (forthcoming,September 2000). The effects of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on gender wage differentials i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forthcoming volume.
- Sen,A. (1990). Gender and cooperative conflicts. In *Persistent Inequalities:Women and World Development*,I. Tinker,e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en,G. (1991). Macroeconomic policies and the informal sector:a gender sensitive approach. Working Paper,No. 13,Poughkeepsie,New York:Vassar College.
- Shaiken,H. (1993). Advanced manufacturing in Mexico:the auto and electronics sectors in United States-Mexico trade and investment. *United States-Mexico Technology,Trade and Investment Project*. Washington,D.C.:United States Congress,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
- Shin,G.,and K. Chang. (1999). Social crisis in Korea. Mimeo. UCLA and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 Siamwalla,A.,and O. Sobchokchai. (1998). Responding to the economic crisis and impact on human development in Thailand. Paper presented at an EDAP regional conference on social implications of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Korean Development Institute and UNDP,Seoul,29-31 July 1998.
- Sjaastad,E.,and D.W. Bromley. (1997). Indigenous land rights in sub-Saharan Africa:appropriation,security and investment demand. *World Development*,vol. 25,No. 4 (April),pp. 549-562.
- Skeldon,R. (1998).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on women:the migration of women in the Asian and Pacific region. Paper commissioned by the Women in Development Section of ESCAP for the ESCAP regional meeting on the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on women,22-24 June 1998,Bangkok.
- Sontheimer,S. (1997). *Gender and Participation i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Planning:Lessons from Namibia*. Rome:FAO.

- Sparr,P.,ed. (1994). *Mortgages Women's Lives:Feminist Critiques of Structural Adjustment*. London,Zed Books.
- Stalker,P. (1997). *Global nations:the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Papers,No. 16. Geneva:ILO.
- Standing,G. (1989). *Global feminization through flexible labour*. World Development,vol. 17,No. 7 (July).
- \_\_\_\_\_ (1997). *Globalization,labour flexibility and insecurity:the era of market regul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vol. 3,No. 1 (March),pp. 7-37.
- \_\_\_\_\_ (1999). *Global feminization through flexible labour:a theme revisited*. World Development,vol. 27,No. 3 (March),pp. 583-602.
- Stephens,A. (1995). *Gender issues in agricultural and rural development policy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In *Gender Issues in Agricultural and Rural Development Policy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Bangkok:FAO/RAPA.
- Stevens,C. (1994). *After the Uruguay round:implications for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Policy Briefing Paper. Brighton:University of Sussex.
- Stewart,F. (1995). *Adjustment and Poverty*. London:Routledge.
- Tanzi,V. (1995). *Taxation in an Integrated World*. 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e.
- Thrupp,L.A.,G. Bergeron and W. Waters (1995). *Bittersweet Harvests for Global Supermarkets*. Washington,D.C.: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 Tiano,S.,and R. Fiala (1991). *Export processing workers in Northern Mexico:a study of women,consciousness,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vol. 26,No. 3 (Fall),pp. 3-27.
- Tibaijuka,A. (1994). *The cost of differential gender roles in African agriculture:a case study of smallholder banana-coffee farms in Kagera Region,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vol. 45,No. 1 (January),pp. 69-81.
- Tinker,I. (1990). *Persistent Inequalities:Women and World Development*.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okman V. (1990). *The informal sector in Latin America:fifteen years later*. In *The Informal Sector Revisited*,D. Turnham,B. Salomé and A. Schwarz,eds. Paris:OECD Development Centre.
- Tomoda,S. (1995). *Women workers in manufacturing,1971-91*. Sectoral Activities Programme Working Papers,No. 91. Geneva:ILO.
- Tsai,P. (1995).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income inequality:further evidence*. World Development,vol. 23,No. 3 (March),pp. 469-83.

Tully,D.,ed. (1990). Labour and Rainfed Agriculture in West Asia and North Africa. Boston: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Tzannatos,Z. (1992). Potential gains from the elimination of labour market differentials. In Women's Employment and Pay in Latin America,part 1,Overview and Methodology. Regional Studies Program Report,No. 10,Washington,D.C. :World Bank.

Tzannatos,Z. (1995). Growth,adjustment and the labour market:effects on women workers. Paper presented at a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Feminist Economics,Tours,July 1995. Washington,D.C.:World Bank.

UNCTAD (1994). Statistical Pocket Book.

\_\_\_\_\_ (1995).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1995.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ales No. E.95.II.D.16.

\_\_\_\_\_ (1996). Globalization and liberalization:development in the face of two powerful currents.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f UNCTAD to the ninth session of UNCTAD. New York and Geneva.

\_\_\_\_\_ (1997a).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1997.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ales No. E.97.II.D.8.

\_\_\_\_\_ (1997b).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1997.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ales No. E. 97.II.D.10.

\_\_\_\_\_ (1998a).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1998.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ales No. E.98.II.D.6.

\_\_\_\_\_ (1998b).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1998.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ales No. E.98.II.D.5.

\_\_\_\_\_ (1999). 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for 1999. Geneva.

UNDP (1993).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3.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_\_\_\_\_ (1995).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5.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_\_\_\_\_ (1997).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7.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_\_\_\_\_ (1998). UNDP Poverty Report 1998:Overcoming Human Poverty. New York.

UNFPA (1998). Gender,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mes in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s,1985-1995. New York.

UNICEF. (1997). Children at Risk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Perils and Promises. Economics in Transition Regional Monitoring Report,No. 4. Florence.

UNIDO. (1993). Women In Manufacturing:Participation Patterns,Determinants And Trends. Vienna.

United Nations. (1986). World Survey on the Role of Women in Development. Document ST/ESA/180. New York.

\_\_\_\_\_ (1986).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41/128 of 4 December 1986.

\_\_\_\_\_ (1989). 1989 World Survey on the Role of Women in Development. ST/CSDHA/6. New York.

\_\_\_\_\_ (1995a). Women in a Changing Global Economy:1994 World Survey on the Role of Women in Development. Document ST/ESA/241. New York.

\_\_\_\_\_ (1995b).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f Women:An Overview. In International Policies and the Status of Female Migrants,Proceedings of the United Nations Expert Group Meeting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Policies and the Status of Female Migrants,San Miniato,Italy,28-31 March 1990.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_\_\_\_\_ (1996a). Report of an expert group meeting o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migrant workers,Manila,Philippines,27-31 May 1996. New York:United Nations.

\_\_\_\_\_ (1996b). Report of an expert group meeting on women and economic decision-making i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Simmons College,Graduate School of Management,Boston,11-15 November 1996. New York.

\_\_\_\_\_ (1996c). Women of Bangladesh:A Country Profile. ESCAP Statistical Profiles,No.2. New York.

\_\_\_\_\_ (1996d). Women in the Philippines:A Country Profile. ESCAP Statistical Profiles,No. 3. New York.

\_\_\_\_\_ (1996e). Women in Thailand:A Country Profile. ESCAP Statistical Profiles,No. 5. New York.

\_\_\_\_\_ (1997a). Issue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selected aspects. New York.

\_\_\_\_\_ (1997b).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the concise report. New York.

\_\_\_\_\_ (1997c). Mainstreaming the gender perspective into all policies and programmes in the United Nations system. See document A/52/3 of 18 July.

Van Adams,A.,and T. Hartnett. (1996). Cost-sharing in the social sectors of sub-Saharan Africa:impact on the poor. World Bank Discussion Paper,No. 338,Washington,D.C.:World Bank.

van Diermen,P. (1997). Labor remuneration in Jakarta's small enterprises:exploitative or equitable? World Development,vol. 25,No. 12,December,pp. 2129-2141.

- Wachtel,H. (1986). *The Money Mandarins*. New York:Pantheon Books.
- Ward,K.,and J. Pyle. (1995). Gender,industrialization,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and development:an overview of trends and patterns. In *Women in the Latin American Development Process*,C. Bose and E. Acosta-Belen,eds. Philadelphia,Pennsylvan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Weede,E.,and H. Tiefenbach. (1981). Some recent explanations of income inequality:an evaluation and critiqu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25,No. 2,pp. 255-82.
- Williamson,J. (1996). *Globalization Then and Now:The Late Nineteenth and Late Twentieth Centuries Compared*. NBER Working Paper,No. 5491. Cambridge,Massachusetts: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 Wilttrout,K. (1998). South Korean women lose past gains. *Boston Sunday Globe*,20 September 1998.
- Wolf,D. (1992). *Factory Daughters:Gender,Household Dynamics and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in Java*.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Wood,A. (1991). North-south trade and female labour in manufacturing:an asymmetry.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vol. 27,No. 2 (January),pp. 168-89.
- Wood,A. (1994). *North-South Trade,Employment and Inequality*. Oxford:Clarendon Press.
- Wood,G. and I. Sharif. (1997). *Who Needs Credit? Poverty and Finance in Bangladesh*. Dhaka:University Press Limited.
- World Bank. (1988).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88*. Washington,D.C.
- \_\_\_\_\_ (1994). *Adjustment in Africa:Reforms,Results and the Road Ahead*,Washington,D.C.:World Bank,1994.
- \_\_\_\_\_ (1995a). *Towards Gender Equality:The Role of Public Policy*. Washington,D.C.
- \_\_\_\_\_ (1995b).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5*. Washington,D.C.
- \_\_\_\_\_ (1997).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7*. Washington,D.C.
- \_\_\_\_\_ (1999a). *1999 World Bank Atlas*. Washington,D.C.
- \_\_\_\_\_ (1999b). *1999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Washington,D.C.
- Yunus,M. (1997). The Grameen Bank story:rural credit in Bangladesh. In *Reasons For Hope:Instructive Experiences in Rural Development*,A. Krishna,N. Uphoff and M.J. Esman,eds. London:Kumarian Press.
- Zohir,S.C.,and P. Paul-Majumder (1996). *Garment workers in Bangladesh:economic,social and health conditions*. Research Monograph,No. 18. Dhaka:Bangladesh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Zwarteveen,M.Z. (1995). Water:from basic needs to commodity:a discussion on gender and water rights in the context of irrigation. Paper prepared for GENDER-PROP,an international e-mail conference on gender and property rights,May-December 1995.

Zysman,J. (1996). The myth of a “global” economy:enduring national foundations and emerging regional realities. *New Political Economy*,vol. 1,No. 2 (July),pp. 157-85.